SHIFT

为自由入狱：从西方女性运动史分析激进者和保守者的利益一致性

Jailed for Freedom: An Analysis of the Consistency of Interests between Radicalism and Conservatism from the History of Western Women's Movement

Abstract：

本文以多丽丝·史蒂文斯《Jailed for Freedom》所记载的 1913-1919 年美国激进女权运动为核心文本，结合英国“妇女社会政治联盟”（WSPU）的战斗性运动，剖析女性争取普选权进程中内部出现的策略分化，亦适用于现代社会的女性权利发展。

运动内部因教育背景、社会阶层、风险承受力不同，形成了以艾丽斯·保罗为代表的“激进派”和以传统游说团体为代表的“保守派”。

历史表明，妇女阵营内部的分化并非根本利益的背离，而是在坚持同一最终目标的前提下，所采取的不同策略。激进者通过制造“危机”和“不服从”，打破僵局，重新设定议题框架；保守者则维系组织合法性，进行体制内深耕与舆论转化。二者互补，共同构成了推动社会变革的合力。

本文认为，任何权利斗争都必然包含激进与保守的辩证互动。借鉴历史，当代女性在面对职场歧视、性别障碍等议题时，应认识到女性作为利益共同体的根本一致性，以战略包容看待内部的不同声音。既要善用体制内改革与法律途径，也应理解并吸纳激进表达所揭示的结构性不公与紧迫感，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行动策略。

Keywords: Feminism , WSPU, 历史社会研究

一、研究背景

关于英美妇女选举权运动的研究汗牛充栋，传统史学多聚焦于制度演进、关键人物与重大事件。近年来，研究视角日益多元化，特别是对运动内部张力与策略分歧的探讨成为重点。

对“激进派”（Militants）的研究：史蒂文斯的《为自由而入狱》本身就是激进派的核心文献与辩护书，它详细记录了美国全国妇女党（NWP）的静坐、绝食、入狱等非暴力直接行动，并强调其策略的政治实效性——迫使威尔逊总统和国会将选举权视为无法回避的“政治问题”而非“道德议题”。

英国方面，潘克赫斯特家族的传记与研究揭示了其“行动而非空谈”哲学，以及打破社会常规、吸引媒体聚焦的策略逻辑。这些研究指出，激进派的作用在于“打破天花板”，将看似遥远的理想变为紧迫的政治危机。

对“保守派”（Constitutionalists）与内部冲突的研究：大量研究关注如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NAWSA）等主流组织与激进派的分歧。保守派批评激进派的对抗性策略“损害了运动形象”、“疏远了男性盟友”。史蒂文斯在书中也多次提及保守派领袖的“恐惧”与“不情愿”。历

史学家往往分析这种分歧源于阶级背景（中产阶级 vs. 更广泛阶层）、对体制的信任度以及风险偏好的不同。然而，后续研究也指出，保守派持续的游说、教育、州级竞选工作，为最终修正案的通过积累了必要的政治资本与广泛的社会基础。

综合性与比较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采用综合视角，认为激进与保守策略是相辅相成的。激进派制造的“噪音”和危机，为保守派的“理性”谈判创造了空间和筹码；而保守派维持的运动基本盘与合法性，又为激进派的行动提供了潜在的社会同情基础。这种“好警察/坏警察”的动态，被一些政治学家视为社会运动推动变革的经典模式。本文将在这一综合框架下，结合原始文献，进行深入分析。

二、共同的目标，分歧的路径：激进与保守的诞生

《为自由而入狱》开篇即阐明，激进派与“纯粹宣传者”的区别，在于对“政治中 prevail 的力量”有清醒认知。以苏珊·B·安东尼为精神先驱，以艾丽斯·保罗为实践领袖的美国激进派，其核心信条是：女性权利不能靠乞求、证明或等待“潮流”到来，而必须通过政治力量去夺取。

安东尼在 1872 年因投票被捕，她在法庭上的宣言——“正如当年奴隶必须越过、穿过或不公正的法律形式来获取自由，如今妇女也必须这样做”——奠定了战斗性的基调。然而，在安东尼之后，运动陷入了史蒂文斯所描述的“狭窄的宣传循环”，缺乏“将帅之才”。直到 1913 年，艾丽斯·保罗从英国带回潘克赫斯特式的 militant 策略，情况才发生改变。保罗领导的游行在总统就职日遭遇警察纵容的暴力，反而激发了全国关注；她组织选民向国会施压；最终，最具标志性的策略是 在白宫门前设立“沉默的哨兵”进行纠察（picketing）。

这一激进策略立刻引发了运动内部分化。保守派认为，在战争时期以如此方式对抗政府是“不爱国的”、“会损害运动”。书中记载，甚至有支持者担忧地告诉保罗：“两位支持选举权的参议员今天谴责了纠察队……说我们让选举权事业倒退了。”

保罗的回答犀利而深刻：“他们当然会反对，因为他们不想让人们注意到他们未能迫使政府行动。作为这项法案的朋友，他们的责任更大。”保罗清晰地将矛头指向了当权者的“不作为”，而非运动内部的“不团结”。

同样，在英国，潘克赫斯特夫人领导的 WSPU 与更温和的“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联合会”（NUWSS）分道扬镳。

WSPU 的砸窗户、纵火（针对财产）、绝食抗议，被当时许多人视为疯狂和破坏。然而，正是这种极端的“危机制造”，将妇女选举权从报纸内页的花边新闻，变成了每日头版的“政治问题”，迫使整个社会无法再假装它不存在。

分化根源：这种分化并非源于终极目标的不同（双方都要求选举权），而是源于：

1. 对政治权力本质的理解不同：激进派视权力为需要争夺的零和游戏；保守派更相信理性说服与渐进演化。

2. 对牺牲与风险的承受力不同：激进派成员（如多次入狱的露西·伯恩斯、被强制喂食的艾丽斯·保罗）愿意承受人身自由与健康的巨大代价；保守派则更注重维护运动的社会声誉与组织稳定。

3. 策略的时间框架不同：激进派追求“立即实现”（Immediacy），保罗称之为“要求而非乞求”；保守派则准备进行“持久战”。

三、张力中的合力：激进与保守的辩证统一

历史证明，激进派与保守派看似对立，实则构成了一个动态的、互补的斗争生态系统。

激进派的功能是“破局”与“定价”。她们的行动，如纠察、入狱、绝食，做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大幅提高了政府压制选举权运动的“政治成本”。当穿着囚服的“上流社会”女性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当关于奥科宽劳动营（Occoquan Workhouse）恶劣条件的细节被公之于众，当内阁成员（如达德利·菲尔德·马龙）因不满政府迫害女性而辞职，威尔逊政府所承受的道德压力和政治尴尬与日俱增。

史蒂文斯记录，战争部长牛顿·贝克最终承认：“这是一场革命。”激进派通过将自身遭受的苦难“戏剧化”，成功地将“女性是否应有投票权”的抽象辩论，转化为“一个民主政府是否应该将和平请愿的妇女投入监狱”的具体而尖锐的道德拷问。这为保守派的游说创造了

全新的、更有利的语境。

保守派的功能是“筑基”与“转化”。

当激进派制造出巨大的声浪和关注度后，需要有人将这些能量转化为具体的政治成果。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NAWSA）等组织在州一级的持续努力，积累了数百万女性选民的基础；她们与各州议员建立的关系网络，是在国会推动法案所必需的；她们相对“得体”的形象，安抚了中间派和犹豫者的情绪，使得选举权议题不至于被彻底“妖魔化”。最终，当威尔逊总统在 1918 年转而支持联邦修正案，并呼吁参议院将其作为“战时措施”通过时，他需要面对的是一个已被激进派“预热”、并被保守派长期耕耘过的政治战场。

一个关键例证是 1919 年最终投票前夕。激进派全国妇女党仍在进行“守望之火”（watchfire）抗议，持续施加道德压力；而保守派力量则在国会走廊进行最后的票数计算和说服工作。两者在物理空间和行动风格上截然不同，但目标完全一致：确保第 19 条修正案获得通过。功不唐捐，所有路径上的努力——无论是保罗在监狱中的绝食，还是无数无名者在各州收集的请愿签名——最终都汇入了同一条胜利之河。

四、历史启示与当代映射：构建利益共同体的战略包容

当今女性面临的职场性别歧视、晋升天花板、生育惩罚、性骚扰等结构性障碍，与一个世纪前的选举权斗争在本质上相通：都是要求在一个由男性主导设计和维护的系统中，获得平等的承认、尊严与机会。

1. 承认根本利益的一致性，超越内部分化标签：

当代女性运动虽未能以政治团体的形式出现，但实际上通过网络的发展，已经培养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者，或者说所有女性都是这一阵营中的一员。

而内部也存在“激进女权主义”、“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温和派”等类型。有时，对“MeToo”运动方式、“彩礼”议题、性别对立言论的争论会异常激烈，甚至互相指责。

历史提醒我们，必须区分“策略分歧”与“根本对立”。将职场中要求同工同酬的律师、为遭受性骚扰的工友发声的工厂女工、在网络上批判性别 stereotypes 的学生、以及推动企业设立育儿友好政策的 HR，视为利益共同体而非敌人。

她们的诉求内核一致：消除基于性别的歧视，实现个体全面发展，致力人人平等。

在此基础上，所有女性，甚至是所有人类，都是统一战线的。

2. 善用“激进”的破冰价值与“保守”的建设功能：

当遇到系统性障碍时，需要“艾丽斯·保罗式”的行动者。她们可能是率先起诉公司性别歧视的雇员，可能是公开揭露行业潜规则的记者，也可能是在社交媒体上发起尖锐话题的博主。

她们的作用是 “提出问题”、“制造能见度”、“打破沉默的合谋”，甚至不惜承受“矫枉过正”、“制造对立”的批评。她们的行动为改革设定了议程，提高了不作为的成本。

同时，也需要“体制内改革者”。她们是推动和细化《反就业性别歧视法》条款的法律专家，是在企业内设计并执行多元化培训的管理者，是进行性别薪酬差距研究并提供解决方案的学者。她们的工作是将激进呼声提出的问题，转化为可落地、可持续的制度与文化改变。没有激进者的呐喊，问题可能永远被搁置；没有保守者的深耕，呐喊可能只停留在口号。

3. 面对激进表达：

笔者认为类似于二十世纪西方女权主义者的激进行为，在现代社会已不普遍适用。可这并不代表她们和“理智者”是对立的。应尽力减少在公共场合、公开网络上对偏激女性主义者的同性反驳。

当遇到看似“过于激进”的意见表达者时，有效的态度不是简单切割或否定。极端的情绪往往源于极端的困境。其言辞背后的核心诉求是什么？是否揭示了某个被长期忽视的痛点？

激进观点往往像探照灯，照亮了系统中最黑暗、最顽固的角落。即使不认同其全部结论或方式，也应严肃对待其揭示的问题本身。

我们要尽量站在在共同立场上私下对话：就具体策略进行辩论，但应始终锚定在“我们共同希望消除的性别不公是什么”这一大立场

上。正如保罗对“恐惧者”的解释，是将对方从对“策略”的担忧，引向对“目标”和“对手”的清晰认知。

五、总结

从《为自由而入狱》的篇章中，我们看到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权利斗争如何在其内部充满矛盾与张力中前行。苏珊·B·安东尼的孤勇、艾丽斯·保罗的谋略、潘克赫斯特夫人的决绝，与无数温和派、保守派日复一日的组织、教育和游说，共同编织了胜利的经纬。

历史昭示我们：社会进步从来不是单一旋律的合唱，而是激进号角与稳健步伐交织而成的交响。

当今女性权利的推进，依然需要这种战略性的包容与智慧。我们应当拥抱斗争光谱的多样性，认识到在争取性别平等的漫长征程中，既需要敢于“为自由而入狱”的破局先锋，以非暴力但不妥协的方式标定正义的边界；也需要善于在体制内“为自由而建设”的务实力量，将理想夯实在法律的砖石与文化的土壤之中。当内部出现分歧时，应回溯到“女性作为利益共同体”这一根本立场，将战术争论转化为对共同敌人——即一切形式的性别不公——的更精准打击。

References：

1. Stevens, Doris. Jailed for Freedom. New York: Boni and Liveright, 1920.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3604, 2021 update).
2. Pankhurst, Emmeline. My Own Story. London: Eveleigh Nash, 1914.

附录：

笔者并非社会历史相关专业人士，对于本题目的思考完全基于个人的善恶观以及《Jailed for Freedom》一书的阅读过程。

本书出自美国女性运动的亲身经历者多丽丝.史蒂文斯之手，较为客观详实地以女性视角记录了那段历史。现为公版书籍可在“古登堡计划”网站免费下载阅读，推荐有兴趣的姐妹阅读原版书籍。

作者作为英语专业学生，在因 ai 发展被唾弃的今天，仍坚持着翻译梦想，故而有志将本书翻译为中文版。碍于其题材的敏感性和版权的无所属，注定难以面世，但我仍然希望哪怕多一位姐妹读到这本书并因此受到启迪，就值得。

目前本人处于考研阶段，忙里偷闲正在制作本书的中英对照人工校译版本，虽时间不定，但一定会完成该项工作。愿意等待本书中英版本的姐妹可以发送邮件至邮箱：ruomeijin@foxmail.com，也许某一天你醒来打开手机，就会看到一本倾注了无数女性的心血的书籍躺在邮箱里，到那一天，当然也欢迎合理范围内的自由分享。

《赛博旷野的欲望远征：同人色情文学是属于同人女的性压抑吗？》

本文主要以男同为主的同人女群体的行为为例

摘要：长期以来，大众语境常将同人女对 CP 色情文本的消费行为定义为现实性匮乏的代偿产物。这种解读带有明显的病理化偏见。本研究试图彻底推翻这种陈旧的压抑论叙事，笔者认为，这种高度叙事化的性幻想实践是一场深刻的主体革命。

在该亚文化领域中，女性获得了审视、解剖以及重组欲望的绝对权力。这种行为远超了简单的生理慰藉范畴。它标志着女性在亚文化阵地中夺回了关于身体和性的叙事主权。

关键词：同人亚文化；女性凝视；主体性；欲望叙事

一、引言

在同人亚文化的生态中，性爱叙事一直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并且成为了很大一部分同人作品的核心构成。从早期的论坛到贴吧，从图片翻转镜像到还能自由分享的石墨文档，从中转站 verybin 到具有档案意义的 AO3，甚至亚文网、推特等更多网站，同人女创作和阅读的地理坐标在不断迁徙。同人女这个群体在构建两个同性的爱恨纠葛时展现了惊人的能量，她们不留余力的捕捉那些游走在感情边缘的张力，将欲望和情感编织进每一段叙事中。

同人女们对于这种叙事的执着在信息流动极快的今天显得尤为独特。即便如今的网络技术已经极大的降低了获取信息的成本，依然有不少受众愿意有偿购买进入 AO3 的镜像链接，它证明了这些文本绝非是可有可无的消遣，在某种程度上，它们确实具备了无可替代的精神支撑作用。

面对这一庞大的文化奇观，我们应当寻求这背后的核心逻辑，所以简单的将其定义为女性性压抑而产生的代偿性行为，显然无法解释同人女在其中复杂的审美追求。我们需要探讨的是，这种实践究竟是如何帮助女性重塑自我意识，在虚拟空间里建立起一套属于自己的，不受外界审视的欲望话语体系。

二、审视纬度的倒置

2.1 女性凝视对传统十八禁媒介的背离

主流成人影像和文学中，女性往往作为被观看、被消遣的对象存在，这种视觉剥夺了女性的表达权，女性成为了各类文艺作品中的附庸，需要男性角色成长的时候，就把他的爱人或者母亲作为祭品，以此推动男主感情爆发，等到主角获得普世意义的成功时，女性又会作为某种勋章或者奖赏再次出现。大量的女性对诸如此类标签化、工具化的叙事感到厌烦，在这种集体性的审美疲劳中，有一部分女性创造者，她们带领女人们把视角转向了全新的领域，她

们通过创作，将男性角色置于被观察、被剖析、甚至被肉欲化的位置。

- 视角转换：女性不再是被动接受审美的客体，女性们独立于故事之外，成为了掌握定义权的主体。
- 权力：男性角色展露出的脆弱与挣扎，满足了女性读者和笔者对于掌控感的心理诉求。
- 意义：这种行为已经超越了简单的视觉消费，演变成了一种对于观看权利的宣告。

并且，女性作家与女性读者在交流和探讨中，结合自身的偏好，重新定义了什么是迷人和性感，从而建立了一套完全独立于男权审美之外的评价体系。

纬度	传统男权审美标准	同人女主体审美标准
核心吸引力	绝对的统治力和雄性力量	复杂的内心世界和适度的脆弱感
性感	充满侵略性的生理表现	细腻的情感波动以及身心契合的张力
角色关系	单向的占有与征服（还有单向的盲目崇拜）	动态的平衡与深层的灵魂共振

这种审美体系的建立，标志着同人女们在亚文化领域中得到了高度的自省，她们不再通过认同和取悦他人的标准来定义好与美，而是通过对他人的剖析来确认自我的需求。这种从客体到主体的华丽转身，为同人亚文化的繁荣提供了最根本的动力。

2.2 为何是男性？为何是男同性？又为何是男同色情文学？

面对同人亚文化，外界常有此类疑问：为何受众是女性，主角却是男性？为何必须是男同性关系？又为何要涉及色情叙事？

为何是男性：在阅读与创作男男（BL）文本时，女性读者获得了一种极为宝贵的心理豁免权。她们可以暂时卸下现实中女性身份带来的多重枷锁。这其中包括社会对女性生育义务的隐形剥削，对身材与容貌苛刻的监视，以及对女性作为照顾者、顺从者的角色期待。

通过将叙事主体设定为男性，女性读者得以从那个总是被审视、被规范的女性身体中跳脱出来。这种身份的隐匿让她们能够以一种自由的视角去体验快感，而无需在潜意识中应对现实身份带来的焦虑与羞耻。

为何是男同性：在同性叙事的框架下，创作者成功剥离了基于生理性别的天然强弱差距。现实中的异性恋权力结构往往预设了男强女弱的阶级感，这种不平等的基调极大地限制了情感流动的纯粹性。

而在两个男性之间，由于生理基础的相似性，这种预设的权力等级被打破，在这里，两个独立人格之间的博弈、碰撞与融合变得更加透明。这在现实的性别权力结构中往往难以达成，因此成为了女性在虚拟世界中孜孜以求的理想范式。

为何要涉及色情叙事：在这里，女性不必因为描写性或谈论性感到羞耻。她们大方地承认并

宣告，性是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直率的表达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会受到道德层面的审视甚至耻笑。

相比较追求纯粹的生理刺激，更多的同人女把创作的重心放在了情感与生理的深度共振。这种叙事强调性行为是角色情感演变的终点或高潮，它被赋予了极其丰富的叙事意义。

2.3 为什么肉必须长在骨头上

对于大部分同人女而言，性描写绝非孤立存在的，它必须是角色性格的逻辑延伸，如果互动的双方并不是她们熟悉的 cp，这些文字对她们来说毫无吸引力。

许多同人女会先看一些清水文章和互动解析，通过对细节的反复品味，在脑海中勾勒出角色之间不可撼动的羁绊，关于 cp 的情感积累达到足够浓度时，她们才开始急于寻求情感升华。她们在日常生活中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分析两个角色的互动，去品味隐藏在表面之下的暗流涌动，因为有了前期的情感铺垫，最后的延迟满足才有厚度和份量。

这仅仅表明着，同人女们正在追求一种能够自洽的，关于爱的完整表达。

三、 文字的安全边界与想象力

视觉影像往往带有某种强迫性、无法回避的具象性。简单来说，我们很容易因为导演、摄像、剪辑等具体的个人喜恶而对作品本身产生偏见。相比之下，文字作为符号系统的抽象性，消解了可能能够实际接触的物理压迫感，这种距离感能够使读者以观察者的视角，坦然的审视在现实中可能诱发羞耻感或者不安的内容。

并且阅读的速度由读者本人决定，这种对于叙事节奏的掌控权，实际上是对欲望宣泄进度的自我调节。

而同人文本的魅力就在于其巨大的留白空间。这种不完整性要求读者的想象力积极介入，从而达成一种深度的身心共振。

文字通常所提供的并非一个完成品，而是一套激发想象的指令。每一位读者在阅读同一段文字时，由于个人经验与审美偏好的差异，都会在脑海中渲染出完全不同的画面。这种过程让阅读行为演变为一种二次创作。

这种参与性使得快感变得高度定制化。因为最能触动生理反应的细节往往并非由作者写就，其核心在于读者根据自身需求所完成的心理填充。这种机制将读者从被动的接收者提升为审美价值的共同缔造者。

文字在这里不仅仅是信息的载体，它更是一套完整的安全防护系统。它允许同人女在不碰触任何现实危险的前提下，利用想象力的增益效应，完成灵魂深处的欲望抒发。

四、 孤岛的终结

长久以来，女性的性幻想常常被视作羞耻且孤立的，我们青春期对于性的最大限度讨论甚至还不能让我们坦然的说出月经两个字，然而在隔着网线的遥远屏幕下，同人社群的存在彻底打破了这种孤立状态，私人领域的情感描写能转变成公共的情感流动。

在嗑 cp 的过程中，个体的兴奋点被社群通过评论、二创等方式成倍放大（由此诞生“领嗑”）。这种对于文本的解读和反馈本身就是一种情感投入，社群通过这种高密度的互动，建立起了一套独特的价值闭环。

在这里，个体的性偏好得到了空前的尊重。无论这种偏好是关于极端的支配与服从（BDSM），还是倾向于纯粹的精神交流（柏拉图），社群成员都能在庞大的标签体系中找到共鸣。这种对他人的理解与对自我的接纳，构筑了一道抵御外界污名化的坚实围墙。她们通过这种集体性的审美，在虚拟空间里建立起了一套温和、自洽且具包容性的逻辑。

同人女们擅长从恨中找到爱，从暴力和创伤中找到对亲密关系的解释，这些极端的文本，实际上是一种集体性的心理疗愈，这种疗愈将原本可能导向压抑的能量，转化成向内的探索和向外的链接。

在这里，女性安全的拆解痛苦，大方的谈论伤害，原本沉重的能量被稀释。同人女们通过文字，在冷酷现实和温暖虚拟中，建起了安全可靠的桥梁。

她们不仅仅是在阅读，而是在通过阅读和创作，去构建一个更符合自我意志的世界。

五、 结语

通过对于权力、媒介特质以及社群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将同人女的性叙事的消费行为简单的归类于性压抑的产物，无疑是逻辑上的傲慢。这种解读忽略了女性在虚拟空间中表现出的惊人创造力和掌控力。

同人色情文学的存在，标志着女性开始有意识的在主流性别秩序之外开辟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

现在，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那个下午，当你点击进一篇需要复杂跳转才能进入的文章，当你还在为此感到脸红心跳时，你或许并未意识到，一个女性正在开始尝试剥离外界赋予的羞耻枷锁。

展望未来，我期待社会对于女性欲望的苛责审视能够逐渐消融，愿针对女性的各种形式的性歧视会在理性的光芒下彻底无所遁形。愿同人女的创作热情如星火般永恒跳动，愿庇佑着同人女的创作空间永存，免受偏见与恶意的侵袭。

愿每一位女性，自由想象、自由表达、自由去爱吧。

在街上行走时不小心衣服沾了屎是应该接过别人的纸擦干净还是把脏衣服丢掉

--借经济学浅析东亚语境下大多数女性所拥有的权利与权力的困境

那你忍不忍，月光女王天下第一，谷歌
嘉里吨大学，拜德二级研究所
地球村
通讯作者：无
本研究暂无任何经济支持
本文不包含补充材料

摘要：本文以“沾了污物的衣物”为喻，旨在剖析东亚语境下女性被给予的权利与主动获得的权力之间的错位价值。本文中，公共街道象征社会公共场域，意外被污染代表女性在性别结构中所被动承受的非自愿损伤，他人递纸则象征社会提供的表层，擦拭衣物代表隐忍与妥协，而丢弃衣物代表了退出规则和结构性反抗。
笔者发现，东亚女性在婚育、职场、家庭与社会评价体系中承担着高度不对称的个体成本，导致“反抗—退出”的机会成本被系统性抬高。社会仅提供了浅层的救济，并未分担女性的核心结构性压迫所导致的成本，使得女性在理性选择下只能接受最经济化的隐忍策略，而无力实现断舍离式的彻底退出。
本文认为，东亚女性并未拥有与其权利相符的权力，其真实处境是名义上的权利在被允许的范围内增加、实质议价权力被锁定的权利困境；现如今，个体暂还不能依靠自身力量突破制度与文化构筑的结构性束缚，唯有推动平等的性别文化、提升女性除传统价值的额外价值，才能真正实现从“被动擦拭”到“自主选择”的权力转变。

关键词：权力，权利，东亚社会。

1、引言

一颗鸡蛋从外面敲开是死亡，从里面打开则是新生。现代东亚社会在法律层面普遍确立了性别平等原则，女性受教育权、就业权、婚姻自主权等名义权利持续扩展。东亚女性在现代化进程中，虽然获得了制度性赋权的成果，却又面临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结构性困境。本文旨在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东亚语境下女性被给予的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差异，探讨女性在遭遇不公时，往往只能隐忍修复，难以彻底退出既有结构背后的社会逻辑。

本文提出一个现实生活隐喻：一个人走在公共场合，衣服意外被污浊物污染，此时一个好心路人过来递纸，假设此时这个倒霉的人面对两种选择：接过纸并擦拭衣服并继续穿着，或者直接脱下衣服丢掉。
我们可以将这场景与现实上女性处境对应起来：

- 走在大街上 = 女性进入现代公共生活
- 不小心沾屎 = 被动承受性别歧视、不公与权利损害
- 别人递来纸巾 = 社会给予的象征性安慰、浅层救济
- 接纸擦干净 = 隐忍、妥协、接受现状、继续留在原有结构

- 把衣服丢掉 = 反抗、退出、决裂、拒绝现有规则

从经济学视角看，女性的选择并非道德问题，而是约束条件下的成本最优方案。本文旨在回答：为什么绝大多数女性只能“接纸擦拭”，而几乎无法“丢掉衣服”？这一选择的背后，反映了什么样的权力结构与权利困境？

2.权力和权利的定义

权力作为议价能力，是个体在资源分配与关系结构中影响结果的能力，由退出成本、外部选择价值、资源独立性共同决定。而权利是由法律与制度赋予的资格，属于名义资源，具有开放性、普惠性，但执行依赖外部条件。本文认为东亚女性发展的根本矛盾在于：社会权利不断扩大的同时应该拥有的权力并未同步提升

2.1“递过来的纸”和“被打开的天窗”：制度性赋权与现实壁垒

近代以来，东亚女性逐步摆脱家庭束缚，获得教育、就业、社交等公共参与权，相当于“被允许走上大街”。这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也是“天窗被打开”的象征。但允许走上街，不等于保障在街上的安全与尊严。职场歧视、生育惩罚、家务单边承担、亲密关系暴力、舆论污名、维权困难等，并非女性自愿选择，而是制度与文化强加的外部损害，是“意外的沾污”。在这种语境下的共同特征是：被指责方无过错，却必须承担全部后果。

2.1 .1,制度性赋权的进展

经年来，东亚国家在女性权利保障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如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订，从国家层面强调了男女平等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各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另外，日本《男女共同参与社会基本法》的实施，韩国《性别平等基本法》的出台，均在法律层面确立了男女平等的原则。这些法律为女性提供了受教育、就业、参政等基本权利，打开了女性发展的“天窗”。

2.1.2. 现实壁垒的顽固性

虽然如今制度性赋权取得了进展，但现实壁垒依然存在。以职场为例，东亚女性面临“玻璃天花板”现象，即此情况下的女性不得晋升机会并非因能力不足，而是由组织文化、性别刻板印象、父权制观念等结构性因素造成的隐形壁垒 。日本的“女性活跃推进法”虽要求企业设定女性管理职位目标，但实际执行效果有限。韩国的“女性经济活动参与率”虽逐年提升，但女性在高层管理职位中的比例仍不足 10%。这些现象表明，制度性赋权并未完全转化为现实中的平等机会。

2.1.3 人力资本的需求倒逼和消费主义所赋予的虚假假赋能

二战后，东亚经济体（日本、韩国、后来的中国）经历了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转型。当轻工业、服务业和知识经济发展时，社会需要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让女性受教育，有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性别平等的理念胜利，而是经济上理性的选择——在当时，女性是未被充分利用的、成本相对较低的劳动力储备。这就是“天窗”被打开的时刻：为了经济的整体利益，社会开始允许女性走出家门，进入职场。

如今，在高度发达的东亚消费社会，女性被塑造成强大的购买力群体。广告和媒体鼓吹“独立女性要对自己好一点”，这便赋予了一种消费权力，但这种权力是脆弱的，它依赖于市场的繁荣，且往往将女性引向个体化的享乐，而非结构性的权力变革。我们不难得出，这种“被打开的天窗”提供的是一种“工具性权力”。女性的价值在于她们作为劳动者和消费者的工具属性。一旦经济下行，或者当女性试图触碰更核心的资源分配（如高层职位、同工同酬、财

产继承）时，这扇天窗随时有可能被重新关上。

2.2.1、“把脏衣服扔掉”和“主动砸屋顶”：高门槛的个体觉醒与集体困境

2.2.2，个体觉醒

新一代东亚女性展现出强烈的个体觉醒意愿。她们不再满足于被动接受权利，而是主动争取自身权益。例如，韩国的“#MeToo”运动、中国的“女性主义”讨论、均体现了女性对不平等现象的反抗。这种觉醒不仅体现在公共领域，也渗透到私人领域，使得人们重新审视婚姻、生育、家庭角色。但这种丢弃衣服式的彻底觉醒意味着她们需要放弃现有的传统关系、身份、安全感，同时承担经济、声誉、家庭、育儿的全面风险，接受从前的沉没成本全部归零，还要对抗社会制度、文化、家庭的合力压力。在东亚语境下，这一项选择的成本极高。

2.2.3，集体困境的挑战

个体觉醒往往面临集体困境的挑战。东亚社会的集体主义文化强调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女性的抗争常被污名化为“破坏家庭”“挑战传统”。例如，韩国的“女性主义”常被贴上“极端女权”的标签，中国的“女性独立”也常被质疑“忽视家庭责任”与“自私自利”。这种污名化不仅削弱了女性的抗争力量，掩盖了女性的发声，也加剧了性别对立。

3,女性选择“擦拭”而非“丢弃”的经济学机制

生育对女性有着不可逆的人力资本的折旧，比如职业中断、收入下降、晋升受阻、健康损耗等，而退出婚姻或职场，意味着生育成本需要完全内化。相对而言，男性几乎不承担同类沉没成本，议价能力天然高于女性。

3.1,母职惩罚：职场系统性抬高女性机会成本

企业为规避生育成本，普遍对育龄女性设置隐性壁垒，导致女性收入更低、就业更不稳定、经济独立性更弱。经济依赖越强，议价权力越低。

3.2,家务劳动非定价化：家庭内部权力失衡

东亚社会长期将家务、育儿、照护视为女性天然责任，不计价、不补偿、不纳入财产分配。繁复的家庭责任会显著抑制女性的市场劳动供给，而在家里，女性付出大量无酬劳动，却不具备对应的资源控制权。付出越多，越难离开；越难离开，权力越弱。

3.3,社会评价惩罚：文化锁定女性退出意愿

单身、不婚、离婚、丁克、职场强势的女性，更容易被贴上污名化标签。这种社会惩罚提高了女性“脱离常规路径”的心理成本与社交成本，进一步压缩她们选择的空间。

3.4,制度只支持浅层化：社会只递纸，不分担成本。

法律赋予女性权利，但维权成本高、举证难、赔偿低；公共托育、育儿假期、反歧视行动执行普遍不足。因此，女性选择接受社会浅层的安抚，不是软弱，而是一种为了生存的理性的选择

4,权力假象：东亚女性的真实权力结构

社会常认为女性“地位提升、权力扩大”，但从经济学视角看，女性拥有的并非支配性权力，

而是被挤压的有限选择权。

4.1 权利与权力的辩证：从个体到结构的跨越
权利是法律赋予的应然状态，权力是现实争取的实然能力。东亚女性的权利虽在制度层面得到保障，但权力的缺失使其难以真正实现平等。例如，女性虽有生育权，但缺乏选择不生育的社会支持；女性虽有就业权，但缺乏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制度保障。这种权利与权力的脱节，导致女性在现实中仍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4.2 从个体到结构的跨越
女性要实现从个体觉醒到结构性变革的跨越，需多方共同努力。政府应完善性别平等政策，企业应建立公平的用人机制，社会应营造包容的性别文化。同时，女性自身也应通过教育、职业发展、社会参与等方式提升自身能力。

5、结论

东亚语境下女性的权利与权力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工具性赋权虽为女性打开了“天窗”，但现实壁垒仍限制其发展；个体觉醒虽展现了个人可能拥有的权力，但集体困境仍阻碍其变革。社会既享受了“天窗”带来的劳动力红利，又不愿承担“砸屋顶”所需的制度重构成本。因此，女性的权力往往被挤压在“天窗”和“屋顶”之间那个狭窄的、充满内耗的空间里。
名义上，天窗被打开；
实际上，屋顶仍存在。
社会只递纸巾，不给自由。
真正的破局点，或许不在于女性是否更有权力，而在于社会能否建立一套新的经济核算体系--将生育的社会价值计入发展指标，将家务劳动视为有价值的经济活动，将男性参与育儿视为应当的社会投资--将女性所承担的额外成本社会化，全民化，制度化分担。否则，无论是被动的天窗还是主动的屋顶，都只能是一场无用的零和博弈。

6.参考文献
纸上得来终觉浅，抬头看看吧。

7.致谢
笔者经验不足文笔有限，只愿做块能引玉的砖， 非常感谢愿意花时间阅读拙作的各位，很高兴各位也喜欢这里并有自己的见解!

“普通”作为一种权力策略：论性别秩序中的表演式自谦与结构性优越

一、引言

近年来，“普信男”一词在中文互联网中迅速传播，该词通常被用来形容那些在外貌、社会资本或个人条件上并不有明显优势、却在私密的两性关系中表现出高度自信甚至呈评判姿态的男性。在许多网络讨论中，这一现象往往被解释为一种认知失调：某些男性错误地高估了自己的吸引力或社会价值。

然而，当我们将这一现象放置在现实生活中进行更细致的观察时，发现事情并不完全如此简单。最开始，“普信男”一词更多是第三方或社会上对一个男性的定义。“普信男”反而成为了一部分男性的“保护伞”。有一群男性他们往往会在公共场合主动以自嘲的方式承认自己的局限，例如“我长得不高”“我不帅”“我只是个普通人”。从表面上看，这种态度似乎体现了一种清醒甚至谦逊的自我认知。

然而，回到亲密关系或私密互动中，这些男性却可能展现出截然不同的行为模式：他们依然频繁从高处俯瞰评价女性的外貌，对伴侣进行贬低，甚至在情感关系中保持着明显的权力优势。

这一现象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

如果这些男性并不认为自己在男性群体中出类拔萃，那么他们对于女性的优越感究竟从何而来？

本文提出的核心观点是：
这一现象并不能简单理解为“普通男性的自我误判”，而应当理解为一种更深层的社会结构问题。即使男性承认自己只是“普通男性”，他们仍然可能认为男性这一性别整体高于女性，从而在两性关系中维持一种结构性的优越感。

二、概念界定：“普信男”与表演式自谦

在互联网语境中，“普信男”通常是女性群体对某些男性行为的批判性标签。然而，这一概念在不同语境中往往被混合使用，因此有必要在本文中对其进行进一步区分。

首先，一种常见理解是：
“普信男”指那些在外貌或条件上并不突出，却错误地认为自己非常有魅力的男性。这种解释将问题归因于个体认知偏差。

但在现实生活中，还存在另一种更复杂的情况：
部分男性并不真正误判自身条件，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并不符合主流审美，也不拥有显著的社会资源。甚至有些人会主动承认这一点，通过自嘲来塑造一种“清醒”的形象。

本文将这种现象称为“表演式自谦”（performative modesty）。Goffman（1959）指出，个体在社会互动中往往通过不同的角色表现来管理他人对自己的印象。在这一意义上，本文所提出的“表演式自谦”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社会角色表演：男性在公共空间中通过强调自身普通性来塑造谦逊形象，从而降低他人的警惕。所谓表演式自谦，是指一种通过自我贬低来降低他人警惕的社交策略。在公共空间中，男性通过强调自身的普通性来表现谦逊，从而避免被视为自负或“普信”。然而，在私人关系中，这种自谦并不意味着放弃评价女性或维持权力地位。

换言之，自谦并不一定意味着平等意识的存在，它也可能是一种更隐蔽的性别策略。

三、普通男性与结构性性别优势

要理解这一现象，需要将视角从个体心理转向社会结构。

在性别研究领域，社会学家 Raewyn Connell 提出的“霸权男性气质”（hegemonic masculinity）理论指出，男性气质并不是单一形态，而是一种等级结构。在这一结构中，最具权力的男性形象——例如成功、强势、拥有资源的男性——被视为理想模板。(Connell, 1995)

然而，即便是那些并不符合这一理想的“普通男性”，仍然能够从整体性别秩序中获益。

换言之，父权社会并不只赋予少数成功男性权力，而是为多数男性提供了一种相对于女性的结构性优势。

在这种结构中，一个男性可以同时接受两个事实：

- 自己并不是一个优秀的男性
- 但男性整体仍然高于女性

因此，即使一个男性承认自己“普通”，他仍然可能认为自己拥有评价女性、选择伴侣甚至支配情感关系的资格。

从这一角度来看，“普通男性的优越感”并不是矛盾现象，而是性别结构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表现。

四、研究方法

为了理解“表演式自谦”在亲密关系中的运作方式，本文采用定性研究方法，通过案例分析与个人观察相结合的方式展开讨论。

研究材料主要来源于作者在高中时期对一段亲密关系的长期观察。该关系涉及作者当时的一位女性朋友及其男友。在日常互动中，作者多次观察到两人在公共社交场合与私人关系中的行为差异。

由于研究材料来源于个人经验记录，而非正式访谈，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所有人物均进行了匿名化处理，相关细节仅用于分析社会互动模式，而非评价具体个体。

此外，本文也参考了互联网语境中关于“普信男”的公共讨论，以理解这一概念在当代性别文化中的社会意义。

五、案例呈现

为了更具体地说明普通男性如何在亲密关系中维持优越感，本文参考了一段作者在高中时期观察到的恋爱关系。

该关系涉及笔者当时的一位女性朋友及其男友。从客观条件来看，两人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女性在外貌、身高以及家庭条件方面都更符合社会主流审美与成功标准，而男性在这些方面则较为普通：身高相对较矮，外貌并不符合主流审美，也没有明显的家庭背景优势。

在公共社交场合中，这位男性经常主动提到自己的外貌局限。例如，他会在朋友聊天或聚会中以自嘲的方式表示自己“长得矮”或“并不帅”。这种表达通常以轻松或幽默的方式出现，因此在社交互动中往往被理解为一种清醒与谦逊。

然而，当关系逐渐进入更私密的互动空间时，两人的互动模式开始发生变化。在日常相处中，该男性开始频繁评价伴侣的外貌与身体，例如评论对方“不够瘦”，或暗示她仍然需要进一步改善外表。

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评价逐渐成为两人关系中的一种常态性互动模式。

六、研究发现

6.1 公共空间中的自谦

案例显示，该男性在公共场合经常通过自嘲来强调自身的普通性。这种自嘲通常以幽默方式出现，使其看起来更加真实与谦逊。

这种行为在社交互动中降低了他人的警惕感，使其与传统意义上的“普信男”形象有所区别。

6.2 亲密关系中的评价与贬低

然而，在亲密关系中，该男性仍然频繁评价伴侣的外貌。这些评价并非完全以玩笑形式出现，而往往带有明显的评判意味。

这种行为表明，即使男性承认自身普通性，也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对女性进行评价的权力。

6.3 普通男性的优越感

通过这一案例可以发现，该男性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优秀的男性，但仍然认为自己拥有评价女性的资格。

换言之，他并不认为自己优于其他男性，但仍然认为自己可以评判女性。

这一案例表明，普通男性的优越感并不依赖于个体优势，而更可能来源于男性身份本身所带来的结构性位置。

七、讨论

本文的分析表明，“普通男性的优越感”并不是一种认知失调现象，而是一种性别结构现象。

Connell 的霸权男性气质理论指出，即使不属于理想男性形象的个体，也能够从整体性别秩序中获得相对于女性的优势。因此，一个男性即使承认自身普通，也仍然可以在两性关系中维持评价女性的姿态。

在这一背景下，“表演式自谦”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社会策略。通过承认自身普通性，男性能够避免被视为自负或“普信”。然而，这种自谦并不意味着放弃性别优势，而可能成为一种更加隐蔽的权力维持方式。

普通男性的优越感并不依赖于个体优势，而来源于性别结构本身。换言之，普通男性并不需要认为自己优秀，只需要认为自己是男性。

八、结论

本文探讨了普通男性在承认自身普通性的同时，仍然能够在两性关系中维持优越感的现象。

通过案例分析与理论讨论，本文提出，普通男性的优越感并不依赖于个体优势，而是来源于性别结构所提供的社会位置。

此外，本文提出“表演式自谦”这一概念，用以描述男性通过自嘲与自我贬低来降低他人警惕的社会策略。

因此，理解“普通男性的优越感”需要将视角从个体心理转向社会结构。只有当人们意识到男性身份本身所携带的结构性权力时，才能真正理解这一现象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

参考文献：

Connell, R. W. (1995). Masculinit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offman, E.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Anchor Books.

一种关于生命的叙事逻辑

——兼论“Shift 期刊”的诞生

英文标题：
A Narrative Logic of Life: On the Birth of "Shift Journal"

摘要：
本文以近期网络学术戏仿社区“SHIT 期刊”内部的话语权博弈为切入点，探讨一种被长期边缘化的认知方式如何重新入场。研究发现，当某些创作者带来的深度内容被淹没于下三滥的话题宣泄、当开放空间逐渐形成封闭的“内部默契”时，另一种知识生产的可能性反而在边缘处生长出来——这便是“Shift 期刊”的诞生。本文的核心论点是：在主流价值体系长期推崇的“占有逻辑”之外，始终存在着一种以“生命”本身为锚点的认知传统，即一种关于生命的叙事逻辑。这种由生命再生产经验孕育的视角，因其更贴近生命的真实需求、更敏感于社会规则与生命规律之间的冲突，从而可能触及更深刻的真相。这不是性别的对立，而是价值逻辑的转换——而这种转换所开启的深刻，恰恰是当下社会最需要的资源。

关键词： 生命叙事；Shift 期刊；占有逻辑；知识生产；叙事转换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recent gender discourse game within the online academic parody community "SHIT Journal" as an entry point to explore how a long-marginalized cognitive approach re-enters the scene. The study finds that when in-depth content brought by certain creators is drowned out by vulgar topics and when an open space gradually forms a closed "internal consensus," another possibility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emerges at the margins—the birth of "Shift Journal." The core argument of this paper is that beyond the "logic of possession" long championed by mainstream value systems, there has always existed a cognitive tradition anchored in "life" itself—namely, a narrative logic of life. This perspective, nurtured by the experience of life reproduction, is closer to the real needs of life and more sensitive to the conflicts between social rules and the laws of life, thus potentially touching upon deeper truths. This is not about gender opposition, but a shift in value logic—and the depth opened by this shift is precisely what contemporary society needs most.

Keywords: Life Narrative; Shift Journal; Logic of Possession; Knowledge Production; Narrative Shift

——

一、引言：从“SHIT”到“Shift”——一场叙事转换的发生

近期，一个名为“SHIT 期刊”的网络社区因其用严肃学术格式探讨荒诞议题的独特风格而获得广泛关注。然而，当几位作者发表的关于“共情社会深刻理解”的论文为该社区带来大量流量后，局面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大量下三滥的话题逐渐涌入，将讨论的焦点从深切的命题转向了个人欲望的发泄。更值得注意的是社区运营者的回应方式：当这些深度内容为社区带来显著流量后，运营者在公开表达中却对这部分贡献及其所开启的讨论方向近乎只字不提。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Shift 期刊”诞生了。这个命名本身就是一个宣言：“Shift”既意味着“转换”，又位于键盘“Ctrl 键”之上——象征着脱离既有控制、重新掌握叙事主权的精神内核。而“When She Shifts, the World Resets”（当她按下 Shift 键，世界将重新启动）等口号，则将这种叙事转换提升到了文明重启的高度。

本文试图追问：为什么“Shift 期刊”的诞生是一种必然？它所代表的那种关于生命的叙事逻辑，何以可能触及更深刻的真相？

二、两种视角：占有逻辑与生命叙事

要理解“Shift 期刊”所承载的认知优势，我们必须回到一个根本性的区分：占有逻辑与生命叙事。

在长期主导社会运转的主流价值体系中，“通过获取、积累、竞争来确立自身价值”往往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目标。这种思维方式可以被称为“占有逻辑”——它关注的是如何更多地拥有：拥有财富、拥有资源、拥有话语权、拥有对他人的影响力。在这种视角下，知识的价值往往被衡量为其能否带来更有效的获取与控制。

然而，在占有逻辑之外，始终存在着另一种叙事方式。这种叙事将生命本身视为目的，而非手段——它关切的是：什么样的条件能让生命更好地存活？什么样的环境能让生命更健康地成长？什么样的关系能让生命更充分地绽放？这种叙事方式，便是本文所称的“关于生命的叙事逻辑”。

这种生命叙事并非来自抽象的道德说教，而是源于一种最基础的人类经验：让生命得以延续和发展的经验。当一个生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被孕育、被照料、被呵护，当一个人日复一日地承担着让生命存活、成长的劳作，她会形成一种截然不同的价值直觉：生命的成长有其自身的节律，无法被强迫；生命的健康需要精微的照料，无法被粗暴对待；生命的价值在于其存在本身，而非其所能带来的占有物。

这种经验孕育的叙事方式，具有占有逻辑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

1. 整体性思维：生命的维系需要诸多条件的协同——健康、情感、关系、环境。因此，秉持生命叙事的人更倾向于看到事物的相互关联，而非孤立的对象。
2. 过程敏感性：生命是一个过程，而非瞬间的占有。生命叙事养成了对过程、细节、变化的敏锐觉察力。

3. 对“冲突”的深刻体认：当社会运转的逻辑（如效率优先、竞争至上）与生命运转的逻辑（如需要呵护、成长有其节律）发生冲突时，秉持生命叙事的人往往是首当其冲的承受者。这种切肤之痛，使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早、更深刻地意识到社会规则的局限与偏差。

三、“SHIT 期刊”案例的启示：一种生命叙事的被淹没与重生

“SHIT 期刊”的演变过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两种叙事逻辑博弈的微观样本。

阶段一：生命叙事的短暂登场。当几位作者发表关于共情与理解的论文时，她们将真实的生命关切引入了戏仿空间。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吸引广泛关注，正是因为它们在荒诞的形式下包裹了真诚的生命思考——读者既能获得娱乐，又能触摸到某种深沉的东西。这些论文的“火”，证明了读者对生命相关议题的内在渴望。

阶段二：议题风向的悄然转变。随着这些深度内容带来的流量增长，社区内的议题重心开始发生微妙变化。原本开放的讨论空间，逐渐被大量下三滥的话题所占据。这些话题虽然在形式上延续了社区的戏仿风格，却将讨论的焦点从深切的命题——如共情、社会理解、生命体验——悄然转向了个人欲望的发泄。严肃的思考被淹没在低级的消遣中，真诚的表达被置换为廉价的快感。

阶段三：话语空间的隐形边界。更值得注意的是社区运营者的回应方式。当生命叙事为社区带来显著流量后，运营者在公开表达中却选择性地聚焦于某些特定类型的议题和参与者，对这部分贡献及其所开启的讨论方向近乎只字不提。这种“选择性看见”实际上划出了一道隐形的边界：某些贡献可以被利用，却难以被真正承认；某些声音可以被听见，却难以成为共同体的有机部分。

这一系列事件揭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当一个本应开放的话语空间逐渐形成某种隐性的“内部默契”时，那些真正带来新鲜视角和深度内容的创作者，反而可能被边缘化。这不是某个个体的刻意为之，而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自我封闭——当一群人过于沉浸于内部的笑点和默契，就容易对外来的、尤其是带来新议题的声音视而不见。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Shift 期刊”的诞生成为一种必然——它要让被淹没的生命叙事重新入场。

四、“Shift 期刊”的使命：让生命叙事重新定义“深刻”

“Shift 期刊”的诞生，不仅是对既有话语空间的回应，更是对更根本问题的回答：什么样的知识值得生产？什么样的深刻值得追求？

1. 价值锚点的转换：从占有到生命

“Shift 期刊”所承载的首要使命，是完成价值锚点的根本转换——从占有逻辑转向生命叙事。

在占有逻辑的支配下，“深刻”往往被定义为对获取技术的精进：如何更有效地积累资源？如何更精巧地扩大影响？如何更高效地实现目标？这些问题并非没有价值，但它们只是人类知识图谱中的一个维度。

而生命叙事所追问的是另一类问题：什么样的社会能让生命更好地绽放？什么样的关系能让心灵更健康地成长？什么样的知识能帮助生命更好地共存？这些问题同样深刻，甚至更加根本——因为没有生命的绽放，一切积累与获取终将失去意义。

“Shift 期刊”正是要为这一类问题提供空间。它不否认占有逻辑所生产的知识有其价值，但它坚持：关于生命的叙事，同样值得被看见、被承认、被认真对待。

2. 认知深度的重新定义：贴近生命即深刻

基于价值锚点的转换，“Shift 期刊”重新定义了“深刻”本身。

在它的视野中，深刻与否的标准不在于话语的艰深、概念的高冷、技术的复杂，而在于是否贴近生命的真实需求。一篇论文是否深刻，要看它能否揭示那些真正影响生命质量的真相——无论这些真相是关于情感的、关系的、社会的，还是关于人与自然的。

这种深刻，往往来自那些长期承担生命再生产劳动的人。因为正是这些人，日复一日地在与生命的直接接触中积累着对生命规律的体认；正是这些人，最痛切地感受着社会规则与生命需求之间的冲突；正是这些人，最迫切地需要一种能够解释自身处境、指引自身行动的知识。当她们书写时，写下的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从经验中蒸馏出的洞见。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女性作为天然拥有再生产能力的生育主体，其身体经验本身便构成了一种与生命叙事的先天亲近——孕育、诞生、哺育的过程，使“让生命活下去”成为刻入骨髓的价值直觉。这种经验并非决定论意义上的宿命，但它确实为理解生命叙事提供了一条无法被替代的通道。当这样的主体执笔书写，她们所生产的知识天然地更倾向于关切生命的存续与绽放，而非单纯的获取与积累。而这恰恰是当下社会最需要的东西——在一个被效率、竞争、占有逻辑驱动得日益碎片化的世界里，那种从生命内部生长出来的关切，那种真正懂得“让生命活下去”意味着什么的深刻，恰恰是我们最稀缺的资源。这不是说其他人无法抵达同样的深刻，而是说，这种经验为深刻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从生命内部生长出来的入口。而这样的入口，或许正是我们重新想象世界所需要的起点。

3. 社群伦理的重构：走向人类共同体

“Shift 期刊”的命名还包含着一种新的社群愿景。“Shift”意味着转换——从封闭转向开放，从排他转向包容，从利用转向赋能。它不满足于建造一个内部圈子，而是向更广阔的“人类共同体”敞开。

这种开放性根植于生命叙事本身。因为生命的经验告诉人们：生命的延续需要合作而非竞争，需要包容而非排斥，需要看见每一个具体的个体而非只接纳与自己相似的人。一个真正能够承载生命的社会，不可能建立在排斥任何群体的基础上。

因此，“Shift 期刊”所追求的，不是简单地颠倒权力关系，而是探索一种真正具有普遍性的共同体伦理——在其中，无论何种背景，只要愿意真诚地关切生命、探索真相，就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它向所有人发出邀请，但前提是：你必须愿意用生命的眼光看待他人。

4. 叙事主体的转换：走过黄昏与黑暗，她们重新握拳书写

最深刻的一点在于，“Shift 期刊”完成了叙事主体的根本转换。

在漫长的历史中，某些人群长期处于被书写的位置——被定义、被描述、被评价、被消遣。他们的故事总是通过他人的笔触呈现，他们的声音总是需要经过他人的过滤。那些真正贴近生命的经验，那些从生命再生产中生长出来的智慧，往往被排除在“知识”的殿堂之外。

但如今不同了。

走过漫长的黄昏与黑暗，走过被消音、被边缘化、被利用的岁月，他们终于重新握拳书写。他们不再等待被纳入某种既有的框架，而是直接创造属于自己的框架；不再乞求被看见，而是直接成为看见的主体。

“走过黄昏与黑暗”这一表述，既是对历史的承认——承认那些被遮蔽、被压抑的漫长岁月——更是对力量的宣告：黑暗已经走过，现在握笔的手充满力量。这支笔写下的是他们自己的真相，是关于生命的叙事，是一个更真实、更深刻、更包容的世界的蓝图。

五、结论：按下 Shift 键，重启世界

本文的分析揭示了一个被长期忽视的可能：在占有逻辑之外，始终存在着一种以“生命”为核心价值的叙事传

宿敌是可以变成妻子的：论男子体育竞技中的 bl 作品及 bl 同人的影响
——一场对体坛“父权文化”的反击

作者：四分之三
单位：霍格沃茨格兰芬多学院

摘要：在男子体育竞技的叙事中，“宿敌”关系始终占据着独特的美学位置。从马龙与张继科的乒坛宿命对决，到动漫作品中亦敌亦友的宿命般的对手，这种“一生之敌”的设定不仅在现实中建构着竞技体育的戏剧性，更在同人女的创作实践中成为 BL（Boys‘ Love）文本的重要素材。为何在粉丝的想象性书写中，竞技场上张力最强的“宿敌”，最易被转化为浪漫化的情感关系？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文化政治意涵？本文试图提出并论证一个核心观点：粉丝对“宿敌”关系的 BL 式解读与创作，并非简单的审美偏执或对同性情感的猎奇式消费，而是一场以想象力为武器的、对体育领域内父权文化的隐秘反击。

关键词：宿敌；男子竞技体育；BL 作品；父权文化；霸权男性气质；生产性受众

第一章：何为宿敌与体坛父权制蓝图

1.1 从“宿敌关系”说起

在竞技体育的叙事谱系中，“宿敌”始终是一种极具魅力的存在。从乒乓球赛场上马龙与张继科的“科龙大战”，到今年热播的冰球题材剧集《巅峰对决》中剑拔弩张的对手关系，再到世界体坛无数为人津津乐道的经典对决：维斯塔潘和勒克莱尔、梅西与 c 罗…这些名字总是成对出现，彼此缠绕，共同书写着体育史的华彩篇章。这种微妙的关系，恰恰构成了“宿敌”最迷人的特质：他们相互成就，彼此唯一。没有伟大的对手，便没有同样伟大的自己。

有趣的是，在粉丝（尤其是被称为“同人女”的女性粉丝群体）的二次创作中，这种竞技场上张力最强的“宿敌”关系，往往最容易被解读、重构为 BL（Boys‘ Love）文本。马龙与张继科的赛场对峙，在粉丝的笔下可以演绎为十余年并肩与对抗的复杂情感；维斯塔潘与勒克莱尔在赛场上的攻防，可以被解读为一场优雅的双人舞；《巅峰对决》中冰球场上拳刃相见的对手，场下也可以是一对热恋的情侣。这一现象并非孤例，而是构成了当代粉丝文化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审美

惯例。

这就引出了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为什么偏偏是“宿敌”？这种以对抗、竞争、胜负为核心的竞技关系，在粉丝的想象性书写中，最容易溢出竞技本身的边界，被转化为浪漫化的、充满情感张力的 BL 叙事？ 一个看似简单的流行解释是“腐眼看人基”，即粉丝群体出于对 BL 题材的偏好，将一切男性关系强行解读为爱情。然而，这一解释既无法说明为何“宿敌”关系在其中具有如此突出的地位，也遮蔽了这一创作实践背后更为复杂的文化政治意涵。

首先，宿敌的首要功能是提供“威胁”。他是主角通往巅峰之路必须清除的障碍，是考验主角成色的试金石。在传统体育叙事中，一个强大的对手之所以被讲述，恰恰是因为他的强大能够反衬出主角的更为强大。宿敌的存在，为核心英雄提供了一个可供度量的标尺和一个必须征服的客体。

其次，在这种叙事中，宿敌的价值是依附性的。他的意义最终指向胜者的荣光。主流体育报道热衷于渲染宿敌之间的恩怨情仇，但这种渲染的终点往往是最终

的“胜利”——大赛的冠军、纪录的刷新、时代的命名。败者的故事固然悲情，但往往只是胜者传奇的注脚。宿敌关系中的复杂情感；尊重、欣赏、甚至某种程度的依赖，可以被讲述，但必须服从于、服务于胜负的终极逻辑。情感可以存在，但不能超越比赛本身；惺惺相惜可以有，但不能动摇对胜利的渴望。

综上所述，在传统体育的父权蓝图中，“宿敌”是一个充满内在张力的角色。他承载着竞技体育最强烈的情感潜能，却又被严格框定在工具性的角色之中；他是威胁，是标尺，是成就王者传奇的垫脚石。他的意义由胜负定义，他的情感被胜利规训。而这，恰恰为粉丝的想象性创作留下了巨大的“反叛空间”：当创作的主体不再接受这套胜负至上的单一叙事，当她们试图在对抗中读出理解、在竞争中读出羁绊、在克制的礼仪背后读出汹涌的情感时，一幅与父权蓝图全然不同的图景便展开了。

1.2:霸权男性气质与体育场域的体现

澳大利亚社会学家 R.W.康奈尔在《男性气质》一书中提出了影响深远的“霸权男性气质”（hegemonic

masculinity）概念。它指的并非简单的男性特质集合，而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和文化语境下，被社会主流所推崇、并服务于维护父权制合法性的理想化的男性气质实践模式。它确立了一种等级秩序：定义了什么是“真正的男人”，并将不符合这一标准的男性气质（以及女性气质）置于从属、边缘的位置。现代竞技体育，恰恰是生产与再生产霸权男性气质最为有效的文化场域之一。布莱恩·普里查德等学者早已指出，体育运动在工业社会中被建构为一套专门培养“男子气概”的仪式化实践。其运作逻辑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首先是力量与攻击性的神化。体育赛场鼓励甚至要求男性展示力量、速度、对抗性与攻击欲。“硬汉”形象被推崇，而示弱、退缩或表达痛苦则被视为耻辱。在冰球场上，打架甚至被默认为比赛的一部分。

其次是竞争与等级的内化：体育的本质被简化为“胜负”——冠军只有一个，记录等着被打破，胜利者赢得一切，失败者沦为背景。这种零和博弈的逻辑，将男性置于永无休止的等级竞争中。正如社会学家迈克尔·梅斯纳所言，体育为男孩和男人提供了一个学习“竞争性个人主义”和“对失败的恐惧”的天然实验

室。

最后输情感的压抑与工具化：在霸权男性气质的规训下，情感表达被严格筛选。狂喜（胜利后的宣泄）和愤怒（对对手的威慑）被允许甚至鼓励，但脆弱、恐惧、失落、对他人的温柔欣赏等所谓“女性化”的情感，则必须被压抑。运动员被训练成“专注比赛”的机器，任何情感的流露都可能被视为软肋。身体被规训、被损耗、被物化，其价值完全由竞技成绩定义。综上，传统体育场域构成了一幅清晰的“父权蓝图”：它生产着一种以力量崇拜、等级竞争、情感压抑为特征的男性气质，将运动员框定在一个狭窄而严苛的角色期待之中。

第二章：BI 如何解构体坛父权—祛魅的三步走

2.1. 从“对手”到“知己”：关系的祛魅

BL 创作对父权叙事的首要解构，体现于对“对手”这一身份本身的祛魅。在传统体育话语中，“对手”是一个功能性的存在，他的全部意义在于“被战胜”。然而，粉丝创作敏锐地捕捉并放大了竞技关系中一个常被主

流叙事遮蔽的维度：最深的理解，往往来自最大的对手。

竞技体育的残酷之处在于，站在对面的那个人，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真正理解你的人。他理解你在凌晨四点半的球馆里重复练习的某个动作，理解你在绝境中仍不放弃的执念，理解你辉煌背后的伤痕与隐痛。因为他和你走在同一条路上，承受着同样的孤独与压力，追逐着同样的荣耀与梦想。那些在飞机上、在酒店里、在训练馆中共同度过的时光，那些对视、点头、擦肩而过的瞬间，在想象力的加持下，编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情感网络。粉丝创作正是通过挖掘这种“被胜负叙事掩盖的共在感”，完成了对“对手”关系的祛魅。在同人文中，赛场上剑拔弩张的对峙，可以被重新解读为两人之间独特的对话方式；那些在采访中不经意流露出的对对方的关注与评价，可以被放大为彼此生命中无法缺席的存在。对抗的表象之下，是深度的理解、持久的凝视，以及某种难以言说的联结。

这一祛魅实践的效果在于：它打破了父权文化下男性之间“非友即敌”的二元隔绝状态。在父权蓝图中，男性关系被严格编码：要么是并肩作战的“战友”，要么是必须击败的“敌人”，情感的复杂性被简化为功能

性的分类。而 BL 创作通过将“对手”转化为“知己”，承认了男性之间深刻情感联结的可能性，并且在想象层面赋予了这种联结以优先性。在某些时刻，站在对面的那个人，可能比站在身边的任何人都更接近你的灵魂。

2.2 从“输赢”到“羁绊”：价值的重估

如果说关系的祛魅改变了“对手是谁”的认知，那么价值的重估则挑战了“竞技为何”的终极追问。父权文化下的体育叙事，将“胜利”确立为唯一的意义尺度：冠军拥有话语权，失败者沦为背景板，竞技的全部价值凝结于记分牌上的数字。而 BL 创作通过对竞技过程的重新讲述，完成了一场对价值序列的颠覆。

在同人文本中，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其意义不再系于最终的胜负结果。粉丝的目光从记分牌上移开，投向比赛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绝境中的一次奋力救球，赛点时的对视，比赛结束后两人同时倒在场地两侧的喘息，颁奖仪式上交错的目光。这些被胜负叙事忽略的瞬间，在 BL 创作中被赋予仪式感：它们不再是通向结果的过程，而是情感交流的节点，是两人“灵魂对

话”的证据。

“和你打过这场比赛”——这句话在粉丝创作中成为一种具有魔力的表达。它所指向的，是一种超越胜负的意义生产：无论输赢，与你共同完成这场比赛本身，就已经构成了某种无法被记分牌捕获的价值。失败不再仅仅是失败，它可以被讲述为悲壮的、美的、充满情感厚度的存在；胜利也不再仅仅是胜利，它可能伴随着对对手的复杂情感：欣赏、尊重，甚至某种程度的亏欠感。竞技的意义被从“结果”中解放出来，重新分布于过程中的每一个情感瞬间。

这种价值重估的效果在于：它动摇了父权文化以“成功”为唯一标尺的价值体系。在父权蓝图中，人的价值由成就定义，失败者是没有资格发声的。而 BL 创作通过对“羁绊”的优先赋值，开辟了一种新的价值评判维度：重要的不仅是“你赢了我”，更是“我们共同经历了这场比赛”。胜负可以分出高下，但羁绊是平等的；冠军只有一个，但比赛属于两个人。这种对“过程”与“关系”的价值重估，在想象层面赋予失败以尊严和美感，也赋予竞技以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意义框架。

2.3 从“压抑”到“释放”：情感的越狱

在父权文化的规训下，运动员的情感表达始终处于一种“失语”状态。“男儿有泪不轻弹”不仅是一句俗语，更是一套严格的情感管理规范：脆弱不可以示人，柔软不可以言说。而 BL 创作恰恰通过对这种情感压抑的“越狱”，完成了对父权秩序最为直接的挑战。

那些在现实中被严格克制的情绪瞬间：赛后拥抱时过于用力的手臂、交错目光中来不及收回的凝视、颁奖仪式上望向对方的那个转瞬即逝的眼神、采访中被问及对手时片刻的停顿、在粉丝的创作中被捕捉、被放大、被赋予语言的形状。同人文用细腻的笔触填充那些被主流叙事留下的空白：输掉比赛后在更衣室独自面对的失落，看到对手受伤时无法言说的担忧，多年后回首往事时对那个“一生之敌”的复杂心绪。这些在现实体育话语中无处安放的情感，在 BL 创作中获得了言说的可能。

更进一步，粉丝创作甚至将这些情感引向一个主流叙事更难以触碰的领域——爱慕。在 BL 文本中，那些惺

惺相惜的瞬间可以被解读为心动的开始，那些长年的凝视与关注可以被重构为爱情的变体。这当然不是对现实中运动员性取向的指认，而是一种象征性的情感越狱，在想象的世界里，让那些被父权规范判定为“不可言说”的情感得以言说，让那些被严格看守的情感禁区得以探索。

这种情感越狱的效果，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文学层面的治疗实践。父权文化不仅压抑人类的情感表达，也剥夺了他们处理复杂情感的语言。愤怒有词，喜悦有词，但“脆弱与柔软”无词可表，因为它不被允许存在。而 BL 创作恰恰为这种无处安放的情感提供了一套话语系统。它想象了一种运动员可以自由表达脆弱、欣赏、依恋乃至爱慕的理想图景，在这种图景中，情感不必服从于性别规范，柔软不再是缺陷，深情不再是禁忌。

综上所述，BL 创作通过关系的祛魅、价值的重估与情感的释放三重路径，对竞技体育领域的父权秩序进行了系统的解构。它不是在现实层面挑战体育规则，而是在想象层面开辟了一个“法外之地”，在这里，对手可以成为知己，羁绊可以超越输赢，情感可以从压抑

中获得解放。这套想象性的解构实践，虽然无法直接改变现实体育的权力结构，但可以为重新定义竞技意义、重新书写“输赢”法则可能提供了宝贵的审美资源。

第三章：反击的主体——谁在看？为何而写？

3.1 女性双重位置的观看者：在迷恋与不适之间

要理解女性粉丝的创作冲动，首先需要还原她们作为“观看者”的独特位置。这是一种充满内在张力的双重位置——既被吸引，又被排斥；既是热忱的观众，又是潜在的异议者。

一方面，女性观众同样被竞技体育本身的“力与美”所捕获。运动员身体在极限状态下爆发的力量、技巧与美感，比赛进程中戏剧性的张力与悬念，以及那种人类挑战生理与心理极限的崇高感——这些元素对任何审美主体都具有普遍的吸引力，不论男女。女性粉丝对体育的热爱是真实的，她们同样为精彩的进球欢呼，为绝杀的时刻落泪，为运动员的拼搏精神所震撼。

但另一方面，女性观众又时常感受到一种来自场域本身的“排斥感”——一种难以言说的、被置于“外部”的不适。一方面，她们是体育文化的深度参与者，拥有不亚于任何男性球迷的专业知识；另一方面，她们又始终被主流体育话语建构为“局外人”，其观看位置和情感体验不断遭受质疑与排斥。

首先是局内人的知识。与某些刻板印象相反，大量的女性体育迷对竞技规则、运动员履历、赛事历史有着深入的了解。马龙与张继科的“科龙大战”之所以能激发如此丰富的创作，前提正是创作者对两人十余年交锋史的熟稔——哪一年哪场决赛，谁在哪个赛点拿下胜利，赛后两人有过怎样的互动，这些细节构成了创作的素材库。换言之，同人女的创作是建立在扎实的体育知识基础之上的，而非对竞技本身的漠视或误读。

然而，与这种专业知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她们在体育话语场域中始终被建构的局外人感受。当一个女性球迷在论坛上讨论战术时，可能遭遇的回应是“女生也看得懂球？”；当她们在社交媒体上表达对某位运动员的欣赏时，可能被嘲讽为“颜粉”或“花痴”；当她

们尝试以情感化的方式讲述自己对比赛的理解时，可能被斥为“腐眼看人基”或“玷污竞技的纯粹性”。这种持续不断的质疑，构成了一种知识合法性的剥夺——即使你懂得所有的规则，你的观看方式依然不被承认为“正当”的观看。

更值得玩味的是，这种局外人感受在特定事件中会被进一步激化为直接的对抗。一个典型案例是在米兰冬奥会期间发生的事件：特朗普与美国男子冰球队对美国女子冰球队进行嘲讽，即使女子冰球队同样获得了冠军，但在特朗普和男冰那些个“manchild”眼里，她们只是男子冰球队的附属品。这一行为随即引发了大量女性球迷的集体抵制，其中许多都是因为《巅峰对决》这一“反父权”的 bl 作品入坑的人。这一事件戏剧性地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即使女性观众，甚至是女性运动员，为冰球运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度和商业价值，她们依然被这个场域中的部分男性视为“他者”，其热情和贡献可以被轻蔑地一笑置之。那一刻，许多女性观众深切感受到：这个名为“体育”的空间，其“爹味”并未因为我们的涌入而消散，它只是在多数时候对我们保持沉默，而随时可能翻脸。

正是这种双重位置——拥有知识却被剥夺合法性，投入热情却不断被提醒“你不属于这里”——构成了同人女创作实践的文化土壤。她们对体育的爱是真的，但在这个场域中感受到的疏离和压抑也是真的。如何安放这份爱，同时又应对这种压抑？创作成为一种可能的答案。

3.2 作为“盗猎者”的创作实践：从堡垒到花园

米歇尔·德·塞托在其日常生活实践理论中提出了“盗猎”（poaching）的概念——指弱势群体在强势文化场域中进行的“挪用式”消费实践。他们无法创造自己的文本，却可以通过选择性的挪用、重构与再阐释，在主导文化的领地上开辟属于自己的意义空间。约翰·费斯克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生产性受众”的概念，强调受众不是被动的文化消费者，而是能从主流文本中“生产”出属于自己的意义的能动主体。

用这一理论视角观照女性粉丝的 BL 创作，其文化政治的意涵便豁然开朗：她们“盗取”了父权文化最坚固的堡垒——男子体育，然后用想象力在里面种下自己的花。

男子体育何以是“最坚固的堡垒”？因为它在父权文化的版图中占据着特殊的象征地位：它是“纯正男性气质”的最后庇护所，是女性被明确或暗示“不得入内”的禁区，是那个“真正的男人”被生产与展演的仪式场。如果说家庭、职场等领域已经不同程度地被女性力量渗透，体育，尤其是男子竞技体育，仍然是父权话语最顽固的飞地。正因如此，对这一场域的“盗猎”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它不仅是创作，更是对禁区的闯入；不仅是想象，更是对领地的占领。

那么，粉丝在这片盗来的土地上，种下了什么样的“花”？如前章所述，她们种下的是对男性关系的新想象——一种不同于父权蓝图的、可以被情感深度所定义的联结。但更重要的是，这些花所呈现的，并非对“男同性恋”的现实主义再现，而是对理想的人类关系与情感模式的投射。

这是一个关键的分辨。当同人女书写马龙与张继科、及维斯塔潘和勒克莱尔时，她们并非试图“还原”这些真实或虚构人物的性取向，更不是在进行某种“同性恋宣传”。她们所做的是：借用这些角色的身体与故

事，寄托自己对一种“摆脱了父权束缚的情感关系”的想象。在这种想象中，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表达脆弱而不被视为软弱；可以深情地凝视对方而不被质疑性取向；可以彼此承认“你对我而言是特别的存在”而不必附加胜负的条件。这种关系中的核心价值：理解、羁绊、情感的坦诚，恰恰是父权文化在日常现实中系统性地拒绝给予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BL 创作与其说是关于“男同性恋”的叙事，不如说是关于“另一种男性气质”的乌托邦实验。它试图回答一个问题：如果人不必活在“霸权男性气质”的牢笼里，他们之间可以拥有怎样的关系？女性粉丝以自己的方式，为人们想象了一条逃脱父权规训的出路——而这条出路，也映照着她们自己逃脱父权压迫的渴望。

3.3 书写他人，亦是书写自我

于是，一个更深层的真相浮现出来：女性粉丝书写男性的情感，最终也是在书写自己的情感；她们想象男性的逃脱，也是在想象自己的逃脱。

当同人文中描绘一个运动员在输掉比赛后独自垂泪的脆弱时刻，那不仅是对“男性可以流泪”的想象，也是对“人可以被允许脆弱”这一普遍权利的坚持。当文本中细腻呈现两人之间无法言说的深情与羁绊，那不仅是对同性关系的探索，也是对任何一种“不被主流认可的情感”的辩护。当粉丝们在评论区为“他们终于亲上了”而欢呼，那不仅是对 CP 发糖的喜悦，也是对人类能够冲破规训、自由表达情感的深层渴望。

女性粉丝在父权文化中受到的压迫：被质疑、被排除、被物化、被噤声，在 BL 创作中得到了某种形式的“象征性补偿”。在想象的世界里，她们让那些被禁止的情感得以言说，让那些被压抑的关系得以绽放，让那些被规训的身体得以自由。而这一切，最终都指向一种对“更好世界”的期待——在那个世界里，情感不必服从于性别，关系不必服从于规范，人不必为了符合某种“气质”而切割自己的一部分灵魂。

因此，这场由女性粉丝发起的“审美反击”，其政治意涵正在于此：它不是对现实体育体制的直接挑战，也不是对性别秩序的革命性颠覆，但它开辟了一个想象力的飞地。在这片飞地中，被父权文化分割、隔离、

对立的人们，无论男女，得以窥见另一种可能的风景：一种更自由、更柔软、更具包容性的人类联结方式。而这，正是反击之所以可能的起点。

第四章：总结——一场温柔的叛乱

4.1 想象性抵抗：从被动接受到意义创造

纵观全文，我们尝试勾勒一幅关于“反抗”的文化图景：在男子竞技体育这片被父权话语严密编码的场域中，以女性为主的粉丝群体通过对“宿敌”关系的 BL 式重写，展开了一场温柔而有力的意义争夺战。这场争夺并非发生在现实层面——它无法改变体育赛事的规则，无法动摇职业体育的权力结构，甚至无法直接回应那些“你真的看得懂吗”的质疑。然而，它在另一个层面，审美的、想象的、情感的层面，开辟了一片属于她们自己的领地。

在这片被称为“同人”的审美飞地中，观众不再是主流叙事的被动接受者。她们不再全盘接受“胜利就是一切”的价值灌输，不再满足于“对手就是敌人”的关系定义，不再认同“男性情感必须克制”的表达规

范。相反，她们成为主动的意义创造者：用想象力重新编织竞技场上的故事，用自己的语言重新定义“重要”与“有价值”的事物。在她们的故事里，最珍贵的不是记分牌上的数字，而是两人共同完成的每一次交锋；最动人的不是冠军的加冕，而是赛后那一个用力的拥抱；最深刻的不是“我赢了你”，而是“这世界上只有你最懂我”。

这是一种想象性抵抗——它不直接摧毁城墙，却在城墙内种满鲜花；它不正面挑战权力，却用无数个私人的、微小的意义生产，悄悄侵蚀着单一叙事的合法性。正如德·塞托所言，弱势群体的反抗往往不是通过正面进攻，而是通过“千万种漫步于他人强加秩序之中的方式”。同人女的创作，正是这样一种“漫步”——在父权最坚固的堡垒里，她们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小径。

最终，这些故事汇聚成一个共同的宣言：人与人之间的深刻联结，终将战胜冷冰冰的输赢法则。这不是对竞技体育的否定，而是对它的重新赋义——竞技的意义，不仅在于分出高下，更在于创造出那些超越胜负的、人与人之间的真实相遇。

4.2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文试图在“宿敌 BL”这一特定切口下，论述粉丝创作对父权文化的解构意涵。然而，这一视角本身也意味着某些维度的必然省略，需要在结尾处予以说明并留待未来探讨。

首先，因为主题为“竞体 BL 的创作”，关于竞体 GL（Girls‘ Love）同人并未在文本中进行探讨，对百合热爱者们（包括笔者本人）说声抱歉。本文聚焦于男子竞技体育，但女性运动员之间的同人创作同样是值得关注的重要现象。必须承认，这一选择并非因为 GL 同人不重要，恰恰相反，女子体育本身已经构成对父权文化的反抗，女性运动员站上赛场、挥洒汗水、争夺荣誉，本身就是对“女性是第二性”这一父权预设的挑战。因此，在女子体育的粉丝文化中，“单推选手”的情况较为常见——粉丝以欣赏和崇拜的姿态关注运动员个体，而不必然需要借助 BL 式的想象来解构父权。同时，女子体育的整体氛围也更为包容，爹味较淡，LGBTQ+运动员的可见度更高，在国际体坛，已有众多女性运动员公开性取向并与伴侣登记结婚。这些差异意味着，

女子体育中的 GL 创作，其文化政治意涵可能需要一套不同于本文的分析框架，但也有所重合，比如花滑的“梅杂”组合也是一款美味的宿敌。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日本动漫文化中，男子体育番的“对位”作品往往是女子乐队番，音乐题材成为女性情感叙事的另一重要载体。那么一部“GL 版的《巅峰对决》”，或许更应该被放置在音乐题材而非体育题材的脉络中。这些差异，值得未来研究专门展开。

其次，关于“搭档”叙事的省略。本文重点考察的是“宿敌”这一关系类型，但在体育同人创作中，“搭档”同样是重要的叙事资源。从双打组合到队友关系，从并肩作战到相互成就，“搭档”提供了不同于“宿敌”的情感图景——它关乎信任、配合与长期的共处，关乎“我们”而非“我和你”，甚至有时候，搭档和宿敌是同一个人。这种关系如何被粉丝想象与重构？它与“宿敌”叙事构成怎样的对话与补充？这些问题同样值得深入探讨。

4.3 尾声：故事从未终结

在 2026 年的今天，当《巅峰对决》这样的作品能够引发广泛的社会讨论，当女性观众的声音越来越难以被忽视，当越来越多的运动员开始公开谈论心理健康、情感与脆弱，我们看到，现实正在一点点地向想象靠近。

或许，这正是“温柔的叛乱”最终的意义：它不是在终点等待我们的胜利，而是在起点推动我们前行的力量。每一次书写，都在为另一种可能的未来添砖加瓦；每一次阅读，都在与志同道合的灵魂隔空相握。故事从未终结，因为总有新的故事在被讲述。
行文至此，或许应该回到一切的原点：同人创作的根本精神是什么？

在 Archive of Our Own（AO3）——全球最大的同人创作存档库的首页，醒目地悬挂着一句标语：“敬文学，敬热爱，敬自由”。这九个字，凝练地概括了同人实践的核心价值。即使是最坚固的堡垒，也挡不住想象力的渗透；即使是最冰冷的胜负逻辑，也锁不住情感的生长。当无数女性粉丝在深夜的电脑前敲下那些关于“他们”的故事时，她们其实也在书写着自己——自

己对更好关系的渴望，自己对更自由世界的想象。而这份渴望与想象本身，已经是一朵在父权堡垒的裂缝中顽强绽放的花。

敬文学，敬热爱，敬自由。

敬所有在深夜里写作的人，敬所有在缝隙中寻找光的人，敬所有相信人与人之间可以有不同的联结方式的人。

敬这场永不终结的、温柔的叛乱。

从耽美到同人：性权力主体的转移与女性欲望的叙事重构

掉进粪坑的大棉袄

摘要:耽美小说与同人文化作为“女性向”网络文学的重要形态，其发展演变折射出女性读者性别权力意识的深刻变迁。本文通过对耽美小说二十年发展历程的梳理，揭示其从“双强”人设到“美强惨”受的流行，再到叙事模式逐渐与言情小说趋同的演变轨迹。在此基础上，结合精神分析与性别权力理论，分析这一演变背后所隐含的性权力主体转移机制：当虐恋桥段从女性身体转移到男性主体时，天然形成的性别保护使女性读者能够安全地共情于强者的困境，并从中获得面对现实的精神力量。当耽美创作日益标签化、扁平化后，女性读者将凝视的目光转向同人创作，在“同人嬷嬷”文化实践中继续建构理想化的自我形象。这一文化迁徙的本质，是女性在符号系统中不断寻找和重构主体位置的精神历程。

关键词：耽美小说；同人文化；性权力；女性凝视；精神分析

一、引言

新世纪以来，以女性为主要创作和接受群体的“女性向”网络文学蓬勃发展，其中耽美小说以其独特的性别设定和叙事美学，从亚文化边缘逐渐进入主流视野。然而，耽美小说并非一成不变的文化景观——从早期追求“强强”碰撞的叙事张力，到“美强惨”受成为主流人设，再到当下大量作品被读者批评为“披着耽美外衣的言情小说”，其流变轨迹清晰可辨。与此同时，同人创作异军突起，“同人嬷嬷”们以极高的创作热情，在各种原创与衍生文本中发掘和建构男性角色之间的情感联结。

这一“由盛转衰”到“文化迁徙”的现象，不能简单归结为创作质量的下滑或读者口味的更迭。本文试图论证，耽美小说的叙事演变与同人文化的兴盛，共同指向一个更深层的文化逻辑：性权力主体的转移。女性读者在耽美文本中尝试将男性置于被凝视、被书写的客体位置，当这一尝试遭遇叙事模式的固化与权力的再度失衡时，她们转向更具主体性的同人创作，继续在符号层面完成对理想自我形象的追逐与建构。

二、双强乌托邦：耽美小说的兴起与性别实验

2.1 作为性别突围的叙事选择

耽美小说在中国的兴起，有着深刻的社会心理动因。有研究者指出，“从言情小说的读写转向耽美小说的读写，实际反映了‘同人女’对传统女性形象的不认同，以及她们面对社

会认同与自我认同不一致时的焦虑”[①]。在传统言情叙事中，女性角色往往难以逃脱被凝视、被定义的命运，即便是在所谓“大女主”文本中，女性的价值也常常需要通过与男性的关系来确证。

耽美小说提供了一种激进的解决方案：将女性从文本中心彻底驱逐，转而书写两个男性之间的爱情。这种“去女性化”的叙事策略，并非女性读者的自我抹除，而是一种迂回的突围——通过回避那个承载了过多社会规训的女性符号，在想象界中开辟出一块相对自由的飞地[②]。正如有学者所言，耽美小说“通过各种各样的幻想抚慰女性焦虑，也通过去性别本质主义设定，从源头上抹除现实男女不平等的生理根源，将小说世界刻画为全是男人的世界”[③]。

2.2 强强叙事的革命性意义

早期耽美小说最具革命性的特质，在于其对“强强”人设的执着追求。一位有十五年网文阅读经验的读者回忆道：“早年言情小说里主角的人设，总是男强女弱，即使是刁蛮任性大小姐那款，也总有个更酷炫狂霸拽的男主压制。而耽美可能因为两个主角都是男生的原因，很多优秀的小说都能写出强强碰撞的火花与张力，这在当时的言情文里基本是看不到的。”[④]

这种“强强”设定，实质上是女性读者对平等权力关系的想象性建构。在现实的两性关系中，女性往往难以获得与男性对等的主体地位；而在耽美文本中，通过将两个主角都设定为生理男性，作者得以暂时搁置现实中的性别权力落差，专注于两个平等主体之间的情感角力与灵魂共鸣[⑤]。正如《中国妇女报》的相关研究指出，“随着性别平等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耽美读者不满于女性在异性恋关系中的弱势地位，开始反思传统强攻弱受文所制造的性别刻板印象与不平等权力关系”[⑥]。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强强”叙事满足了女性读者对理想自我的投射需求。两个强大男性的形象，成为读者潜意识中渴望成为的理想化自我的化身。他们在文本中纵横驰骋、势均力敌的爱情博弈，象征着一种不受性别规训束缚的自由存在状态。

---

① 潘彦伶.耽美小说:在文本媒介中实现性别认同突围[J].美与时代(下), 2020(1):89-91.

② 吴寒劲.异托邦的建构：中国大陆网络原创耽美小说研究（2001-2015）[D].国立清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

③ 吴寒劲.异托邦的建构：中国大陆网络原创耽美小说研究（2001-2015）[D].国立清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

④ 一罐野樱.“耽美就是换皮的言情”和“直女爱看耽美是因为 i 男”我都不太同意[OL].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283968657/?_i=0996252Ur3cBA4,2799201tkBfNUh

⑤ 薛英杰.平等之爱：耽美强强文的崛起与女性诉求的转型[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21(5).

⑥ 薛英杰.平等之爱：耽美强强文的崛起与女性诉求的转型[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21(5).

三、美强惨的流行：苦难转移与性别保护机制

3.1 从“强强”到“美强惨”的叙事演变

然而，耽美小说的“强强”理想并未能持久维系。随着创作群体的扩大和市场的商业化，一种新的角色设定逐渐成为主流——“美强惨”受。所谓“美强惨”，意指容貌美丽、能力强大但命运悲惨的角色。与早期“双强”中攻受双方势均力敌的设定不同，“美强惨”受虽然保留了强大的能力设定，却在情感和命运层面处于被动承受的位置。

这一演变并非偶然。从叙事逻辑来看，“美强惨”设定能够在保留角色“强”的魅力值的同时，引入“虐”的情感张力，从而最大化读者的情感投入。一位读者在讨论中指出，耽美文里的人设一般都会非常好，“非常美强惨，让人印象深刻，很容易转化成角色粉”[①]。这种“角色粉”现象，暗示着读者与角色之间建立了一种深度情感联结——不是简单的代入或欣赏，而是一种混合了怜爱、崇拜与共情的复杂情感。

3.2 虐恋桥段的性别转移与意义重构

“美强惨”设定的深层意义，在于它对“虐”这一叙事元素的重新编码。在中国网络文学传统中，“虐女”一直是言情小说的核心叙事模式——女主经历种种磨难、痛苦与牺牲，最终获得爱情的圆满。然而，这种叙事模式在近年来越来越受到读者质疑，因为它不自觉地再生产了女性在现实中承受苦难、忍辱负重的性别角色期待。

耽美小说通过将“受虐”主体从女性转移到男性，完成了一次巧妙的符号置换。有学者在研究耽美小说中的“强迫文”时指出，这种类型文“提供了一条很有意思的思路”。当虐恋情节发生在两个男性角色之间时，读者的情感体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她们不必再承受作为女性阅读“虐女”情节时那种隐痛与不适，而是可以相对纯粹地欣赏角色在困境中的挣扎与超越。

更值得深思的是，这种性别转移激活了一种独特的“性别保护机制”。正如有论者从福柯的观点引申的那样，在人类文化中，“性器官或者性征的意义被放大了”，女性的性器官“过度承载了意义”。女性在遭受性暴力、性伤害时是完全无助的，“因为女性根本不可能像男性一样实施强奸”。而在耽美小说中，“男性对男性的性伤害，不过是一种身体部位的伤害，而不是对性器官的伤害，所以这种关系反映的并非性权力上的不平等，而是经济、政治、体质等方面的不平等”。这意味着，当苦难从女性身体转移到男性身体时，那些附着在女性身体上的沉重文化意义被暂时悬置了。

---

① 一罐野樱.“耽美就是换皮的言情”和“直女爱看耽美是因为 i 男”我都不太同意 [OL].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283968657/?_i=0996252Ur3cBA4,2799201tkBfNUh

3.3 强者的困境：精神分析视角下的共情机制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读者对“美强惨”角色的共情，遵循着一种特殊的心理机制。一方面，角色的“强”使其成为读者理想自我的投射对象；另一方面，角色的“惨”又激活了读者的同情与保护欲。这种既仰望又怜惜的双重情感，恰恰是“角色粉”情感结构的核心。

更重要的是，“美强惨”角色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情感实验场。读者可以跟随角色一同经历极致的痛苦与挣扎，但同时又确信——因为角色足够强大——他终将凭借自身能力走出困境。这种叙事模式传递出一个深具抚慰力的信息：即使身处绝境，真正的强者依然能够杀出重围、逆风翻盘。对于在现实生活中面临各种困境的女性读者而言，这一信息具有不可低估的心理支持作用。她们在角色的痛苦中看见自己的挣扎，又在角色的强大中看见自己的潜能。

四、趋同与危机：耽美叙事的标签化及其后果

4.1 攻强受弱：传统权力结构的隐秘复归

然而，随着耽美创作的商业化与类型化，“攻强受弱”的设定逐渐取代早期的“双强”理想，成为市场主流。这种设定表面上延续了耽美小说的性别设定，实质上却在悄悄复刻传统言情中“男强女弱”的权力结构——只不过将“男”换成了“攻”，将“女”换成了“受”。

一位资深读者痛切地指出：“现在很多耽美文里受完全性转女性都毫无违和感，所以现在的耽美越来越差了。”[①]这种“性转无障碍”的现象，意味着耽美小说正在丧失其最初的革命性——它不再是两个平等主体之间的爱情博弈，而是披着男性外衣的传统罗曼司。攻占据传统男性的强势位置，受则承担传统女性的弱势角色，两人之间的关系模式与言情小说别无二致。

这种演变并非偶然。市场经济的逻辑天然倾向于复制已被验证成功的叙事模式，而传统性别脚本恰恰是最为成熟、最易复制的叙事资源。当耽美小说日益商业化、产业化，它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主流性别意识形态的收编，逐渐丧失其作为“性别实验场”的异质性。

4.2 “披着耽美外衣的言情”：女性主体的再度隐退

“披着耽美外衣的言情”这一批评话语的流行，折射出女性读者对耽美小说日益同质化的敏锐感知。当受方被塑造成“披着男性性别的女性”时，耽美小说最初的性别实验意义便被消解了——女性读者并没有获得新的主体位置，而是重新被推回那个她们试图逃离的性别脚本。

---

① 一罐野樱.“耽美就是换皮的言情”和“直女爱看耽美是因为 i 男”我都不太同意[OL].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283968657/?_i=0996252Ur3cBA4,2799201tkBfNUh

有学者从“异托邦”的角度分析了耽美小说的演变。他们认为，耽美小说原本是“一个由女性自主建构的异托邦空间”[①]，在这个空间里，女性可以“自主解构过去关于性别、爱情、婚姻、家庭、个人对社会甚至世界的看法，并通过‘设定’这一途径将它们重構”[②]。然而，当耽美叙事日益趋同于言情，这个异托邦空间便面临着被主流意识形态重新殖民的危险。

从女性主体建构的角度看，这一演变意味着女性读者再次失去了在符号系统中占据主体位置的机会。在“攻强受弱”的叙事模式中，女性读者既无法像在言情小说中那样代入女主角（因为文本中根本没有女主角），又难以真正代入那个被设定为“受”的男性角色（因为那个角色实际上被写成了女性）。这种双重无法代入的状态，使读者陷入了一种尴尬的悬置——她们在文本中找不到可以安放自我的位置。

4.3 标签化写作与想象力的贫瘠

与权力结构的保守化相伴而生的，是耽美创作的标签化与扁平化。早期耽美小说之所以能够吸引大量读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涉及到了很多新颖的题材，如高干、刑侦、体育等，一下子把网文的题材面拓宽了很多，同时也创新了很多新的梗和套路”[③]。然而，随着创作数量的激增和商业逻辑的强化，耽美创作日益陷入套路化的窠臼——人设可以贴标签（傲娇攻、忠犬攻、女王受、炸毛受），情节可以套模板，真正具有原创性的作品越来越少。

这种标签化写作的背后，是想象力的贫瘠与读者需求的异化。读者不再追求新鲜的叙事体验，而是在熟悉的人设和套路中寻求安全感与满足感；作者不再探索新的可能性，而是按照市场反馈不断复制已被验证的成功配方。当耽美创作陷入这种循环，它便失去了最初那种“发现新大陆”的魅力，日益沦为可预测、可批量生产的文化商品。

五、同人嬷嬷的崛起：性权力主体的彻底转移

5.1 从原创到衍生：女性凝视的转向

当原创耽美日益失去其革命性，女性读者的目光开始转向另一个领域——同人创作。同人文化并非新生事物，但其在近年来的蓬勃发展，尤其是“同人嬷嬷”这一文化身份的形成，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变：女性读者不再满足于消费现成的文本，而是主动参与文本的生产与重构。

---

① 吴寒劲.异托邦的建构：中国大陆网络原创耽美小说研究（2001-2015）[D].国立清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

② 吴寒劲.异托邦的建构：中国大陆网络原创耽美小说研究（2001-2015）[D].国立清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

③ 一罐野樱.“耽美就是换皮的言情”和“直女爱看耽美是因为 i 男”我都不太同意[OL].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283968657/?_i=0996252Ur3cBA4,2799201tkBfNUh

从媒介消费的角度看，同人创作体现了阅听人主体性的高度自觉。有研究者将腐女的“萌”阐释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将结构转化为拟像男性，第二个层次是从结构性的互动中发现书写的契机，第三个层次是依照契机所呈现的符号来对结构进行书写，以此颠覆二元对立结构”[①]。这种“萌”的实践，正是同人创作者主体性的集中体现——她们不是被动接受文本，而是按照自己的“意图、喜好、倾向来编造、扭曲、转化性别/文本结构”[②]。

5.2 资料库盗猎：同人创作中的权力翻转

同人创作与原创耽美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它始终处于与主流文本的对话关系之中。正如亨利·詹金斯在《文本盗猎者》中所阐述的，同人创作是一种“盗猎”行为——粉丝从主流文化塑造的文本中“盗取”自己喜爱的角色和设定，按照自己的想象重新书写他们的故事[③]。

这种“盗猎”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主流文化中的男性角色，原本是为满足男性观众的欲望而塑造的——他们是英雄、战士、救世主，是力量与勇气的化身。同人女作家将这些角色“盗取”过来，将他们置于同性爱情的叙事框架中，使他们成为女性凝视的客体。有论者精辟地指出，当男性读者还在纠结“杨威利和莱因哈特到底谁比较强”的时候，女性读者已经在津津乐道地研究“青梅竹马能否敌得过天降男男”。两种阅读方式的差异，折射出两种性别截然不同的欲望模式——男性倾向于“资料库消费”，直接消费角色的属性；女性倾向于“关系图消费”，在角色的关系中寻找意义与快感[④]。

同人创作的意义不仅在于它翻转了凝视的主体与客体，更在于它创造了一种新的欲望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女性欲望不再是对某个固定客体的占有，而是在两个角色之间流动的、观察性的、建构性的欲望。这种欲望模式更复杂、更间接、更慢速，但它恰恰赋予了女性更大的主体空间——她们不是在既定的欲望结构中寻找位置，而是在创造新的结构。

5.3 嫘嫘文化的心理机制：痛苦共情与理想自我

“同人嫘嫘”这一略带自嘲色彩的称谓，浓缩了这种新型文化身份的多重意涵。“嫘嫘”二字既暗示着一种母性的包容与守护——为自己的“崽”（喜爱的角色）付出一切、操心一切；又暗示着一种对苦难的迷恋——嫘嫘们往往热衷于置换角色性别进行泥塑，让角色经历各种磨难，在痛苦中淬炼其灵魂。

---

① 何雨蒙,陈婷玉.腐女的欢愉——萌[C].台湾传播学会 2014 年年会论文.
② 何雨蒙,陈婷玉.腐女的欢愉——萌[C].台湾传播学会 2014 年年会论文.
③席德. BL 同人的女权意义：在男性凝视的世界里暗度陈仓
[OL].https://www.douban.com/note/688018692/?type=like&start=300&_i=2799810tkBfNUh
④ 席德. BL 同人的女权意义：在男性凝视的世界里暗度陈仓
[OL].https://www.douban.com/note/688018692/?type=like&start=300&_i=2799810tkBfNUh

这种看似矛盾的情感结构，其实有着清晰的心理逻辑。嬷嬷对角色的爱，是一种混合了保护欲与崇拜欲的复杂情感。她们既想守护角色、不让角色受委屈，又想看到角色在绝境中绽放光芒。这种情感，与母亲对孩子的爱有着结构性的相似——既希望孩子永远平安喜乐，又知道孩子必须在磨难中成长。

更深一层看，嬷嬷文化中的“痛苦共情”机制，是女性读者处理自身与现实关系的一种象征性实践。通过让理想化的角色经历并超越痛苦，她们在想象中完成了对自己现实困境的象征性克服。角色的强大，成为读者潜意识中渴望成为的理想化自我的投射；角色的痛苦，成为读者现实痛苦的隐喻性表达；角色的超越，成为读者面对现实的精神支撑。这种文化实践的意义实际上是在与角色的痛苦共情的同时，让纸片人的强大成为自己潜意识渴望追逐和成为的理想化自我形象，从而拥有更多面对生活和现实的勇气。

从性权力主体的角度看，嬷嬷文化的兴起标志着这一转移的流动性完成。在原创耽美中，女性读者还需要通过作者的中介来凝视男性角色；在同人创作中，她们直接成为意义的生产者，按照自己的欲望重构角色和故事。权力主体从“书写者”转移到了“二次创作者”，从“消费端”转移到了“生产端”。这一转移，使女性真正成为性权力关系中的主体——不是被动接受既定的欲望结构，而是主动创造属于自己的欲望模式。

六、结语：在符号废墟上重建主体

耽美小说从“双强”到“美强惨”再到与言情趋同的演变，以及同人文化的蓬勃发展，共同勾勒出近二十年来女性向网络文学的一条隐秘脉络。这条脉络的核心，是女性读者对性权力主体位置的持续追寻。

当耽美小说初兴时，它通过将女性从文本中驱逐、代之以两个平等男性的爱情，为女性读者提供了一个暂时摆脱性别规训的想象空间。当“美强惨”成为主流时，女性读者通过将虐恋从女性身体转移到男性身体，激活了一种“性别保护机制”，使她们能够安全地共情于强者的困境，并从中获得面对现实的力量。当耽美创作日益标签化、权力结构再度失衡时，女性读者将目光转向同人创作，在“资料库盗猎”中彻底翻转了凝视的主体与客体，成为意义的主动生产者。

这一文化迁徙的轨迹，印证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在父权制的符号秩序中，女性始终难以找到完全安放自我的位置。她们不断建构新的文本空间，不断尝试将男性置于被凝视的客体位置，但这些空间总是面临着被主流意识形态重新殖民的危险，这些尝试总是难以逃脱权力结构的再度失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她们的尝试是徒劳的。每一次建构都留下了可供后来者利用的符号资源，每一次失败都为下一次尝试提供了经验教训。

从这个意义上说，耽美小说与同人文化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们提供了多少可供消费的文娱产品，更在于它们见证了中国女性在符号世界中寻找主体位置的艰难历程。这条道路充满曲折与反复，但方向始终清晰——在一个不断将她们客体化的世界里，成为自己欲望的主体。

参考文献

[1] 潘彦伶.耽美小说:在文本媒介中实现性别认同突围[J].美与时代(下),2020(1):89-91.

[2] 吴寒劲.异托邦的建构：中国大陆网络原创耽美小说研究（2001-2015）[D].国立清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

[3] 薛英杰.平等之爱：耽美强强文的崛起与女性诉求的转型[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21(5).

[4] 廖淳曼.台湾 BL 小说及女性凝视的建构[D].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

[5] 何雨蓁,陈婷玉.腐女的欢愉——萌[C].台湾传播学会 2014 年年会论文.

[6] 肖映萱.“女性向”网络文学的性别实验——以耽美小说为例[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8):39-46.

[7] 郑丹丹,吴迪.耽美现象背后的女性诉求——对耽美作品及同人女的考察[J].浙江学刊,2009(6):214-219.

[8] 朱丽丽,赵婷婷.想象的政治:“耽美”迷群体的文本书写与性别实践[J].江苏社会科学,2015(6):202-208.

[9] 亨利·詹金斯.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10] 劳拉·穆尔维.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A].吴琼编.凝视的快感[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11] 每一位不断探索着创作与自由的女作家和同人女，或许我不吃你的产品，但我坚决捍卫你创作的权利，祝大家都能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

虚拟亲密关系的契约与崩塌：男团偶像恋爱传闻对粉丝情感影响的质性研究

——男爱豆到底能不能谈恋爱：真的是粉丝错了吗？

摘要

随着 K-pop 文化的全球盛行，男团偶像及其粉丝群体构成了当代独特的文化现象。偶像恋爱传闻往往会引发粉丝群体的剧烈反应，这一现象常被简化为“粉丝不理智”的刻板印象。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粉丝抵制偶像恋爱的深层动因。通过文本分析与观察法，研究发现粉丝与偶像之间建立了一种基于情绪劳动与情感投射的“虚拟亲密关系”。粉丝的反对并非单纯的占有欲，而是根植于“情感契约”的破裂、“沉没成本”的损失、群体动力的放大效应以及自我投射的崩塌。本研究认为，粉丝的情感反应具有其内在逻辑与社会心理根源，值得被正视与理解。

关键词：

男爱豆；塌房；情感契约；沉没成本；粉丝心理；偶像产业；准社会交往；Kpop

引言

时代更迭，人们的娱乐消费方式日趋多元化。社交媒体平台的兴起，让无数精致面孔得以跨越地域限制，进入大众视野。与此同时，音乐产业的全球化创新，尤其是韩国 K-pop 文化的席卷式传播，催生了“偶像”这一新兴职业的繁荣。男团、女团纷纷涌现，在全球范围内构建起庞大的粉丝经济帝国。

偶像本质上是娱乐工业资本精心打造的“情感商品”，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以 SM、

JYP 等韩国头部娱乐公司为例，其旗下男团创造的营收高达数千万至亿韩元，足见其市场号召力。

那么，粉丝究竟为何买单？核心在于“情绪价值”。偶像出道前即被公司包装为“完美男友”的典范——优越的外形、温暖的性格、舞台上的魅力，加上“国民男友”的营销话术，精准满足了女性粉丝对理想伴侣的幻想。正因其“单身人设”，粉丝得以在精神世界将其视为专属的情感寄托，从而获得强烈的情绪代偿与心理满足。这也让粉丝沉溺其中不可自拔，甚至超越了谈现实恋爱，形成了一种**情感代偿**，彻底沉溺于这种**虚拟亲密关系**之中。

在这一背景下，一个经久不衰且极具争议的话题始终萦绕在公众视野：**男偶像到底能不能谈恋爱？** 每当偶像恋爱传闻曝光，舆论场中往往出现两极分化，其中一派对粉丝的过激反应表示不解，甚至将其污名化为“脑残粉”的行为。然而，这种简单的价值判断忽视了现象背后复杂的社会心理机制。本文旨在摒弃刻板印象，深入探究粉丝群体，特别是女性粉丝，普遍不希望男偶像恋爱的原因，试图回答：粉丝的“反对”究竟错了吗？其背后的情感逻辑与社会根源是什么？

文献综述

现有研究多从粉丝文化、消费心理学与性别研究等角度切入，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

首先，从**偶像产业的商业逻辑**来看，偶像本质上是一种被精心包装的文化商品，其核心价值在于通过形象管理实现商业变现。正如韩娱各大娱乐公司（如 SM、JYP、HYBE 等）年均数十亿韩元的营收所示，偶像的商业价值高度依赖于其“可被幻想的单身状态”。经纪公司通过系统化培训与营销策略，将偶像塑造为“完美

男友”的典范，贩卖“情绪价值”与“恋爱代偿”成为其核心商业模式（张燚，2021）。

其次，关于**粉丝的情感投射**，詹金斯（Henry Jenkins）提出的“参与式文化”理论指出，粉丝并非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参与文本意义的建构。粉丝将自我理想（如对伴侣的期待、对自身缺失品质的向往）投射于偶像身上，在精神世界中与其建立一种拟态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被称为“准社会交往/准社会关系”（Para-social Interaction/Relationship），即受众对媒介人物产生类似于真实人际交往的情感依恋，但这是一种单向的、由粉丝主动构建的情感连接。

最后，针对**粉丝为何抵制偶像恋爱**，现有讨论多聚焦于“占有欲”与“嫉妒心”。然而，近年研究开始关注“情感劳动”与“沉没成本”的作用。粉丝付出的时间、金钱与情感，构成了一种对偶像事业发展的“投资”。当偶像恋爱，粉丝会感到这种“投资”失败，产生一种被“背叛”的剥夺感（Baym，2018）。此外，群体动力学会解释，粉丝社群作为情感共同体，其共享的“幻想”一旦被打破，将引发集体性的情感震荡。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方法，旨在深入理解粉丝群体的主观体验与情感逻辑。

1. **文本分析法**：选取社交媒体平台（如微博超话、豆瓣小组）上关于偶像恋爱传闻的粉丝发言、评论及长文，对其进行归纳与主题分析。
2. **网络民族志观察**：作为长期关注粉丝文化的观察者，沉浸于多个粉丝社群，观察其日常互动与突发事件（如“塌房”事件）中的集体行为与情感表达。
3. **案例分析法**：以近年来具有代表性的韩国男团偶像恋爱曝光事件为案例，分析粉丝反应的共性与模式。

正文

一、对男爱豆的占有欲

不管是在虚拟精神世界还是在现实世界，女生对爱情对一段亲密关系总是抱有很大期望，她们往往希望伴侣专一，也对他们有一定的占有欲，而对于男爱豆必然也存在精神洁癖，希望他们没有女友，也有人说“他没有女友那我们这些粉丝就是他的女友”从而得到精神满足。那么，如果男爱豆谈恋爱了，粉丝们就有一种被背叛，亲密对象出轨的感觉，这一定不会被人容易接受。当然这其中也有**女性现实情感困境的代偿：** 更深一层想，为什么是“女粉丝”对“男爱豆”的恋爱如此敏感？这或许折射出部分女性在现实中的情感困境——对爱情的高期待、对专一的需求、对背叛的恐惧，在现实中未必能得到满足或保障。于是，她们把这些情感需求投射到“不会背叛”（因为是幻想）的爱豆身上。当爱豆恋爱，等于**连最后这块“安全的情感试验田”都被污染了**。这种愤怒，是对现实情感困境的一次集中爆发。

二、群体动力的放大效应

“共享幻想”的破裂： 粉圈本质上是一个基于“共同爱他”而建立的虚拟社群。大家每天在超话里分享他的好，在群里一起尖叫，这种“我们一起爱他”的氛围，构成了社群的情感纽带。当他恋爱，这个**共享幻想被击碎**，整个社群赖以生存的基础就会动摇了。

群体情绪的传染： 一个人可能只是有些失落，但当看到大家都说“塌房了”“被背

叛了”，情绪会迅速传染、叠加，最终演变成集体的愤怒。这种情绪裹挟，让即使原本理性、想祝福的粉丝，也可能因“不合群”而被迫加入声讨。

“付出成本”的攀比： 在群体中，粉丝会互相比较谁付出得更多、谁更爱他。这种攀比进一步推高了每个人的沉没成本。当恋爱消息传来，付出越多的人越无法接受，这些人是大粉，是签售姐，是站姐，而她们往往是群体的风向标。一旦她们下场讨伐，其他粉丝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粉丝不接受恋爱，有时不是“我”不接受，而是“我们”共同构建的这个小世界，被他亲手推倒了。

三、男爱豆谈恋爱了，粉丝的沉没成本该有谁来买单？

一旦进入粉圈，打榜，购买周边，反黑，支持杂志代言等等，都是普通粉丝会选择做的事，这些事情需要付出时间，金钱，情感，精力。这不是简单的追星，而是一种**情感寄托**。在现实中，我们的付出未必有回报，但在追星这件事上，粉丝构建了一种“等价交换”的幻觉——我付出，他就能更好；他好了，我就快乐。这其实是一种**虚拟的情感契约**。随着付出增多，沉没成本也越来越高了。

当契约被打破恋爱消息传来，你发现：

- 你投入的时间，变成了别人甜蜜的背景板
- 你花的钱，可能变成了他给女友买礼物的来源
- 你的真心，在他那里可能只是无数粉丝真心的之一

粉丝不接受恋爱，是因为感觉自己被背叛了。这种背叛不是恋人之间的背叛，而是**一种“我拼命守护你的梦想，你却亲手毁了它”的失望**。粉丝会觉得，你既然享

受了粉丝经济带来的红利，就应该遵守这份职业背后的游戏规则。

四、粉丝爱的是“真实的人”，还是自己的投射？

粉丝喜欢的，往往是经过自己**想象加工后**的那个爱豆。他舞台上的光芒、采访中的善良、直播里的幽默，都被粉丝收集起来，还有自己最想具有的，最理想的美好品质，在心里拼凑成一个“完美恋人”的形象。倘若一朝得知男爱豆谈恋爱，他们在粉丝心中的形象会遭到破坏，那一刻，粉丝不只是在“失去”他，也是自己精神世界中那个自己构造出的完美人设的崩塌。

写到这里，或许有人会问：所以呢？说了这么多，粉丝到底该不该接受爱豆谈恋爱？

也许，这个问题本身就没有标准答案。

我们当然知道，爱豆也是普通人，会有七情六欲，会想要去爱与被爱。理智上，我们都懂。可当那一天真的到来，当那条恋爱消息猝不及防地出现在屏幕上，那一刻的心痛、失落、不甘，也是真实的。

那不是“疯”，不是“傻”，而是一个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把自己的真心、时间、金钱，都寄托在一个闪闪发光的幻影上。然后有一天，幻影碎了。

粉丝不接受恋爱，不是不接受“他有女朋友”这件事本身，而是不接受自己的真心被如此轻拿轻放，不接受那些年拼命守护的梦想，最后成了别人的背景板。

所以，如果你也是曾经“塌房”的粉丝，不必为自己的难过而羞愧。你的情绪是真实的，你的付出是真实的，你的失落也值得被看见。

只是，在痛过之后，也别忘了：那些光，曾经照亮过你，就够了。你们之间有过闪闪发光的回忆，那一段追星的美好经历，那些因为他去过的地方：kspo,东蛋场馆，澳门银河，香港启德……这些地方都承载着你们之间的幸福回忆；那些因为追星掌握的技能会一直伴随你走下去；你所扩展的眼界也许在某一时刻会派上用场，这就够了，**这就够了——不是每场奔赴都要有结局，能成为彼此人生中一段明亮的存在，已经是一种幸运。**

谢谢你看到这里，希望我们所喜爱的那个他都是满分男！

请大家把握住现在，享受他带给你的幸福，倘若有一天你或者他要离开，你都可以平静的说出“再见”，怀揣你们之间的美好回忆，奔赴下一个春天。

Doi 越痛越是爱吗？从明清艳情小说看中国女性性行为的变态发展

摘要：明清艳情小说中不乏有直露的性描写，尤其是在一些器官、姿势和动作情态上极尽描摹之能事。然而除快感以外，疼痛也是难以绕开的问题。在现代妇科医学发展与阴蒂的发现后，与阴道高潮相关的疼痛也成为女性主义怀疑的对象。疼痛被语言文化建构为习惯、不可避免、甚至升华成为性能力高超和感情深厚的佐证，呈现出一种对于女性身体的异化与规训。

关键词：性行为 明清艳情小说 疼痛 异化

大众文化领域，插入式性行为纳入方的疼痛叙事如今已蔚为大观。在世界最大的同人网站“ao3”上，稍加注意即可发现就算在最私密最刺激甚至远离资本主义经济控制的领域，人们的性想象依然前篇一律的无聊。

色情文化中对女性疼痛的描述大致经过了一个直观描述、无视疼痛与简单化、疼痛景观化、疼痛内化的发展过程，疼痛内化尤其在当代大众文化中得到了充分的实现。回顾明清艳情小说除了追溯此类现象的发展脉络外，顺便重拾在历史发展道路上曾经属于中国人的，后来逐渐丢失的关于性行为、关于女性在性、爱、两性关系中可以处于何种位置的想象力。

一、疼痛的直观描述

《金瓶梅》第二十七回写道西门庆“老和尚撞钟”：“忽然仰身望前只一送，那话攘进去了，直抵牝屋之上。——牝屋者，乃妇人牝中深极处，有肉如含苞花蕊微拆，到此处，男子茎首觉翕然畅美不可言。——妇人触疼，急跨其身。只听磕碴响了一声，把个硫黄圈子折在里面。妇人则目瞑气息，微有声嘶，舌尖冰冷，四肢不收，殚然于裀席之上矣。西门庆慌了，急解其缚，向牝中抠出硫黄圈并勉铃来。”[1]潘金莲虽然是一个性经验丰富且性欲很重的女人，也不得不“我的达达，你今日怎的这般大恶？险不丧了奴之性命。今后再不可这般所为，不是耍处。我

[1] 蘭陵笑笑生：《金瓶梅詞話》（臺北：里仁書局，1993 年），頁 487-488。

如今头目森森然，莫知所之矣！”[2]这个险些丧命、要求对方再也不做同样事情的女子，和最后那个因欲求不满导致西门庆精尽人亡的祸水判若两人。

同样的剧情，可以在《如意君传》中见到。作为目前所发现的明代第一部艳情小说，其中的情节对后世文本产生了很大的借鉴意义：

> 后欢甚通体，着曹举腰，摇荡掀腾者数百回，乃视敖曹低语曰：“且勿动，我头目森森然，莫之所以。”曹之兴方作，神彻至脑，复送麈柄百余度，牝中淫气连绵不绝。武后失声大呼曰：“好亲爹，快活杀我也！且少住片时往来，过急难禁。”曹不听，则牝中之津滴滴而下，其声犹数夫行泥淖中，
>
> 俄而，后两足舒，宽目，闭齿紧，鼻孔息微，神思昏迷。曹大惊，即取出麈柄，扶后坐起，久而方苏。曹曰：“陛下何故如此，惊惧微臣，不敢为之。”后瞪目视曹，遂抱曹作娇泣声曰：“兹复不宜如此粗率，倘若不少息，我竟而长逝矣，汝则奈何。”[3]

首先，这里的疼痛并没有获得一种双方交战、一方得胜的意义。《金瓶梅》中并非没有把男女之事比作双方交战的传统观点，在西门庆与林太太的章节里表达得尤为鲜明，两个人披挂上阵，使出浑身解数，床帏战得火热。西门庆两战林太太，大大夸耀了他出色的性能力。然而，这种把女方逼到气息微弱、四肢不收、昏迷不醒的状态并不是一场胜利，而是一场事故。潘金莲虽然可以为了自己的性欲、权欲参与西门庆的性变态行为，但这类让她自己险些丧命的事故并不在此列。这场事故也不代表着对她性欲的否定，相反正是她那夸张的欲望让西门庆送了命；西门庆也不是一个胜利者的反应，而是面对事故的慌乱。尽管他也是个喜欢确立自己性霸权的男人，但这个结果并非他本意。在此之前，《如意君传》的薛敖曹也是因忽视武则天的指令后犯下大错，“惊破臣胆”，被指责为“粗率”。《如意君传》中薛敖曹的每个兴致上来不顾武则天意愿的举动，都被皇帝训斥并加以痛觉的描述，唯有按照她的指示才能达到好的效果。事实上，《如意君传》有意无意借武则天之口表达了女性在性行为中获得快感的艰难：“常忆我年十四，侍太宗。太宗肉具中长，我年幼小，尚觉痛楚不能堪，侍寝半年，尚不知滋味。二十六七

---

[2] 蘭陵笑笑生：《金瓶梅詞話》（臺北：里仁書局，1993 年），頁 488。

[3] 古行豔豔生等：《昭陽趣史・春燈謎史・脂浪鬥春・宜春香質・如意君傳》（香港：香江出版社，2017 年），頁 269。

时，侍高宗。高宗肉具壮大，但兴发兴尽但由他，我不得恣意为乐。幸彼晏驾，得怀义和尚，其肉具初不如高宗，入炉之后，渐大渐长，极坚且热，通夜不休。沈怀谬亦壮大，舍命陪我，连泄不已，以致得病。今昌宗、易之兄弟，两美丽少年。易之肉具颇大，昌宗长六七寸，亦足供我玩乐，而一泄后，再不肯举，甚至中痿，我甚恨之。此数人肉具皆人间之选，然不如我如意君远矣。自今以后，不必尽根没脑，但入其半足矣。”[4]其中，疼痛被直观地表现出来。首先是年龄，虽然十四岁出嫁在古代并不少见，但对其疼痛的表述却很少。尽管对方尺寸只是普通，依然半年都处在痛苦中；高宗虽然条件好，但是“兴发兴尽但由他”，并不能让女方得到满足；后面的男宠各有问题。尽管这段文本有抬高薛敖曹的用意，却以相对现实的角度描述了古代社会女子获得性快感的困难程度。尤其是纳入式这种极大牺牲女方体验、极易危害女方身体健康的交媾方式，只有到了“彼晏驾时”才能开始按照自己的感受对男方提要求。

与《如意君传》文脉相承的《痴婆子传》对女性性行为中的疼痛表现得更为具体。上官阿娜对北邻少妇的说教表现出超前的思维自觉性：

> 少妇曰：“以吾所言，乃臆度之，当若此也。虽然，当凸之投凹也，凹隐隐有痛，初不知其乐也。”
>
> 予曰：“投之而痛，而吾又何甘乎？”
>
> 少妇曰：“凸者巨，始投凹中，甚觉其苦。而后渐觉其乐，至于相投以入，不觉凹中之美，真有莫得而形容也。如凸者渺，则始虽不见其甚苦，继亦不见其乐也。”
>
> 予益疑焉曰：“何苦而能乐，不苦而反不乐，何也？”
>
> 少妇曰：“女之凹者，如含萼封苞，菡萏之形。其凸之始进时，生涩燥紧，觉凸之无微不巨也。所以愈巨愈痛。”
>
> 予曰：“然则何如而乐也？”
>
> 少妇曰：“然凹之内，又有肉舌含花，花蕊微动，而男子垂首至其处，便觉翕翕然畅美，则苦渐去而乐渐生矣。惟微而短者，鲜能至其处。即不见其乐。故必巨而长、昂而大，为能充满乎凹中，尽力揉搓、递进递出，则凹中挠痛，勿须捱忍。觉得一味热痒，是美之至矣。”[5]

北邻少妇面对阿娜的诘问，是在顾左右而言他。面对越痛越乐这个诡异的结

---

[4] 古行豔豔生等：《昭陽趣史·春燈謎史·脂浪鬥春·宜春香質·如意君傳》（香港：香江出版社，2017 年），頁 269-270。

[5] 陳慶浩、王秋桂主編，吳門徐昌齡等著：《思無邪匯寶 24 冊：如意君傳·癡婆子傳·僧尼孽海·春夢瑣言》（臺北：臺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1995 年），頁 112。

论，她所回答的“然凹之内，又有肉舌含花，花蕊微动，而男子垂首至其处，便觉翕翕然畅美，则苦渐去而乐渐生矣。”[6]不过是从男子的角度替这种方式辩护。神奇的是这段语句早在《如意君传》就有类似表述，也几乎原样出现在《金瓶梅》二十七回里，不过一点也没有北邻少妇所说的由苦转乐，只有让潘金莲险些丧命的事故。至少，可以大致判断出兰陵笑笑生应该不同意北邻少妇的性观点。此后《痴婆子传》里充满了阿娜的痛诉，与慧敏试“触之觉痛”“凹中痛若着刺”“然凹中撑得热炙火燎，其痛反甚”，反复尝试不过“凹中愈痛”“虽徐，自觉痛不已”，慧敏很快获得了快感而阿娜依然“予凹中簌簌痛，大不快”，方悟“男子之具，虽微不巨，也甚不堪”[7]。后文进一步写道，就算采用了各种方法，还是疼。反倒是慧敏越发不在乎阿娜的意见，“予觉又痛不快”“内痛兹急，不知所之”[8]。至此北邻少妇的话已经被推翻了，无论男方大小都是疼的，疼成这样也不见得有什么快感，越疼越爽真是精神胜利法。之后，与名俊的仆人“予痛甚，且泣”，与丈夫“予诚痛”，而盈郎则“血气不足”[9]等等，阿娜虽然所私者众多，但在谷德音出现之前所受强迫者多，性虐待多。黄卫总认为，《痴婆子传》之所以难得，很大程度上是它提供了一个女性的叙事视角探讨女性纵欲的问题[10]。这个前半部充满了痛觉叙述的小说，可能采取了婉转的方式表达女性主人公对于性本身的探索、思考与质疑。

---

[6] 陳慶浩、王秋桂主編，吳門徐昌齡等著：《思無邪匯寶 24 冊：如意君傳·癡婆子傳·僧尼孽海·春夢瑣言》（臺北：臺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1995 年），頁 112。

[7] 陳慶浩、王秋桂主編，吳門徐昌齡等著：《思無邪匯寶 24 冊：如意君傳·癡婆子傳·僧尼孽海·春夢瑣言》（臺北：臺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1995 年），頁 114。

[8] 陳慶浩、王秋桂主編，吳門徐昌齡等著：《思無邪匯寶 24 冊：如意君傳·癡婆子傳·僧尼孽海·春夢瑣言》（臺北：臺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1995 年），頁 114。

[9] 陳慶浩、王秋桂主編，吳門徐昌齡等著：《思無邪匯寶 24 冊：如意君傳·癡婆子傳·僧尼孽海·春夢瑣言》（臺北：臺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1995 年），頁 121-122。

[10]黃衛總著，張蘊爽譯：《中華帝國晚期的欲望與小說敘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 年），頁 124。

二、疼痛的无视与简单化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相关中医书籍和房中术等，似乎是以满足女性为中心，与否认女性性能力的西方相比，确实更先进[11]。然而，正如马克梦在《吝嗇鬼、泼妇与一夫多妻者》中写道，房中术极少写妇人的疼痛，“房中术传授男人可学会的交合之术，这便意味着，在性方面取悦女人从而赢得她的忠诚是非常容易的。”[12]这正是问题所在。按照现代科学和妇科医学的发展，阴道高潮已近乎被证明是小概率事件，阴道内并无细微神经组织分布，《海蒂性学报告》则从统计学的角度说明了相当大概率的女性是没有阴道高潮现象的[13]。因此，北邻少妇所维护的“苦而能乐”不过是自欺欺人，采用错误的方式在性方面取悦女人实际上是非常难的事。疼痛因此成为男性中心的色情创作不能回避又必须回避的裂隙，正视女性的疼痛暗含颠覆整个男性中心性叙事的力量。如果说《如意君传》、《金瓶梅》、《痴婆子传》采用了相对客观的写法，更多的小说实际上采取了刻意回避的策略。大致有两种表现方式：一是对疼痛的无视和简单化；二是对疼痛的景观化。

首先是无视疼痛的存在，妇人能很容易的获得性快感并沉溺其中，于是直接号称妇人好干且淫。这无疑是大多数小说采取的套路，很难想象艳情小说的作者有多少是真正与女子有过接触，《红楼梦》里的贾母曾调侃那些作才子佳人小说的酸腐读书人说不定连真正的贵族小姐的面儿都面见过，只会写些前后矛盾错漏百出的文字。正如《肉蒲团》的未央生询问赛昆仑，借这位江洋大盗之口陈述“妇人里面还是喜干的多，不喜干的多？”“自然是喜干的多了”“请问妇人干事的时节，还是会浪的多，不会浪的多？”“自然是会浪的多了”[14]把女子当成肉欲难禁

---

11 吳存存：《情為何物：明清兩代的性別、情感與社會風氣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5 年），頁 18。

12 馬克夢著，王維東、楊彩霞譯，戴聯斌校：《吝嗇鬼、潑婦、一夫多妻者：十八世紀中國小說中的性與男女關係》（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頁 253。

13 [美]雪兒・海蒂著，林淑貞譯：《海蒂性學報告：女人篇》（海口：海南出版社，2016 年），頁 226。

14 陳慶浩、王秋桂主編，李漁著：《思無邪匯寶 15 冊：肉蒲團》（臺北：臺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1995 年），頁 184。

的对象为纵欲风气提供合理性和自我安慰，女子的纵欲行为是为男性的需要所准备的[15]，因此生理常识直接抛掷脑后，塑造出一个有一个仅为纵欲存在的器官动物。就连具有为女性欲望辩护色彩的《灯草和尚》，在他引诱夫人，还有其未经人事的婢女暖玉和女儿长姑时，也有忽视女性自身的问题。她们受灯草和尚的蛊惑太为容易。《灯草和尚》中所体现的对女人阴道的遐想实际上非常幼稚。与《痴婆子传》上官阿娜痛不欲生的实践经历相比，缺了很多真实感。

与之相关的就是疼痛的简单化，很多小说会宣称这是初经人事再所难免，次数多了，时间久了，自然就“宽绰”了。如《蜃楼志》里：

> 笑官初入佳境，未免贾勇无余，不消半个时辰，早已玉山倾倒。于是揩拭新红，互相偎抱。笑官道：“姐姐，你为什么不言语?今夜不是我在这里作梦么?
>
> 素馨道：“教我说什么呢?”
>
> 笑官道：“方才可好么?”
>
> 素馨道：“痛得紧,有什么好处。”
>
> 笑官摸着下边说道：“这么一点儿，要放这个下去，自然要疼的。到了第二回就好了。”
>
> 素馨捏着他的手道：“不要动了，我们略睡一睡回去罢。”[16]

事实上，这种“一回生，二回熟”并没有多少合理性，顶多是拿疼痛耐受力充数。虽然作者在这里写素馨觉得无甚好处有为她后来堕落另找情郎埋伏笔的意味。然而从“痛得紧”到淫荡堕落的转变发生得过于丝滑，正论证了苏笑官自以为是的“到了第二回就好了”的言论，疼痛被简单化，也被合理化为纵欲的必需品。尽管从现代医学看来，这种对女性盆底肌的看法近乎无知，阴道松弛更是一种妇科病症，然而这等荒谬的情节安排恰好说明了在男性中心的纵欲文学中，女性自主的身体是不存在的。

三、疼痛的景观化

不少现代学者指出，明清时期由于商业经济的发展，市场的扩大，全球经济

---

15 吳存存：《情為何物：明清兩代的性別、情感與社會風氣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5 年），頁 135。

16 庾嶺勞人著，禺山老人編：《蜃樓志》（浙江：浙江出版集團，2013 年），頁 211。

体系下白银的大量涌入，已经可以观察到一些现代性发展的迹象。其中一个较为重要的就是身体自觉，在晚明世情小说和色情文学中萌发出中国本土的人文现代性[17]。一方面，人们开始采用非道德批判的视角，正视普通人的欲望、身体与情感，叙述的情节日渐通俗化。同时，正如芮塔·菲尔斯基（Rita Felski)所言，现代性的奥德赛-海妖寓言还包括着萌发的理性精神对于身体的利用与规训[18]。当人们发现身体时，就开始了异化进程。在蓬勃发展的市民经济、高压全面的文化政策等多方影响下，身体也开始成为一种景观存在。

首先，女性化身体成为景观符号融入商业文化在明清非常普遍，正是在这个时期，美人画走向程序化和标准化，成为一种商业文化符号，融入到日常器物当中。[19]美人画日益成为一种集合性的大众消费趣味，而非实质性内容，它的繁荣正是与蓬勃发展的青楼文化有着密切关系[20]。换句话说，这与明清色情风气息息相关。美人画与春宫图相辅相成，构成明清的女性文化形象序列。如在《金瓶梅》里，吴月娘就起到类似的作用。虽然《金瓶梅》作为世情小说，情节接近市民阶层的浅露直白，就连位高权重的人也逃脱不了酒色财气。但西门庆的妻子吴月娘却非常具有某种疑似高门仕女的行为特点。当西门庆和各种女人极尽情色之能事时，吴月娘扫雪烹茶、春昼秋千、拜月求子、中秋夜宴等，具有非常理想化的仕女图场景。然而这并非《红楼梦》那样的贵族文化滥觞，更象是对美人画程序的移植。吴月娘的美人画与其他女性的春宫图共同构成当时女性文化想象。

进一步观察性叙事中的身体景观存在，就会发现性行为本身也日益成为一种景观，其中较为明显的就是疼痛的景观化。因为疼痛是身体最直观的感受，对疼痛的异化是人类异化最直观的表现之一。

---

17 吳存存：<晚明江南世情小說與中國本土身體現代性萌芽>，《博覽群書》第 483 期，(2025 年 3 月)，頁 46-52。

18 [美]芮塔・菲爾斯基著，陳琳譯：《現代性的性別》（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 年），頁 121。

19 [美] 巫鴻著：《中國繪畫中的女性空間》（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 年），頁 325。

20 [美] 巫鴻著：《中國繪畫中的女性空間》（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 年），頁 327。

这种描写在《肉蒲团》中已见端倪。未央生所谓的点化妻子不过是将其驯化为为他服务的性奴隶。首先，未央生并非和妻子结“素”婚，在他拿春宫图与妻子看之前，他们已经圆房。他所不满意的实际上是玉香对于特定的符号指令无动于衷。“但见其苦，不见其乐”“至于说快活上头，莫说不肯叫死叫活助男子的军威，就算唤他几声心肝乖肉，也像哑妇一般，不肯答应。”[21]表面上看是让妻子脱胎换骨，实际上是训狗识别指令。小说写道，玉香经过调教后“干事的骚声，助兴的狂态，渐渐在行”[22]。她不过是配合丈夫的性奴隶，为丈夫纵欲助兴的工具。她的喊声、对丈夫动作的过度反应都是一种景观性的催情剂。事实上，未央生并非像西门庆、陈经济那样对一些性姿势不了解，要借用春宫图作学习用。他早已烂熟于心，春宫图实则是一样用来说服玉香的工具：“我且问你，若还男子妇人日里不行房，这书画之人怎晓得这些套数，怎么描写得这样肖神，就像活得一般，使人一看就动性起来。”[23]把画当成实证，把商业化景观当成实感，未央生的性行为本质上也是一系列类似“巴甫洛夫的狗”的条件反射。

在《绿野仙踪》中，金钟儿在公众场合与温如玉产生言语冲突，被打了嘴巴，两人结了篓子。晚上两人商量着和好：

> 如玉笑道：“不用你推我，我也没别法报仇。我只教你今夜死在我手里就是了。”
>
> 于是不由分说，将金钟儿两腿分开，把阳物没头没脑的往阴户内乱塞。金钟儿道：“慢些　　儿，通的小肚了怪疼的。”[24]

温如玉并没有把金钟儿的要求当回事，这一切被窗户外的苗秃子看到：

> 又见如玉，忽将金钟儿两腿掀起，发狠抽提，一下紧似一下；再看金钟儿，双目直视，两手搬住如玉的两胁，大声叫道：“我的亲达达，我今日活不成了。”说罢将头在枕头上来回滚了几下，鼻中声息，似有若无，

---

21 陳慶浩、王秋桂主編，李漁著：《思無邪匯寶 15 冊：肉蒲團》（臺北：臺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1995 年），頁 162。

22 陳慶浩、王秋桂主編，李漁著：《思無邪匯寶 15 冊：肉蒲團》（臺北：臺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1995 年），頁 177。

23 陳慶浩、王秋桂主編，李漁著：《思無邪匯寶 15 冊：肉蒲團》（臺北：臺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1995 年），頁 187。

24 李百川著：《绿野仙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页 470。

像个昏去的光景，面皮也看的黄了。

苗秃子那里还挨住？摸了摸自己的阳物，与铁枪一样，连忙跑入西房，看了看玉磐儿，不在炕上，不想在的下马桶上撒尿，苗秃子也顾不得分说，弯倒腰将玉磐儿一抱，不意抱得太猛了，连马桶也抱起来。[25]

很明显正是金钟儿的昏迷，她的痛苦，极大激发了在外偷窥的苗秃子的性欲望。以至于他到第二天依然对这件事念念不忘，调侃金钟儿："我看你大大的两个青眼圈，是昨夜昏过去的原故。"[26]昏迷的样子，发黄的面皮和青黑眼圈，这一系列病态的表象具有了诱导色情的意味。致此，女方疼痛昏迷已经不再是一场事故，而是男子彰显自己超凡性能力的表现。温如玉的反应和西门庆已经大不一样。相同的描写，于西门庆是慌忙补救，于温如玉只是淡淡接过。他与金钟儿的性行为描写基本上都涉及到病态的昏迷，"神昏意乱，舌冷唇青""头前止觉得两耳内和刮大风的一样身体飘飘荡荡，魂魄也不知在于何处。"[27]金钟儿也不再有武则天、潘金莲那样保全自身的要求，反之正是这种病态的经历让她对温如玉死心塌地，升格为"爱"。金钟儿忍潘金莲之不能忍，女性在性叙述中转变为一种恋痛为爱的受虐狂，而男性越发成为不顾对方意愿和身体情况的性暴君。

四、尾声：疼痛内化的当代

进入近代，中国文学受到西方的冲击走上了曲折的发展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连描写爱情的作品都受到批判，改革开放后涌进的全球市场经济又再次冲击本土文学。可以说今天的大众流行文化已经与明清时代大为不同。然而，所谓现代性的发展，在性叙事对女性身体异化的情况反而与明清接续并每况愈下。清代《绿野仙踪》的金钟儿已经出现将疼痛转化为感情深厚的替代逻辑，如今在疼痛景观化后，痛感已经取代快感，或者说等同于快感成为当代大众文化流行文学的性叙事主流。疼痛级别已经成为角色之间感情深厚的衡量标准，甚至在所谓

---

[25] 李百川著：《绿野仙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页 471。

[26] 李百川著：《绿野仙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页 472。

[27] 李百川著：《绿野仙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页 478。

女性写作、为女性欲望言说的“女频”，“新婚第二天痛得下不来床”“不哄不停，只哄不停”等成为双方，尤其是男方对女方用情至深的象征。最终，流行文化的性书写中充斥着性暴君和受虐狂的故事。将疼痛视为默认情况，将疼痛级别内化为情爱标准，当代流行文化的可悲境况使当代创作者在面对几百年前潘金莲尚且坚定的拒绝时发出一声叹息。

事实上，单就痛感景观化而言，今天的中国人也没有赶上他们明清的祖宗们。痛感内化才是当代的最大发展，膨胀的匮乏的自我混着精神胜利法进行苍白的自我复制。所幸仍有一批创作者在努力，去夺回本属于中国人的飞扬的想象力。

参考文献：
未删减版的全是禁书，我也不敢发途径啊。

叙事即定义：从《新青年》创刊 110 周年和外交部发言论证女性话语权争夺的必要性

作者：113

摘　要

话语权的争夺本质上是一种没有硝烟的战争。我们要像保卫国家主权一样保卫自己的权力，要像争取领土完整一样争取我们的权力。本文以“叙事战”概念为理论透镜，通过对当代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实践与百年前《新青年》创刊的历史性对照，揭示话语权争夺的内在逻辑：掌握话语主导权，即是掌握定义现实、塑造认知的权力。文章进而将这一分析框架延伸至性别领域，考察女性在历史长河中被“噤声”的机制，以及当代女性如何在“叙事战”中夺回话语武器。从外交部的“每日必答”到《新青年》的“创造时代”，再到女性主义的“命名”实践，话语权的争夺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命题展开——谁有资格定义世界？谁的声音能够被听见?这一命题如果有答案：作为全世界一半人口的我们毋庸置疑。

关键词：话语权；叙事战；《新青年》；女性主义

一、引言：话语作为武器

“语言也是武器。”把握叙事主导权，不仅是赢得认知战的前提，更是把握意识形态斗争主动权的关键。2025 年 5 月，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第四届中国新闻发言人论坛上的一番话，将这种“话语战争”的紧迫感带入公众视野：

> “在当下，国际舆论场真实性、确定性成为稀缺品。只有及时主动发声，才能让中国声音抢占第一落点，让真相占据主流。少数反华敌对势力固守意识形态偏见，对华攻击抹黑从未停歇。面对毫无底线的恶意污蔑，发言人必须挺身而出，捍卫国家利益，维护民族尊严。”

2025 年是《新青年》创刊 110 周年。一本杂志何以“创造”一个时代？答案正在于它掌握了话语权的武器——以新思想取代旧思想，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以民主科学取代封建专制。

将外交部的发言台与《新青年》的编辑桌并置，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跨越百年的精神传承：话语权即主导权，发声即战斗。而这一命题，在性别领域有着更为深长的历史回响。当女性在漫长的农耕文明中被剥夺话语权，当“三从四德”的伦理规范将女性定义为“第二性”，女性要争取的不仅是平等的权利，更是为自己命名的权力——这正是话语权战争的另一种形态。

二、两种话语战：外交发言台与《新青年》编辑桌

2.1 外交部发言：在“叙事战”中抢占第一落点

在舆论战、认知战愈演愈烈的当下，“发言人就是战士”。面对“毫无底线的恶意污蔑”，发言人必须“以真相击碎谎言，用道理碾压歪理，在斗争中学会斗争，牢牢守卫我国的话语阵地”。这里的关键词是“阵地”——话语空间被理解为需要守卫的领土，发言人的每一句话都是在这片领土上进行的防御或反击。

叙事战可以通过“名词构造等话术”对已有概念做出新表述，模糊人们对原有概念的理解，形成强势话语对弱势话语的压制。西方国家对同样性质的军事行动，自称“低烈度战争”“航行自由行动”，却贬损别国为“灰色地带行动”——这正是话语霸权在军事领域的体现。外交部的回应策略，则对应着理论上的“反向叙事”：通过“挤出作战概念叙事中的水分，拨开云雾见真容”，让世人认清谁在搞霸道霸凌、谁在维护公平正义。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叙事战”意识并非简单的外宣策略，而是对国际舆论场结构性不平等的清醒认知。西方军事强国“凭借占据全球舆论制高点的优势，用一套霸权性质的话术，构设了一套服务资本利益、维护霸权地位的价值和标准体系”。处在这种不利的叙事环境下，唯有主动发声、抢占第一落点，才能在霸权话语的夹缝中开辟自己的叙事空间。

2.2 《新青年》：以话语“创造”一个时代

将目光回拨百年，《新青年》的创刊提供了话语权争夺的经典范本。陈独秀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向青年提出六点希望：“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六点希望，本质上是一套全新的话语体系——以“自主”对抗“奴隶”，以“科学”对抗“想象”，以“世界”对抗“锁国”。

陈平原教授在论及《新青年》时指出：“在一个东方古国崛起的关键时刻，一份刊物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这样的机会其实是千载难逢的。”但“千载难逢”并不意味着偶然。《新青年》的成功，在于它深刻理解了话语权的本质：话语不仅是表达的工具，更是建构现实的武器。当一种话语能够“确定国家安全利益、识别现实和潜在威胁、针对性规划发展战略”（这是军事理论家对“叙事”功能的描述），它就具备了“创造时代”的力量。

2.3 跨时空的对话：谁在发声，为何而战

将外交部的发言实践与《新青年》的办刊历程并置，我们看到两种看似迥异、实则相通的话语战形态。

其一，二者都以“真相”为武器。外交部强调“让真相占据主流”，《新青年》追求“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在谎言与蒙昧面前，真相本身就是最有力的批判。

其二，二者都面临“话语霸权”的压制。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污名化，与封建势力对新文化运动的围剿，在结构上具有相似性——都是既得利益者用既有话语体系维护自身特权。而打破这种霸权，需要的不仅是勇气，更是新话语的创造能力。

其三，二者都实现了从“个人发声”到“制度发声”的跨越。外交部发言人制度从无到有，从“每天必开、有问必答”到多语种同步发布；《新青年》从陈独秀一人主撰，到北大同人共同编辑，再到“从′思想同人′到′阶级同志′”的演进——话语权的争夺从来不是孤胆英雄的事业，而是制度化的集体行动。

三、被噤声的历史：女性在话语战场上的缺席

3.1 农耕文明的性别契约：女性失语的经济根源

如果说外交部和《新青年》展示了“发声者”如何争夺话语权，那么女性在漫长历史中的处境则揭示了“失语者”何以沉默。

有学者将传统中国的性别秩序概括为“农耕文明的性别契约”。在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中，男性因体力优势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导力量，土地分配权“牢牢掌握在男性家长手中”。北魏均田制明确规定“丁男受露田四十亩，丁女二十亩”，这种制度化的资源分配差异，是对性别生产力差异的制度性确认。经济基础的差异，决定了话语权的归属——谁掌握生产资料，谁就掌握定义现实的权力。

但这种权力结构并非单纯的压迫，而是建立在生存需求上的“共生体系”。男性承担高强度农耕劳动，女性负责纺织、炊饮、育儿等再生产劳动，二者共同构成家庭经济的完整闭环。明代《天工开物》记载“农家勤者，妇女纺绩，十日得布一匹”，这种分工在小农经济形态下达到了近乎完美的效率平衡。正因如此，传统性别伦理获得了“合理性”的外衣——“男主外女主内”不仅是规范，也是现实；不仅是压迫，也是共生。

问题的要害在于：在这种共生体系中，女性失去了为自己命名的权力。东汉班昭《女诫》中“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四德标准，是对女性角色的规范化要求，但这些要求全部来自男性视角的界定。女性是被言说的对象，而非言说的主体。

3.2 女性话语权的历史性缺失

这种被言说、被界定的处境，使女性在话语战场上长期处于结构性缺席状态。

在政治领域，女性被排斥在公共议事之外。《礼记》的规范体系将女性写为“附属于田宅”的存在，公共事务的话语权自然与女性无缘。在法律领域，女性的财产权、婚姻自主权被制度性剥夺。明清时期的“惜嫁溺女”现象，正是社会教化对女性财产继承权削弱的极端体现。

在知识领域，女性的声音更难进入历史记载。即使有少数女性留下文字，也往往被归入“闺秀文学”的另册，难以获得与男性同等的经典地位。这种缺席最深刻的后果，是女性失去了定义自身经验的能力。正如女性主义学者所揭示的，在男性主导的话语体系中，女性的体验要么被忽视，要么被扭曲地表述。生育、家务、情感劳动等女性承担的主要工作，从未被纳入“劳动”的正统定义；女性的身体经验，从未获得与男性同等的表达合法性。

3.3 “被言说”的困境

1949 年，中国女性就业率仅为 7.5%；到 2023 年，这一数字已攀升至 61.5%，城市女性中本科以上学历占比达 52.3%。经济基础的深刻变革，为女性话语权的觉醒创造了条件。然而，经济地位的改变并不能自动带来话语权的平等。在话语战场上，女性仍然面临“被言说”的困境。

这种困境在当代的表现形式更加隐蔽。一方面，女性成为消费主义话语的重点“关照”对象——美容、时尚、婚恋等话题被建构为“女性专属”，女性的价值被窄化为外貌和消费能力。另一方面，当女性试图进入公共议题的讨论时，又常常遭遇“性别歧视”与“反性别歧视”的双重夹击——批评性别不平等被污名为“打拳”，主张女性权益被贴上“极端”标签。

正如有学者在妇女史研究中指出的，需要“摒弃东方与西方、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立简单认知”，才能真正理解性别话语权的复杂性。女性的困境不是简单地被压迫，而是在复杂的话语网络中难以获得平等的表达机会。

四、夺回话筒：女性在“叙事战”中的自我赋权

4.1 从“被言说”到“自我言说”

女性争取话语权的历程，本质上是从“被言说”到“自我言说”的转变。

在西方，这一转变经历了漫长的历史。从 18 世纪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为女权辩护》，到 19 世纪美国女性争取选举权的运动，再到 20 世纪女性主义学术的兴起——女性逐渐从历史的暗影中走出，成为自己命运的言说者。

在中国，这一历程与近代以来的民族解放运动交织在一起。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女性话语权的觉醒创造了契机，《新青年》等刊物开始讨论妇女问题，鲁迅的《我之节烈观》等文章对封建贞操观展开批判。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往往带有“他者解放”的色彩——女性仍然是男性知识分子言说的对象，而非言说的主体。

真正的转变发生在女性开始为自己发声的时刻。1949 年后，中国女性在法律上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女性受教育程度大幅提高，为女性自我言说创造了条件。改革开放以来，女性写作、女性媒体、女性学术研究的兴起，标志着女性话语权的实质性增强。近年来，社交媒体为女性发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台，#MeToo 等运动让长期被压抑的女性经验获得表达空间。

4.2 当代女性的话语权争夺：进展与挑战

当代女性的话语权争夺呈现出多元化、日常化、制度化的特征。

在学术领域，妇女史研究的发展为女性话语权提供了知识支撑。学者们从“妇女史学史与史学理论”“女性权利的争取”“女性与家庭”“女性的社会地位”等多维度展开研究，让被历史遮蔽的女性经验重见天日。这种学术努力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是知识的积累，更是话语权的争夺——当女性的经验被纳入历史书写，当女性的视角被融入知识生产，“客观知识”本身就不再是男性的专利。

在传播领域，女性媒体和女性发声平台日益壮大。《中国妇女报》等媒体持续关注性别平等议题，社交媒体上的女性博主、女性意见领袖正在重塑公共讨论的性别图景。2025 年召开的“全球多元文明视野下的女性地位变迁和性别平等”学术研讨会，汇聚了国内外学者对女性地位变迁的最新研究，标志着女性话语权的学术建构进入新阶段。

在日常生活领域，女性正在重新定义那些长期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性别规范。从“家庭暴力”的去污名化，到“容貌焦虑”的集体反思，再到“女性主义”从贬义到褒义的语义逆转——这些都是女性夺回话语权的微观实践。

然而，挑战依然严峻。正如有学者在妇女史研究中指出的，数字时代为当代女性发展“带来赋能增效与部分领域不平等加剧的双重影响”。算法推荐可能强化性别刻板印象，网络暴力可能压制女性发声，话语权的“赋权”与“再剥夺”同时发生。

4.3 “命名”的力量：女性如何重塑话语

在话语权争夺中，“命名”是最核心的权力。谁有资格为事物命名，谁就掌握了定义现实的权力。

女性主义运动深刻理解了这一点。“性骚扰”概念的提出，让一种长期被忽视的女性经验获得了名称；“家务劳动”的价值讨论，让无偿劳动的经济意义被正视；“生育自主”的主张，让女性身体的控制权回到女性手中。每一个新概念的诞生，都是对既有话语秩序的突破，都是女性夺回命名权力的胜利。

在中国语境下，这种“命名”实践正在发生。从“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政治话语，到“女性发展”的政策概念，再到社交媒体上“姐姐来了”的集体认同——女性正在用自己的语言讲述自

己的故事。正如有学者在论及《新青年》时指出的，“词语构建是对已有概念作出新表述，模糊对原有概念的理解，从而达到引导舆论的目的”。女性的“命名”实践，正是这种“反向叙事”的生动体现——通过创造新词、赋予旧词新义、挑战既有定义，女性正在话语战场上开辟自己的阵地。

五、结语：百年回响，谁的声音将被铭记

从 1915 年《新青年》创刊，到 2025 年外交部发言人的铿锵发声，再到无数女性在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争取发声权利的努力——百年中国历史，是一部话语权争夺的历史，也是一部“沉默者”不断觉醒的历史。

《新青年》的历史告诉我们，话语可以“创造”一个时代。当一种新话语突破旧秩序的压制，当一种新叙事赢得广泛的认同，它不仅改变了人们的观念，更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外交部发言人的实践告诉我们，话语权争夺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发声就是存在，沉默就是消亡。

女性的处境则揭示了话语权争夺的另一维度：有些沉默是如此漫长，以至于被误认为天性；有些声音是如此微弱，以至于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被听见。但历史正在改变。当越来越多的女性拿起话筒，当越来越多的女性经验被命名、被看见、被承认，一种新的话语秩序正在生成。

这种新的话语秩序不是简单地让“沉默者”变成“发声者”，让“被言说者”变成“言说者”。它要求我们重新思考话语本身的逻辑：谁有资格定义“真理”？谁的标准成为“客观”？谁的体验被纳入“常识”？这些问题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但每一次提问、每一次质疑、每一次命名，都是对话语霸权的挑战，都是对更公平的话语秩序的呼唤。

百年前，《新青年》的先驱们以“自主的而非奴隶的”唤醒青年。今天，这一呼唤仍然回响在每一个争取话语权的人心中——无论是外交部的发言人，还是为自己发声的女性。在话语的战场上，每一次发声都是一次自主的宣示，每一个新词都是一次解放的可能。谁的声音将被铭记？答案取决于我们能否在“叙事战”中坚守阵地、勇于发声、不断创造。

后　记

保持敏感　掌握权力　接续奋斗

参考文献

[1] 沈文科，薛闫兴. “叙事战”：军事竞争的话语武器[N]. 解放军报，2021-12-07.

[2] 郭嘉昆. 增强新闻发布工作质效，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在第四届中国新闻发言人论坛上的发言[EB/OL].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2025-05-17.

[3] 陈平原. 为何不断与《新青年》对话[N/OL]. 中国作家网, 2025-09-16.

[4] 安文. 中国男女关系 5 千年未有大变局[EB/OL]. 博客中国, 2025-08-13.

[5] 中国新闻发言人论坛在京举行，郭嘉昆：让中国声音抢占第一落点[EB/OL]. 新黄河客户端, 2025-05-17.

[6] 段丹洁, 班晓悦. 穿越百年的青春呐喊——纪念《新青年》创刊 110 周年[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5-09-16.

[7] 鲁迪秋. 聚焦“全球多元文明视野下的女性地位变迁和性别平等”[N]. 中国妇女报, 2025-11-26.

[8] 徐信华. 《新青年》“作者队伍”的变化与中国共产党组织基础的形成[EB/OL]. 湖北党史网, 2020-12-10.

[9] 外交部发言人：面对毫无底线的恶意污蔑，发言人必须挺身而出[EB/OL]. 北京日报客户端, 2025-05-17.

九型人格本能副型理论中SX欲望的纯粹形式

与多元亲密关系对顺性别异性恋霸权的反抗

摘要：本文以九型人格本能副型理论为基础，结合形式本体论、现象学与批判亲密理论，聚焦SX（一对一本能）欲望的纯粹形式与多样性特征，深入剖析顺性别异性恋霸权主义的内在狭隘性，并论证多元亲密关系的哲学合法性与伦理正当性。研究表明：SX欲望的纯粹形式是剥离性别、性、制度等社会附加物后，以强度吸引、存在融合、唯一性优先与非工具性为核心的存在性驱力，其本质决定了亲密关系必然呈现多元形态；顺性别异性恋霸权通过定义垄断、标签暴力与制度排斥，将单一亲密范式强加于所有主体，严重压抑了SX欲望的多样性表达，其狭隘性本质在于对“亲密本质”的误读与对“欲望自由”的剥夺；酷儿柏拉图关系（QPR）、浪漫柏拉图关系、传统亲密关系等各类形态，都是SX欲望的合理经验呈现，无高低优劣之分，其价值在于是否契合主体的本真需求。本文主张：亲密关系的正当性源于“欲望本真”与“主体自主”，而非霸权规范，倡导以多元包容替代单一标准，以关系自治反抗霸权压迫，构建尊重个体差异的亲密关系秩序。

关键词：SX本能；纯粹形式；关系多样性；顺性别异性恋霸权；狭隘性；亲密关系自治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在九型人格本能副型理论体系中，SX（SexualInstinct）作为三大核心本能之一，长期被窄化为“性本能”或“浪漫冲动”，其深层的存在性内涵与多样性特征未得到充分的学术阐释（Riso&Hudson,2010）。同时，现代社会仍受顺性别异性恋霸权（Cisheteropatriarchy）的深度规训，将异性恋婚姻视为唯一合法的亲密关系范式，对非规范性亲密形态（如无性关系、多元联结、酷儿亲密）施加结构性压迫（Butler,1990;Warner,1999）。这一双重困境导致：一方面，SX欲望的本质被社会规范扭曲与遮蔽；另一方面，符合SX本质的亲密实践因偏离霸权框架而被污名化。

在现代社会结构中，顺性别异性恋霸权（Cisheteropatriarchy）长期占据亲密关系领域的主导地位，将“顺性别异性恋+婚姻+生殖”的组合预设为唯一“正常、自然、高级”的亲密范式（Butler,1990;Warner,1999）。这一霸权体系不仅对非规范性亲密关系（如酷儿亲密、无性关系、多元联结）实施污名化与制度性排斥，更扭曲了人类亲密欲望的本质内涵——SX（一对一本能）作为

聚焦深度联结的存在性驱力，长期被窄化为“异性恋浪漫冲动”或“生理性性欲”，其丰富的多样性特征被霸权框架所遮蔽（Riso&Hudson,2010）。

随着多元亲密实践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个体突破霸权规范，探索契合自身欲望的亲密形态，这引发了核心学术问题：SX 欲望的纯粹本质究竟是什么？其内在属性是否决定了亲密关系的多元可能性？顺性别异性恋霸权的狭隘性具体体现在哪些层面？如何基于 SX 欲望的多样性，构建反霸权的多元亲密伦理？这些问题不仅关乎对人类欲望本质的理解，更涉及亲密关系领域的解放性实践，构成了本文的研究核心。

1.2 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跨学科整合的研究方法，以三类理论为支撑：

其一，**九型人格本能副型理论**，为 SX 欲望的本质定义提供类型学基础，明确其作为“一对一本能”的核心特征，揭示其去预设性的内在属性；

其二，**形式本体论与现象学**，用于还原 SX 欲望的纯粹形式，剥离社会经验杂质，论证其多样性的本体论依据；

其三，**批判亲密理论与权力理论**，剖析顺性别异性恋霸权的运作机制与狭隘性本质，阐释多元亲密关系的反霸权意义。

研究遵循“本质界定—多样性论证—霸权批判—多元倡导”的逻辑脉络，通过概念演绎、批判性阐释与逻辑论证，构建完整的理论体系，摒弃任何形式的关系价值排序，聚焦“多元正当”的核心主张。

1.3 研究意义

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首次从 SX 欲望的纯粹形式出发，系统论证亲密关系多样性的本体论基础，解构顺性别异性恋霸权的狭隘性，填补了类型学理论与批判亲密理论的对话空白；实践意义在于：为各类非规范性亲密关系提供哲学合法性支撑，反驳“单一标准”的霸权逻辑，为推动亲密关系领域的多元包容与个体解放提供理论资源。

二、SX 欲望的纯粹形式：多样性的本体论基础

2.1SX 欲望的本质界定：超越霸权预设的存在性驱力

在九型人格本能副型理论中，SX（一对一本能）是人类三大生存驱力之一，与聚焦安全生存的自保本能（SP）、聚焦群体归属的社交本能（SO）形成鲜明区别（Naranjo,1994）。SX 欲望的核心并非狭义的生理性性行为或浪漫标签，而是一种**朝向他者的存在性融合驱力**，其本质特征可概括为四个维度：

第一，**去工具性**：SX 欲望以“联结本身”为目的，不服务于生殖、经济互助、社会体面等外部目标，是自为的、非功利的存在性诉求；

第二，**强度共振**：追求高张力、高共鸣的深度联结，区别于泛化的社交互

动与礼貌性友好，核心是“能量同频”与“精神契合”；

第三，**唯一性优先**：将特定他者置于存在层面的优先地位，强调联结的不可替代性，而非基于契约或道德的强制排他；

第四，**去预设性**：与主体的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性取向无关，也不预设联结的具体形式（如是否有性、是否浪漫、是否婚姻化），仅以“本真共鸣”为核心依据。

这一本质界定表明，SX 欲望的纯粹形式是超越所有社会建构与霸权预设的，其核心是“主体与他者的本真联结”，这为亲密关系的多样性提供了本体论基础——只要满足“强度、共鸣、优先性、非工具性”的核心要件，任何形式的亲密关系都具有本质上的正当性。

2.2SX 欲望的纯粹形式与多样性的内在关联

从形式本体论视角看，SX 欲望的纯粹形式是“超验的核心规定性”，而亲密关系的多样性是“经验层面的具体呈现”，二者呈现“一核多态”的内在关联：纯粹形式是多样性的“不变内核”，多样性是纯粹形式的“可变外显”。这种关联的本质的是：

第一，**纯粹形式的开放性**：SX 欲望的纯粹形式仅规定“深度联结”的核心要件，未对联结的对象、形式、表达作出任何限定，为经验层面的多样性提供了可能性空间；

第二，**个体差异的必然性**：不同主体的生命体验、人格特质、价值追求存在差异，导致 SX 欲望的经验呈现必然具有个性化特征——有的主体倾向于浪漫化表达，有的主体偏好非浪漫深度联结，有的主体需要性的参与，有的主体则满足于无性共鸣，这些差异都是纯粹形式的合理延伸；

第三，**社会语境的塑造性**：尽管纯粹形式是超验的，但亲密关系的具体呈现会受社会语境影响，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中的主体，会在自身语境中探索契合 SX 欲望的亲密形态，这进一步丰富了多样性的表现形式。

简言之，SX 欲望的纯粹形式本身就蕴含着“反单一、反标准”的内在倾向，其经验呈现必然是多元的、多样的、个性化的。任何试图将亲密关系限定为单一形态的做法，都是对 SX 欲望本质的误读。

2.3SX 欲望多样性的具体维度：经验层面的呈现

SX 欲望的多样性在经验层面具体表现为四个维度，每个维度都突破了顺性别异性恋霸权的单一框架：

第一，**联结对象的多样性**：SX 欲望的投注对象可包括不同性别（顺性别、跨性别、非二元性别）、不同身份（恋人、朋友、伙伴）、甚至非人格化存在（理想、艺术、信仰、事业），核心是“能产生深度共鸣”，而非对象的具体类

别或社会身份；

第二，**联结形式的多样性**：可表现为酷儿柏拉图关系（QPR）、浪漫柏拉图关系、传统恋爱关系、无性亲密关系、多元亲密关系（ENM）等，不同形式的核心区别仅在于“是否包含浪漫元素”“是否包含性元素”“是否具有排他性”等非本质特征，均不影响其对 SX 欲望的满足；

第三，**表达模式的多样性**：有的主体以强烈的情感表达呈现 SX 欲望，有的主体以静默的陪伴与支持呈现，有的主体追求密集的互动，有的主体保持适度的边界，表达模式的差异源于个体特质，而非关系价值的高低；

第四，**关系目标的多样性**：有的主体追求长期稳定的共生关系，有的主体满足于阶段性的深度联结，有的主体注重精神层面的共鸣，有的主体强调生活层面的共生，目标的差异是 SX 欲望个性化呈现的结果，均具有正当性。

这些多样性维度共同表明：亲密关系的形态是无限开放的，不存在“唯一正确”的模式，顺性别异性恋霸权所推崇的单一范式，只是多样性中的一种特殊形态，而非普遍标准。

三、顺性别异性恋霸权主义的狭隘性：本质、表现与危害

3.1 顺性别异性恋霸权主义的核心逻辑与本质

顺性别异性恋霸权主义（Cisheteropatriarchy）是一种以顺性别、二元性别对立、生殖导向、婚姻制度为核心的权力体系，其核心逻辑是：**将自身所倡导的亲密范式（顺性别异性恋+浪漫爱情+婚姻+生殖）设定为唯一“自然、正常、高级”的形态，通过权力运作，将所有偏离该范式的亲密关系与欲望定义为“异常、病态、低级”，从而维护自身的垄断地位**（Warner,1999;Butler,1990）。

这一霸权体系的本质是对“亲密本质”的误读与对“欲望自由”的剥夺：它将亲密关系的本质从“主体的本真联结”扭曲为“符合霸权规范的形式表演”，将欲望的自由从“个体的自主选择”限制为“霸权框架内的有限表达”。其狭隘性的根源在于：将一种特殊的、历史建构的亲密形态，误视为普遍的、自然的、必然的存在，从而陷入“单一标准”的认知偏见与“霸权垄断”的权力诉求。

3.2 顺性别异性恋霸权主义狭隘性的具体表现

顺性别异性恋霸权的狭隘性并非抽象概念，而是通过具体的权力运作机制呈现，其核心表现为四个层面的“双重标准”与“排他性实践”：

3.2.1 定义权垄断：将“特殊形态”升格为“普遍标准”

顺性别异性恋霸权通过垄断亲密关系的定义权，实施“标准绑架”：

它将“顺性别异性恋+浪漫+性+婚姻”的组合定义为“完整的亲密关

系”，而将其他形态（如 QPR、浪漫柏拉图关系、无性亲密关系）定义为“残缺的”“不完整的”“过渡性的”；

它将 SX 欲望狭隘地定义为“异性恋浪漫冲动”或“生理性性欲”，剥夺了其“存在性融合驱力”的本质内涵，将不符合该定义的 SX 欲望（如非浪漫深度联结、跨性别深度共鸣）污名为“不正常”。

这种定义权垄断的狭隘性在于：无视 SX 欲望的本质与多样性，将一种特殊的经验形态强行升格为普遍标准，用单一框架框定无限丰富的亲密实践。

3.2.2 性别与身份的双重禁锢：排斥“非二元”与“非顺性别”联结

顺性别异性恋霸权以“二元性别对立”与“顺性别优先”为核心预设，实施严格的身份禁锢：

在性别维度，它将“异性联结”视为唯一合法的亲密形态，排斥同性联结、跨性别联结、非二元性别联结，将其标签化为“违背自然”“道德瑕疵”；

在身份维度，它将“顺性别身份”视为亲密关系的前提，对跨性别者、非二元性别者的亲密实践实施制度性排斥与社会歧视，否认其 SX 欲望的正当性。

这种禁锢的狭隘性在于：将性别与身份作为亲密关系的“前置筛选标准”，而非将“本真共鸣”作为核心依据，违背了 SX 欲望“去身份化”的本质特征，剥夺了非顺性别、非二元性别主体的亲密自由。

3.2.3 形式主义崇拜：将“制度形式”凌驾于“本真联结”

顺性别异性恋霸权高度崇拜“制度化形式”，将婚姻契约视为亲密关系的“终极合法性证明”，实施“形式压迫”：

它将婚姻作为衡量亲密关系价值的核心标准，认为“未结婚的亲密关系”不如婚姻“稳定”“神圣”“有价值”，从而忽视了亲密关系的本质是“主体间的本真联结”，而非“制度性的契约绑定”；

它将“浪漫叙事”与“性互动”视为亲密关系的“必要元素”，认为“无浪漫”“无性”的亲密关系是“缺乏激情”“不够深爱”的，从而否定了 SX 欲望可以通过非浪漫、无性的方式实现深度满足。

这种形式主义崇拜的狭隘性在于：混淆了“形式”与“本质”的关系，将制度形式、浪漫标签、性互动等非本质特征，视为亲密关系的核心价值，从而遮蔽了“强度共鸣”“非工具性”等 SX 欲望的本质需求。

3.2.4 制度性排斥与资源垄断：剥夺非规范性关系的合法权益

顺性别异性恋霸权通过制度设计与资源分配，实施“特权赋予”与“排斥剥夺”的双重实践：

在制度层面，它将婚姻制度作为亲密关系合法化的唯一路径，赋予已婚伴侣一系列特权（如财产继承权、医疗决策权、社会福利分配权），而将 QPR、浪漫柏拉图关系等非婚姻亲密关系排除在制度保障之外，使其处于“法律边缘”；

在资源层面，它通过媒体宣传、教育体系、文化产品，大量传播顺性别异性恋亲密范式，将其塑造为“理想生活模板”，而对非规范性亲密关系的正面呈现严重不足，导致其面临社会歧视与文化压抑。

这种制度性排斥的狭隘性在于：以霸权规范为依据，对不同亲密形态实施“差别对待”，将资源与权益向单一范式倾斜，剥夺了多元亲密关系主体的平等权利，强化了“单一标准”的霸权逻辑。

3.3 顺性别异性恋霸权狭隘性的危害：对个体与社会的双重压迫

顺性别异性恋霸权的狭隘性不仅是认知层面的偏见，更带来了实质性的压迫与危害，体现在个体与社会两个层面：

3.3.1 对个体的压迫：欲望异化与身份焦虑

对个体而言，霸权的狭隘性导致 SX 欲望的异化与主体身份的焦虑：

欲望异化：不符合霸权规范的 SX 欲望（如非浪漫深度联结、跨性别共鸣）被压抑、扭曲或污名化，主体不得不将自身欲望“翻译”为霸权认可的形式（如假装浪漫、强迫自己进入异性恋关系），导致欲望与本质的分裂；

身份焦虑：非顺性别、非异性恋、非婚姻关系的主体，在霸权凝视下陷入“自我怀疑”与“身份羞耻”，认为自身的亲密实践是“错误的”“不正常的”，从而产生严重的心理压力与身份焦虑。

这种压迫的本质是对个体“存在自由”的剥夺——主体无法按自身欲望的本真形态选择亲密关系，只能在霸权框架内进行“被迫表演”。

3.3.2 对社会的危害：扼杀多样性与阻碍社会进步

对社会而言，霸权的狭隘性导致亲密关系领域的“同质化”与“僵化”：

扼杀多样性：霸权通过单一标准的规训，迫使个体放弃本真的亲密实践，向顺性别异性恋范式靠拢，导致亲密关系形态的同质化，扼杀了多元创新的可能；

阻碍社会进步：霸权维护的是“性别二元对立”“制度垄断”“特权分配”的不平等结构，其狭隘性与排他性与现代社会倡导的“平等、包容、多元”价值理念相悖，阻碍了社会在亲密关系领域的进步与解放。

这种危害的本质是对“社会活力”的扼杀——一个健康的社会应包容多元

的亲密形态，而霸权的狭隘性则通过“单一标准”压制了社会的多样性与生命力。

四、多元亲密关系的正当性：基于 SX 欲望纯粹形式的论证

4.1 多元亲密关系的核心正当性依据：本真与自主

基于 SX 欲望的纯粹形式，多元亲密关系的正当性并非源于“对霸权的反抗”，而是源于其自身的“本真属性”与“自主特征”——任何亲密关系，只要符合 SX 欲望的核心要件（强度、共鸣、优先性、非工具性），并基于主体的自主选择，就具有不可剥夺的正当性。这一正当性依据可具体分解为两个层面：

4.1.1 本真依据：契合 SX 欲望的纯粹形式

多元亲密关系的本真正当性在于：它们都是 SX 欲望纯粹形式的合理经验呈现，尽管形态各异，但都满足“深度联结”的核心需求：

酷儿柏拉图关系（QPR）：以非浪漫、非性的方式实现强度共鸣与优先性联结，契合 SX 欲望的“去标签化”“去性化”本质；

浪漫柏拉图关系：以浪漫情感为纽带，实现精神层面的深度融合，契合 SX 欲望的“强度共振”“存在融合”需求；

传统亲密关系：以异性恋、浪漫、性、婚姻为形式，实现深度联结，同样是 SX 欲望的合理呈现；

无性亲密关系：以无性互动为基础，通过精神共鸣与生活共生满足 SX 欲望，突破了“性=亲密”的霸权预设。

这些形态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以“本真共鸣”为核心，而非以霸权规范为依据，因此都具有本质上的正当性。不存在“某一形态更高级”的说法，只存在“某一形态更契合特定主体”的差异。

4.1.2 自主依据：主体的自由选择与关系自治

多元亲密关系的自主正当性在于：它们是主体自主选择的结果，体现了“关系自治”的核心价值——亲密关系的意义与形式，应由当事人共同定义，而非由外部霸权强加。这一自主依据包含两个核心内涵：

选择自由：主体有权根据自身 SX 欲望的本真形态，选择契合的亲密形式，不受性别、身份、制度的预设限制；

定义自由：主体有权自主定义关系的边界、承诺、意义，拒绝外部霸权的标签强加（如“必须浪漫”“必须结婚”“必须有性”）。

这种自主正当性是对顺性别异性恋霸权“标准绑架”的根本反抗——它证明了亲密关系的价值不在于“符合规范”，而在于“契合主体”，从而将亲密关系的定义权从霸权手中夺回，归还于个体。

4.2 多元亲密关系的反霸权意义：并非“替代霸权”，而是“解构霸权”

需要明确的是，倡导多元亲密关系并非要建立新的“多元霸权”，也并非要否定传统亲密关系的价值，而是要解构“单一标准”的霸权逻辑，构建“多元包容”的亲密秩序。其反霸权意义具体体现在三个层面：

4.2.1 解构“唯一标准”：证明亲密关系的开放性

多元亲密关系通过具体实践证明：亲密关系不存在“唯一正确”的模式，SX 欲望的多样性决定了亲密形态的无限可能。这种实践本身就是对顺性别异性恋霸权“单一标准”的解构——它打破了“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构建了“各得其所”的多元思维，让不同形态的亲密关系都能获得平等的尊重与认可。

4.2.2 重构“正当性标准”：从“霸权规范”到“主体本真”

多元亲密关系将亲密关系的正当性标准，从“是否符合顺性别异性恋霸权规范”重构为“是否契合主体的本真欲望”与“是否基于主体的自主选择”。这一重构的核心意义在于：将亲密关系的价值评判权从外部霸权归还于个体，让每个主体都能成为自身亲密关系的“立法者”，而非霸权规范的“服从者”。

4.2.3 推动“社会包容”：构建反压迫的亲密秩序

多元亲密关系的实践推动了社会层面的包容与进步：它挑战了“性别二元对立”“顺性别优先”“婚姻中心主义”等霸权结构，促进社会对非规范性亲密关系的认知与接纳；它为边缘群体（如跨性别者、无性恋者、酷儿群体）提供了“被看见”“被认可”的空间，减少了其面临的社会歧视与制度排斥；它推动社会建立更加平等的制度保障体系，让所有亲密关系主体都能获得平等的权益与尊重。

五、倡导多元包容：反霸权的亲密关系伦理构建

5.1 反霸权亲密伦理的核心原则

基于 SX 欲望的纯粹形式与多元亲密关系的正当性，我们应构建一种“多元包容、主体自主、平等尊重”的反霸权亲密伦理，其核心原则包括三项：

5.1.1 多样性原则：承认并尊重所有本真亲密形态

多样性原则的核心是：放弃“单一标准”的霸权思维，承认亲密关系的形态是无限开放的，任何基于 SX 欲望本真表达的亲密形态（无论是否浪漫、是否有性、是否婚姻化、是否异性恋），都具有平等的正当性。这一原则要求我们：

拒绝对亲密关系进行“高低优劣”的价值排序；

尊重个体根据自身欲望选择亲密形态的自由；

摒弃“正常/不正常”的二元标签，以“本真/虚假”作为评判亲密关系的核心依据。

5.1.2 自主原则：保障主体的关系自治与选择自由

自主原则的核心是：将亲密关系的定义权、选择权、管理权完全归还于主

体，反对任何外部霸权的干预与规训。这一原则要求我们：

尊重主体对关系边界、承诺、形式的自主约定，拒绝强加“必须浪漫”“必须结婚”“必须排他”等外部要求；

反对将性别、身份、性取向作为亲密关系的“前置限制”，保障所有主体的平等选择权利；

支持主体根据自身欲望的变化，调整亲密关系的形态，拒绝“一旦选择终身绑定”的僵化思维。

5.1.3 平等原则：消除制度性歧视与特权分配

平等原则的核心是：在制度层面与社会层面，为所有亲密关系主体提供平等的权益保障与尊重，消除顺性别异性恋霸权带来的特权分配与制度性排斥。这一原则要求我们：

推动制度改革，将非婚姻亲密关系（如 QPR、同居关系）纳入法律保障体系，赋予其与婚姻关系平等的财产权、医疗决策权、福利分配权；

消除社会歧视，反对对非规范性亲密关系的污名化与偏见，营造包容多元的社会文化氛围；

在教育、媒体、文化等领域，增加多元亲密关系的正面呈现，打破顺性别异性恋范式的垄断性传播。

5.2 反霸权亲密伦理的实践路径：从个体到社会的协同行动

构建反霸权的亲密关系伦理并非抽象的理论诉求，而是需要从个体到社会的协同行动，具体可分为三个层面：

5.2.1 个体层面：觉醒与自主实践

个体层面的核心是“欲望觉醒”与“自主实践”：

自我觉醒：认识到 SX 欲望的本真本质与多样性特征，摆脱霸权规训带来的自我怀疑与身份焦虑，接纳自身欲望的个性化形态；

自主选择：勇敢地选择契合自身欲望的亲密形态，拒绝“假装符合霸权规范”的被迫表演；

边界坚守：在亲密关系中坚守自主定义的边界，拒绝外部霸权的标签强加与干预。

5.2.2 关系层面：协商与共建

亲密关系层面的核心是“平等协商”与“共同建构”：

平等沟通：关系双方基于自身的本真欲望，平等协商关系的形式、边界、承诺，拒绝一方对另一方的“霸权式要求”；

动态调整：根据双方欲望的变化与生活的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关系

形态，拒绝僵化的“关系模板”；

互相支持：共同抵御外部霸权的压力与歧视，维护关系的自主性与正当性。

5.2.3 社会层面：倡导与制度改革

社会层面的核心是“文化倡导”与“制度改革”：

文化倡导：通过学术研究、媒体宣传、公益活动等方式，传播多元亲密关系的理念，消除社会偏见与污名化；

教育普及：将多元亲密关系伦理纳入教育体系，培养个体的包容意识与尊重能力，从根源上解构霸权思维；

制度改革：推动相关法律与政策的完善，消除对非规范性亲密关系的制度性排斥，保障所有主体的平等权益。

六、结论与展望

6.1 核心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对 SX 欲望纯粹形式、顺性别异性恋霸权狭隘性与多元亲密关系正当性的系统论证，得出以下核心结论：

1、SX 欲望的纯粹形式是剥离性别、性、制度等社会附加物后，以强度吸引、存在融合、唯一性优先与非工具性为核心的存在性驱力，其本质具有去预设性与开放性，决定了亲密关系必然呈现多元形态；

2、顺性别异性恋霸权的狭隘性本质在于“单一标准”的认知偏见与“霸权垄断”的权力诉求，具体表现为定义权垄断、性别身份禁锢、形式主义崇拜与制度性排斥，其危害是对个体欲望的异化与对社会多样性的扼杀；

3、多元亲密关系的正当性源于“本真契合”与“主体自主”，酷儿柏拉图关系、浪漫柏拉图关系、传统亲密关系等各类形态，都是 SX 欲望的合理经验呈现，无高低优劣之分；

4、反霸权的亲密关系伦理应以“多样性、自主性、平等性”为核心原则，通过个体觉醒、关系共建与社会改革，构建包容多元、尊重自主的亲密秩序。

这些结论共同表明：亲密关系的价值不在于是否符合顺性别异性恋霸权的规范，而在于是否契合个体的本真欲望与自主选择。解构霸权的狭隘性，倡导多元亲密关系，本质上是对人类欲望本质的尊重，也是对个体自由与社会进步的推动。

6.2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文的研究局限在于：侧重于理论演绎与哲学论证，缺乏经验研究的数据支撑；对不同文化语境下顺性别异性恋霸权的表现差异与多元亲密关系的实践差异，未能展开深入分析。

未来的研究可从三个方向推进：

第一，**经验研究的补充**：通过质性访谈、问卷调查等方法，收集不同亲密形态实践者的经验数据，验证本文的理论结论，丰富多元亲密关系的实践案例；

第二，**跨文化比较研究**：探讨不同文化语境下顺性别异性恋霸权的表现形式与多元亲密关系的发展状况，分析文化因素对亲密关系形态的影响；

第三，**制度改革的具体路径研究**：结合具体国家与地区的法律政策，探讨保障多元亲密关系权益的具体制度改革路径，为实践层面的反霸权行动提供更具操作性的指导。

6.3 最终启示

本文的最终启示在于：亲密关系的本质是“主体间的本真联结”，而顺性别异性恋霸权的狭隘性恰恰在于扭曲了这一本质，将亲密关系从“个体的自主选择”异化为“霸权的规范表演”。在一个日益强调个体解放与多元包容的时代，我们需要解构霸权的单一标准，倡导多元亲密关系的正当性——这并非要否定任何一种亲密形态，而是要让所有形态都能获得平等的尊重与认可；并非要建立新的霸权，而是要构建一个“各得其所、互相尊重”的多元秩序。

对每个个体而言，这意味着“勇敢地做自己”，按自身欲望的本真形态选择亲密关系；对整个社会而言，这意味着“包容地接纳差异”，为所有亲密形态提供平等的空间与保障。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亲密关系领域的解放，让每个人都能在本真的联结中获得存在的满足与自由。

女本位异性恋悖论：在旧结构里寻找胜利

前言

这几年，“女本位恋爱”逐渐流行于女性主义语境中，它代表一种对传统亲密关系的反转尝试：让女性在异性恋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以自身利益为优先，而非顺从男性的欲求与成长轨迹。“我就是玩玩，不投入”、“只要我保持清醒，就能不再受伤”。这类叙事为女性提供了主体性的幻想——仿佛只要态度够酷、策略更灵、精力够强，就能在父权制度内部获得胜利。然而，当这一概念从网络口号进入现实实践时，我们会发现：女本位的异性恋性缘关系往往无法成立，其局限并非源于个体情感能力，而来自异性恋制度本身的结构性陷阱。

本文并非对个体情感经验的否定，而是试图从社会结构层面理解异性恋关系中的资源流动。当越来越多女性开始尝试“女本位恋爱”时，也许更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在既有制度框架之内，女性主体性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一、关系内部的“权力反转”无法抵消外部结构的不平等

女本位恋爱试图让女性在关系内部拥有话语权，掌控情绪劳动分配，并不再承接男性成长成本。这种尝试本身具有解放意味，但异性恋制度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性别文化、情绪劳动分工紧密叠加，换句话说：亲密关系的权力只在内部被重新分配，却暂时忽略了社会结构的惯性。

本质在于：异性恋关系本身就是维持父权结构的制度基础。在《性的辩证法》中指出，性别制度源于生殖劳动的不平等分配，家庭与异性恋关系是维持社会再生产的核心装置。即便在私人关系里完成了微观权力反转，关系外部的制度资源仍系统性地倾向男性——包括职业声誉、性期待、婚育价值、社会评价与身体风险。因此，女本位恋爱的“反转”只能发生在私人领域，其效果会被结构性力量抵消。这并非女性主导能力不足，而是制度结构限制了其扩展性。

内部权力反转无法推翻外部资源偏斜。因此，女本位恋爱往往只能在微观情境中成立，而难以转化为整体女性权益的提升。其结果往往只是“擦亮眼睛派”或“婚女自强派”的变体：只要女性与男性形成强绑定关系，女性仍然是分散的个体，而非能够形成力量的女性同盟。

二、情绪与能量的流动本质上是结构性的，而非关系技巧的结果

女本位恋爱常有一种前提幻想“只要是我主导，我就能从关系里获得能量，不被消耗”，实则不然。在女男资源结构不平衡的现实下，女性常在实践中发现：即使自己保持主导位置，关系中的情绪与资源流动仍呈现从女到男的方向。Adrienne Rich 在“异性恋作为政治制度”一文中指出：异性恋并非自然选择，而是将女性劳动力、情绪与生育资源系统性输送给男性

的权力制度。也就是说，女性在亲密关系中对男性的赋能并不是心理特质或个人策略导致的，而是制度性结果：女性的情绪劳动与关系投入天然具备社会回报效应，而男性获得的好处会进一步转换为社会竞争力与符号资本。

因此，女本位恋爱并不会真正改变能量流动结构——它只是在更美观的外衣下延续了同样的路径：女性提供意义，男性获得成长；女性付出时间，男性获得资源；女性承担风险，男性获得经验。这并不意味着女性个人能力的失败，而是庞大的父权制度设计的自然结果。

在异性恋关系的性结构中，这种资源流动最典型体现在身体层面。所谓“纳入式性行为”长期被浪漫化为亲密关系的核心表达，但从结构上看，它更像是一种高度单向的设计：男性进入女性身体完成性行为与高潮，而女性的身体承担主要的风险与代价——包括怀孕风险、避孕负担、性暴力风险以及性行为后的社会评价差异。

换言之，所谓“纳入式亲密”并非中性的行为形式，而是围绕男性生殖结构组织起来的一种性脚本。它在文化叙事中被包装为爱情与亲密的象征，却在现实结构中持续巩固男性主体地位。女性在其中不仅提供情绪与时间，同时提供身体空间与生殖风险。即便在所谓“女本位”关系中，这一身体结构也很难被真正改变。

因此，女本位恋爱所尝试的权力反转往往停留在情绪与策略层面，而最底层的性结构仍然沿袭父权制度的设计。

三、女本位恋爱旧瓶装新酒与驯服男人的幻觉

当女性逐渐掌握恋爱技巧时，很容易发现一个事实：吸引男性、维持亲密与制造激情的能力往往具有高度可复制性。它并不指向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更像是一套已经存在的情感剧本。恋爱实践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完成一套社会化训练。女性通过不同的情感策略应对不同类型的男性，形成一种熟练的关系技能。

但这种技能本身很难转化为女性的长期资本。戴锦华老师在对“爱情神话”的多次论述中指出：现代性为女性提供的主要自我叙事路径是爱情，女性的成长、受苦、觉醒、成熟长期被绑定在爱情叙事之内，使女性将意义生产转移到关系中，而非自身。因为叙事框架被设定为“通过与男性的关系来完成自我”，即便女性在关系中掌握主导，其意义分配仍旧落在“亲密关系经验”这一轨道上。

这些都不能成为她的长期资本，也无法转化为可保留的资源，从中获得的经验也只能用于下一次的性缘关系，却对自身发展毫无补益。关系成为女性经验的容器，而非平台。女性以为自己在主导，但依旧在用关系证明自身，通过他者确认自我价值。

即便女性成功“调教”或“驯服”了男性，这种关系也未必带来真正的结构性收益。女性在其中获得的优越感，往往来自一种社会处境中的反差：在普遍女性失权的环境中，“拥有一个言听计从的男人”会被误认为是一种胜利。

然而这种优越感本质上仍然依赖于比较——它并不是女性自身资源增长的结果，而是与

其他女性处境的对照。这种逻辑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雌竞结构。更重要的是，男性本身并不是一种可以长期积累的资源。在调教与维持关系的过程中，女性投入大量时间、情绪与精力，同时减少对自身能力、事业与女性社群的投入。

最终形成一种悖论：女性消耗青春与资源，换来的只是却只是一个被调教过的普通男人。

四、女本位恋爱中女性的自我要求：保持上位与主导

表面上，女本位恋爱让女性从被动者转为主动者，但隐藏的代价是：女性必须时刻维持“主导者姿态”，对抗来自社会性别结构向下的惯性，不断监控自己以避免掉入弱势位置。结果，女性从对男性的顺从，转向对自我形象的监控和审视。这一系列行为本就与上位者的行为逻辑相矛盾，如同小学数学题目蓄水池一边进水一边出水。这是一种从“被动规训”到“自我规训”的转移，女性仍然不是自由的，只是换了一套枷锁。

在个体经验层面，许多女性会认为“只要我保持边界，让男性进入我的生活但不干扰我”，就可以维持一种平衡的关系。然而从社会结构角度看，男性进入女性生活往往并非简单的情感互动，而是一种缓慢的结构性渗透。

亲密关系并不是一个孤立空间。男性一旦进入女性生活，其价值观、时间安排、社交关系以及情绪需求都会逐渐影响女性的生活结构。例如时间被重新分配、社交圈发生改变、情绪关注点被转移、生活决策开始考虑男性因素。这种变化并不需要通过强制控制完成，而是通过日常互动逐渐实现，因此往往显得自然且难以察觉。

在宏观层面，这种渗透具有明显的性别方向：女性更容易围绕关系调整人生路径，而男性较少围绕女性关系改变自身结构。最终结果是，女性的生活空间被重新组织，而男性的生活轨道基本保持稳定。因此，所谓“让男人参与自己的生活”并不是一个中性行为，它往往意味着女性生活结构向男性需求进行重新排列。

五、真正的解放不是“女本位”，而是撤出异性恋中心叙事

女本位恋爱试图解决的问题是：“女人如何在异性恋关系里赢”的权力博弈。但更根本的问题是：为什么女性的自我价值必须通过性缘关系来定义？

女本位恋爱最深的陷阱不在姿态和情绪上，而是资源转移：只要把时间花在异性恋关系上，无论姿态如何，能量最终都外泄。女性投入每一小时，本来可以用于建立女性同盟、创作、学习、赚钱、运动、自我疗愈和人格成长。但进入性缘关系后必然会有很大一部分精力被转化为服务关系的能量，即使处于关系中的上位者，也要承担维持主体性、对抗社会规训、管理恋爱与自我的边界上。这谈不上享受，而是一种劳务。稍有不慎，就会落入俗套的叙事，进入传统婚姻，进入设计好的男本位故事，一路下滑。然而女本位关系却要苦心经营，这样对比，真是滑稽。

与其把人生资源投入到哺育异性恋旧结构中。不如将时间投入自我技能、身体、友谊、

精神与女性社群，告别爱情作为唯一合法叙事，不再以“是否有人爱”作为自我叙事的起点，把爱脚踏实地回归自己。

不是“女本位”，而是我本位。不需要紧绷着弦对比、丈量、审判自己。女性本自具足，自成圆满。你需要的不是恋爱对象，不是把人生投入到对第二性的调教与培养中，而是盟友，是利益共同体，是互相支持的女性社群、知识生产、现实世界的资源互助。

女本位恋爱试图在现有结构中为女性争取主动权，是女性意识觉醒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然而它无法触及根本问题——异性恋关系本身是父权制度的核心生产单位。只要这一结构存在，女性在关系中获得的任何主导权都会被外部社会结构抵消。

因此，比起换一种形式依赖男性，更彻底的路径是拒绝走入异性恋性缘关系，退出男主语的情感叙事，停止为父权结构持续提供燃料，将时间投入自身与女性社群。

从吞云吐雾到自我认同：公众吸烟行为的潜在 BDSM 结构

苍南会馆由木西

一项全国代表性的研究发现 68.8%的被调查者承认至少参与过一种 BDSM 幻想与实践。而某地区生理定义为雄性的群体吸烟率达到 52.1%。而根据公式 68.8/52.1 约为 1.32 可以毫无逻辑地得出每一次成功的支配行为平均对应 1.32 次烟雾肺部大环流事件。而在面对强制性吸入行为时受迫群众会做出不同回应，有强制叫停型、按兵不动型、踌躇忍耐型、遗憾离场型。不同回应也会激发施动者的后续相关行为，同时也与其相应心理阙值及预期息息相关。（**警告**：本文将出现空间气味支配，BDSM，气溶胶社会，烟雾领地标记等较露骨词汇，请未有过烟雾吸入式行为或被迫吸入行为人员谨慎阅读）

屏息凝神，透过危险颗粒物质观察其眉目神态，四肢的张弛幅度及夹烟指头和颈部歪移角度来推测其心理状态，透过其凸显的牙垢厚度、暧昧在喉腔和气道处的浓痰震颤声、指缝抖落的烟尘来推测其健康状态，以此为基础并结合 BDSM 理论研究推测在公众场合吸烟的有趣动机及其难耐的真实动机。

笔者有幸就读于一所生理定义为雌性群体比率较高的学术机构中，禁烟标识不仅存在设计上的美感更有实质性的约束。但一旦踏出脱离尼古丁的乌托邦就会直面人生的酸涩——化学意义上。踏出返乡的列车，正想感叹“千里〇〇一日还”就先被口粮烟喂饱，笔者只能双目含泪感慨真正意义上的回乡第一餐是来自红双喜白沙红塔山等父老乡亲的拳拳关怀。杂书里对于排山倒海对抗信息素的形容还是收敛了，头晕眼花中只是看到一双双蜡黄的指头在点点火光里激情飞舞，吞吐的气快一叠高过一叠，多巴胺和激素浑浊地混战、交锋然后妥协。原来这是用来划分社群的气味标志，笔者瞬间有一种侵入他人领地的无措感。收缩的口轮匝肌带动胡茬做着规律的共振运动，颤抖在嘶哑嘹亮的交谈声中。悟了！这种求生于焦油激情释放信息素的看似无逻辑行为和 BDSM 一样，神经层面的共情反应和随着参与经验的积累是呈线性反比的关系。在这一个建立完备的信任机制和权力协商的组织中嘴里赤条条的本人显得格格不入，提拉着行李逃了。

回到小窝把这份沉重的迎客礼冲洗完毕后总算是有了回家的实感，晃悠到隔壁公园看日头下沉小孩上树，利用抛物定理躲避着童子尿的覆盖范围，忽然遁入一阵空门，在熟悉的味道里笔者失去了几千年进化后的耳眼鼻舌声意功能，只是留下了“逃”这一大字的思想钢印，莫非本人也被面壁者选中来对抗三体！可在下并非逃亡主义！直视着目前这位西装革履的长条生物，手还未指到一旁灰不溜秋的标识，那张吞云吐雾的发动机就开始摆动手肘，让我想起了巡视领地的棕熊。居然忘了！他们通常拥有极高的界限敏感性，用气味标志领土后会严肃巡回守护，但资料也显示沟通能力强啊，我困惑抬头，柔韧的五官在延伸的肌肉群上起舞，多么灵动！双手在挥舞过程中也不忘保持烟头的平衡，天生的舞蹈家！又悟了，看来只能默默离场。

但调查并不会因为我的主观认知而停步，聚会餐桌上又陷入了这类集中制社群文化的漩涡，笔者在还未被陌生信息素标记的食物中努力翻找，拾取能回复相应血条的补给后一道长虹缓缓弥漫，云泽众生般临幸了每一道餐盘，安全词！需要安全词！原来他们是一群充满霸道气质临界值极强的群体，又是新知识。

怀揣着对神圣知识的好奇，笔者和同好们展开了并不专业的学术讨论。相比于亲历者更是班门弄斧自愧不如，毕竟能那般沉浸于混沌的沼泽中还能不忘扩充疆土的先锋者，我们这群纸上谈兵的小辈们又能称得上是什么呢？凭借笔者贫瘠的物理知识，勉强推断出在这个 3 亿者烟民的社会，公共空间的烟雾互动已然形成了一种气溶胶社

会关系结构，若透过 BDSM 研究中的支配—臣服模型（dominance－submission framework）来解释，笔者只能惴惴推想：施动者通过气味扩散暂时取得一定空间领域的主导权，让隶属于同一空间领域的承受者受到牵制影响，甚至可以说是透过气溶胶的一种身体所有权的互动转移。但对于空间支配的权力倾斜并不会停驻于此，如前文所提及的受迫群众的不同反应，看似主导者的气味扩散者实质上也许在期待看似被动者的攻势，皱眉、咳嗽、斥责等都会被视作一种可被读取并接收的社会信号，在这样左右摇摆的权力天平中 BDSM 竟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辛勤运作的肺叶到底承载了多少不能言说的渴望和不被看见的诉求，恐怕只能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了，笔者在此诚恳地恳请各位读者：关注这类群体在气溶胶社会关系中索求的情绪关怀。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史中，我们已学会共享阳光、共享街道，共享单车，也许终有一天，我们还会学会——更体面地共享彼此的空气。

田野调查地点：车站旁、公园里、餐桌上、禁烟标志旁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视域下“三从四德”的古今之变与当代歧途

摘要

本文站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立场，用历史唯物主义和人的解放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对传统的三从四德伦理进行历史的解构，并与当代的变体进行比较批判。剖析传统“三从四德”作为封建道德规则依附性的本质，关注“精英修养型”、“功利竞争型”两种当代变体，探究其对传统伦理的转化途径和内在局限，最后得出女性解放最终出路不在传统依附或者现代个体异化，而是社会经济运行方式改变的集体主义解放伦理。

关键词：三从四德；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封建伦理；异化；女性解放；比较研究

一、引言：一个伦理符号的变化历程

在思想政治教育课讨论传统伦理的时候，“三从四德”这一看似已经过时的封建礼教概念，却在当代社会中出现了多种不同的解释。有的人将其视为封建糟粕全盘否定，有的人对它的现代形式作了深入的探究。显然三从四德不再只是历史名词，而是内涵发生深刻变化的伦理符号。

本文分析的对象有三个方向，一是古代范本，即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出自《仪礼·丧服·子夏传》）和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出自《周礼·天官·九嫔》）构成的传统“三从四德”；二是当代变体一，香港黄冰芬提出的“从世界、从爱、从己；文德、武德、言德、容德、思德、辩德”的“精英修养型”版本；三是当代变体二，在网络流传的“从政从法从商，得权得利得财得势”的“功利竞争型”版本。

封建礼教的行为准则到现在的女性生存指南，三从四德的内涵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两种当代变体是对传统的对抗，还是批评继承？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怎样评判这一变化背后的伦理本质？本文将就“三从四德”的古今之变进行考察，以回答上述问题。

二、历史解构：传统“三从四德”的封建依附性伦理本质

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观点，传统的“三从四德”根植在封建小农经济以及宗法制度的基础上。在封建小农经济模式下，生产活动是以家庭为单位，男性依靠体力上的优势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占据社会物质生产的中心地位。女性被排除在公共生产领域之外，只能做家务劳动、纺织等辅助性劳动。这些劳动不是社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不能给女性带来独立的经济收入，女性的地位随之降低。

与此同时，封建宗法制度用血缘关系把人们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以父亲为中心的家族结构，家族利益的延续成了最重要的目标。女性被当作男性的附属品，女性存在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生育后代、维系家庭伦理秩序上。为了维护封建生产关系和宗法制度的稳定，统治阶级就必须要有一套伦理规范来约束女性行为，“三从四德”就是在这样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下产生出来的，是封建意识形态的重要构成部分。

传统的三从规定了女性在不同的时期应该服从的地位：未出嫁时服从父亲，出嫁后服从丈夫，

丈夫死后服从儿子。这也说明在封建法律体系当中，女性没有独立的财产权、继承权，也没有独立的诉讼资格，其所有的权利都是依附于男性的。

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角度看，“三从”的本质就是把女性当作“他者”的客体，否定了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的主体性。在这种伦理规范之下，女性的人生价值不能通过自我实现来体现，只能通过服从男性、服务家庭来获得认可。人身依附关系束缚了女性个人发展，用以维系封建等级制度的稳定，是统治阶级巩固统治的手段。

如果说“三从”是女性的人身依附关系，那么“四德”就是对女性的行为举止、道德品质的具体规定。妇德指女性应该贞静守节、温顺贤良；妇言指女性应该言语谨慎、不搬弄是非；妇容指女性应该容貌整洁、符合封建审美；妇功指女性应该精通家务、纺织等技能。

表面上是对于女性道德的培养，实际上是对于女性身体的规训和德性的窄化。四德所提倡的，就是把女性塑造为符合父权审美和家庭需要的合格客体。妇德所强调的贞节观念，其实质是为了保证家族血缘的纯正；妇功所要求的家务技能，只是为了使女性更好地为家庭生产、生活服务。伦理规范压抑了女性的主体性与创造性，否定了女性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权利，和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目标根本对立。

三、当代审视：两种变体的路径分化及其批判

（一）变体一：香港版——“精英修养型”转化

黄冰芬提出的当代“三从四德”对传统的版本进行彻底的翻转，将三从改为从世界、从爱、从己，倡导女性以全球视野看待问题、用爱心对待别人、用独立的姿态发展自己；把四德扩展为文德、武德、言德、容德、思德、辩德，将修养的目标转向个人竞争力的提高和社会形象的塑造。

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角度来说，该变体是进步的。首先它颠覆了传统的三从的人身依附关系，把女性看作独立个体的主体，情感上的主体，促使女性走出家庭走向公共生活，符合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基本方向。其次，“四德”扩大了“德言容功”的狭隘范围，把个人修养同社会竞争力联系起来，符合现代社会对女性综合能力的要求，表现出了对女性主体性的尊重与解放。

但是它的局限性也很明显，本质上它是一种个人主义、能力主义的自我提升方案，过分强调个人的努力和修养，忽略了社会结构上的不公对女性发展的影响。在现实社会里女性所遭遇的就业歧视、薪酬差别、家庭和工作的双重压力等，并不能靠个人修养来解决。同马克思主义注重集体行动与制度变革不同，个体的修养提升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女性的处境，并且同集体主义解放伦理存在内在矛盾。

（二）变体二：功利版——“功利竞争型”转化

在市场化、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下，网络流传的“从政、从法、从商，得权、得利、得财、得势”版“三从四德”与传统版本和香港版的价值取向完全不同。该变体完全撕下了道德的面纱，把“从”的对象从传统的父、夫、子，以及香港版的世界、爱、己，换成权力、法律、

市场等现代社会的主要权力源；把“德”的目标从道德修养、个人提升，直接指向权、利、财、势等稀缺资源，是对传统伦理的“反道德”式反动。

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角度出发进行尖锐的批判，它就成为异化的顶点。马克思认为异化就是人的活动及其产物反过来支配人的现象。女性在此种功利化的三从四德之下被工具化了，不再体现自我实现和全面发展，而只表现出对于权力、财富等资源的抢夺能力。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性别领域的具体体现，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化为竞争关系，把人的价值等同于物质财富和权力地位的占有，这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金钱拜物教”、“权力拜物教”的真实写照。

（三）两种变体的对比小结

两种当代变体都试图摆脱传统的三从四德的依附性伦理，但是它们的转化路径以及伦理本质有明显的不同，香港版走向个体修养和社会适应，希望通过提高个人能力来实现女性的独立和发展，功利版走向个体竞争和异化，把女性的价值完全绑定在物质资源和权力地位上。

但是两者都存在潜在的局限性，一是对结构性不平等的忽视，无论是个人修养还是个人竞争，都没有考虑到社会经济结构、制度设计等宏观因素对女性发展的制约，把性别平等问题简化为个人问题；二是原子化的个人主义前提，两者都把独立的、原子化的个体作为出发点，忽略了集体行动在女性解放中的作用，与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集体主义伦理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以个体主义的方式进行选择，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女性所处的状况，也不能达到真正的性别平等。

四、批判性综合：寻找超越“依附”与“异化”的解放路径

从传统的“三从四德”依附性伦理到当代两种变体的生存策略，三从四德的古今之变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的必然结果。封建小农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打碎了传统的宗法家族制度，女性开始有进入公共生产领域的机会，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动，这是历史的进步。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资本和市场逻辑并没有消除性别压迫，反而制造出新的更隐蔽的束缚方式。消费主义把女性的价值同外貌、身材、消费能力联系起来，对女性实施新的身体规训；成功学把女性的成功界定为权力、财富的占有，迫使女性投身于异化的竞争当中。新的束缚形式同传统的依附性伦理相比，更加隐蔽、欺骗，成为阻碍女性解放的新障碍。

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来看待传统依附性伦理和当代异化式生存方式，虽然形式相反，一个压抑女性欲望与主体性，一个激励女性欲望和竞争性，但本质上都背离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终极目标，没有真正实现女性解放。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给女性解放指明了正确的道路。真正的女性解放伦理要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摆脱传统依附和现代异化两种困境，应该包含以下三个维度：

首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解放最终要依靠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来达成。女性所受到的压迫，本质上是由社会经济结构不合理所造成的。女性解放的根本，就

在于改变造成性别压迫的社会经济结构。只有从经济基础入手，才能给女性解放提供坚实的物质保证，使女性真正实现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

其次，超越原子化的个人主义，提出集体主义、团结互助。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解放离不开集体解放。女性解放不能单独依靠个人力量来完成，而需要全体女性乃至整个社会共同参与。因此必须摆脱原子化的个人主义观念，建构起女性间团结互助的关系，进而形成推动性别平等的集体力量。

最后定义全面的成功，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真正的女性解放伦理，要打破传统依附性伦理和现代异化生存方式对女性价值的片面定义，把女性的价值从依附他人或者占有资源中解放出来。女性的价值并不在于顺从男性、服务家庭，也不在于拥有多少权力和财富，而是在自由联合的劳动和社会参与中发挥人的创造性的潜能。这样对女性价值的全面阐释既承认女性的个体差异和发展需要，又肯定女性作为社会成员的责任和使命，与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是一致的。

结论

本文通过对传统“三从四德”依附性伦理的历史解构，对香港“精英修养型”与“功利竞争型”两种当代变体的批判性比较，发现“三从四德”古今之变背后的社会经济动因和意识形态博弈。经过研究得知，传统的三从四德产生于封建的经济基础与宗法制度之上，核心特征就是人身依附和主体性的被压抑；当代两种变体试图摆脱这种依附性，但是它们又陷入了个体主义、异化的逻辑之中，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解放。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给女性解放赋予了根本遵循，女性的彻底解放离不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离不开集体主义的行动逻辑，离不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女性解放不是孤立的性别问题，而是全社会解放的重要尺度，其伦理建设要和改造世界的实践相结合。

注

虽然功利版有不妥之处，但作者目前站功利版一方。

当亲密关系变成追逐游戏：男性回避型与女性焦虑型依恋的社会结构根源

摘　　要

本论文旨在讨论当代城市青年亲密关系中存在一种普遍的互动模式：男性表现出情感回避、生活技能缺陷、性压抑等特征，同时却在政治、历史、金融等宏大叙事领域表现出知识自信；女性则呈现出高度的情感依赖、焦虑倾向与确认需求。本文基于一段持续 900 余天的异地亲密关系质性案例，运用依恋理论、性别社会化理论与权力资源分配理论，论证这一互动模式并非个体病理，而是权力结构失衡、性别分工差异与情感资本分配不对等的结构性产物。研究发现：男性的情感回避根植于成就导向的社会化与竞争焦虑；女性的焦虑依赖源于资源获取渠道的性别差异；两者的互动强化了'追逐-退缩'循环。本文进一步指出，在经济与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的条件下，女性倾向于将身体与情感资本作为资源交换的工具，这一现象应被理解为一种结构适应而非道德评价。

关键词：性别社会化；依恋类型；权力资源分配；情感劳动；亲密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1.1 现象观察：一个典型的互动困境

在当代城市青年的亲密关系中，存在一种看似矛盾但频繁出现的互动模式。研究样本（一段跨越 900 余天、涉及异地分居的亲密关系）显示，这种模式呈现出明显的性别特征。

男性方面的特征包括：情绪表达能力严重不足，难以用言语传达内心感受；在日常生活技能上呈现'巨婴'状态，不能整理居住空间、对饮食营养一无所知、对卫生习惯缺乏自觉；对关系冲突的回避与逃避，常以'冷战'或逻辑论证替代情感沟通；性压抑表现为两种极端，要么

频繁泄欲需求，要么完全分离性与爱的关系；知识自信表现在宏观叙事领域（政治分析、历史论述、金融讨论、军事策略、游戏竞技）的频繁发言和专业化表达。

女性方面的特征包括：高度的情感投入与焦虑，将伴侣的回应视为自我价值确认的重要来源；强烈的确认需求，频繁寻求口头保证与关注；将亲密关系置于人生目标的核心位置，对其稳定性的关注过度；当受到冷遇时迅速陷入自责与内疚，尝试通过调整自身来维持关系；对外貌、身体的高度投入，将其视为维系关系的重要资本。

1.2 理论空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互动

现有的心理学解释通常将其归咎于原生家庭的依恋模式、个体气质差异或激素水平差异。但这些解释均落入'生物决定论'或'个体心理论'的陷阱，忽视了更深层的社会结构性根源。

本文提出的核心问题包括：为什么男性会被塑造成知识型却生活技能贫乏的样子？为什么女性更容易在亲密关系中形成焦虑型依恋？这些特征与当代社会的权力结构、资源分配方式有什么关联？

本文提出的核心假设是：这些看似个性化的亲密关系困境，实际上是当代社会性别权力结构的微观体现。改变这些行为，需要从结构而非仅从心理层面理解问题。

二、理论框架

2.1 依恋理论的局限与扩展

Bowlby（1969）的依恋理论强调童年期与主要照顾者的关系对成人亲密关系的影响。但传统依恋理论的不足在于：过度心理化，忽视社会结构因素；强调'内部工作模式'，弱化现实权力关系的持续影响；将依恋类型视为相对固定的特质，而非情境与关系动态的产物。

本文扩展的框架认为：依恋类型不仅源自原生家庭的内化，更源自个体在当前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获取资源的方式、与伴侣的权力关系。在不对等的权力结构中：掌握外部资源的一方更容易形成回避型依恋；依赖于关系内部确认的一方更容易形成焦虑型依恋。

2.2 性别社会化理论：差异化的生存逻辑

West & Zimmerman（1987）的'性别做'理论指出，性别在社会互动中不断'被做'出来。在当代中国，性别社会化体现为两套截然不同的生存逻辑。

男性社会化的核心逻辑：竞争导向，成就优先，情绪压抑，工具理性。女性社会化的核心逻辑：关系维护，外貌重视，情感劳动，依附稳定。

这种差异化社会化的结果是：男性和女性被塑造成了互补但不平等的角色。男性被教导在竞争中成功，女性被教导在关系中成功。

2.3 权力资源分配理论

Blood & Wolfe（1960）的资源理论指出，亲密关系中的权力分配与双方拥有的资源成正比。资源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身体资本、情感资本。

当代中国的现象是：男性相对掌握更多的经济与社会资本，而女性则被期待更多地投入身体与情感资本。这导致：当女性无法在经济与社会领域获得足够的资源确定性时，她会更加依赖于亲密关系作为安全的来源。

2.4 情感劳动理论

Hochschild（1983）指出，情感表达、关系维护等本质上是劳动，且被性别化且被贬低。在样本关系中，女性负责识别冲突、提起讨论、寻求解决方案；女性负责记住重要日期、计划活动；女性为关系'健康'承担责任。

这种情感劳动的性别化分配不仅强化了权力的不对等，也直接造成了女性的焦虑与自责。她内化了'关系好坏取决于我的付出'的信念。

三、案例与数据呈现

3.1 研究材料与方法

本研究基于一段持续 900 余天（约 2.5 年）的异地亲密关系的文本记录。数据来源包括：微信对话记录分析（约 50 万字）、冲突事件时间线（35 次主要冲突）、情感表达模式对比、日常分工记录。这种纵向质性设计使我们能够追踪互动模式的变化，而非仅观察静态特征。

3.2 男性回避型依恋的形成机制

机制一：成就导向社会化与关系去中心化。在样本数据中，男性对宏大叙事讨论占总沟通的 32%，日常温暖互动占 18%，理性问题解决占 28%，情感表达占 12%。这反映了一个关键事实：在男性的认知结构中，关系被置于'生活的补充'而非'生活的核心'。这不是因为他'不爱你'，而是他的自我认同、社会评价、心理满足感更多地来自于外部竞争的成功。

机制二：性压抑与情欲分离。样本中男性表现出对性的频繁需求，但同时缺乏对伴侣情感整体性的认可。这是社会化的结果：性被视为生理需求，而非情感表达；情感表达被视为软弱；性泄欲被合理化为'释放压力'。因此他会高频性需求、低频情感表达、对伴侣生理的冷漠、将性与爱分离。

机制三：权力焦虑与情感逃避。男性最频繁的回避出现在讨论财务压力、职业前景、为关系做出改变时。他的反应是理性化、转移话题、自我保护。这反映了深层焦虑：在经济与社会压力巨大的社会中，他对维持地位的能力缺乏信心，因此无法在亲密关系中呈现脆弱。任何关系问题都可能被他解读为'对我能力的质疑'，因此他选择回避。

3.3 女性焦虑型依恋的形成机制

机制一：关系依附作为存在确认。样本中女性对确认的需求体现在每日问候的期待、'我爱你'频率的敏感、对冷遇的极度反应。这不仅源自原生家庭，更根本地源自社会结构的消息：你的价值与被'选择'的程度相关；你的安全感应当来自某个男性；你在关系中的位置比职业位置更重要。在这样的结构消息中，女性将亲密关系投资化、绝对化。

机制二：身体资本的投入与焦虑强化。女性对外貌与身体的投入远高于男性。从权力资源的角度看，这是女性在经济与社会资源获取受限时的理性投入。当女性难以获得与男性相当

的资源确定性时，身体成为可以立即投入、被评价、被交换的资本。但这导致悖论：通过身体投入来维系关系，但同时产生对自身价值的焦虑（'我只有这个吗'），这种焦虑又强化了对伴侣确认的需求。

机制三：情感劳动的内化与自责。女性在冲突后会自责、主动调整、情感付出、最后陷入绝望。这反映了情感劳动的内化：她相信'关系的质量取决于她的投入'。权力的不对等表现为：男性可以维持'我没有问题'，女性则承担'如果关系出现问题，那是我的责任'。

四、'追逐-退缩'循环的动力学

4.1 互动模型

第一阶段（触发）：女性感到被忽视，提出关系议题，表达情感需求。

第二阶段（男性回避）：男性感到被'要求'或'质疑'，启动回避机制（逻辑反驳、转移话题、冷战）。他的回避强化了权力优势—他可以选择不沟通。

第三阶段（女性强化）：女性的不被回应加剧焦虑，提升追求强度（更频繁的信息、更多确认需求、改变外貌）。她相信'如果更努力，他就会回应'。

第四阶段（男性进一步退缩）：男性感到被'缠绕'，回避升级（沉默、冷漠、情感撤回）。他自我合理化：'她太需要我了''她情绪化'。

第五阶段（恶性循环）：女性焦虑最高，男性回避最高，两人陷入绝望。但女性因依赖难以离开，男性因缺乏依赖可以维持冷漠。

4.2 权力结构的维持作用

这个循环难以破解，因为权力结构的维持：男性的权力来自'不必回应'，他可以沉默，女性无法强制沟通；女性的劣势来自'过度投入'，她已投入太多，难以离开；社会规范强化，责备'黏人'的女性，为'忙碌'的男性开脱；心理学个体化，两人都将问题理解为'性格不合'而非结构问题。

五、女性身体资本投入的结构解释

5.1 资源分配不均与身体资本化

为什么女性更倾向于通过身体与外貌来维系关系？传统解释是'爱美''虚荣'，但这忽视了经济学事实：身体资本的投入是女性在权力结构中的理性选择。

机制一：其他资本获取渠道的堵塞。女性在经济与社会资本获取上面临障碍：职业歧视、婚育成本不对等、难以进入男性网络。在这些约束下，可立即投入的资本是身体与外貌。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经济学选择。

机制二：亲密关系中的身体资本交换。女性对身体的投入与对关系稳定性的焦虑直接相关：被忽视时购买衣服、做发型；失宠时健身、护肤；冷漠时主动性接触。这是用身体资本换取伴侣的关注与确认。问题是：为什么必须用身体换情感？答案是：她在其他资本上缺乏优势。

机制三：身体投资的陷阱。这种策略反而导致：对自身价值的贬低（相信自己的价值=身体吸引力）、对伴侣的依赖增加、焦虑的强化（身体衰老成为新焦虑）、权力的进一步失衡。最终，维系关系的身体投入成为了强化她的依赖与焦虑的工具。

5.2 社会规范的强化机制

女性为什么接受身体投资？因为社会规范强化：媒体说'漂亮的女性更容易找好男人'，广告说'购买产品可以提升价值'，家庭说'要打扮自己才能抓住男人的心'，同辈说'看你这样，难怪他冷淡'。这些规范将女性的权力缺失合理化、自然化、个人化了。女性开始相信问题在于'自己不够好'，而不是结构的不公。

六、讨论：当代中国青年的结构性困境

6.1 精英焦虑与男性情感缺失

样本中男性的情感回避与职业焦虑、精英竞争压力密切相关。职业压力大时，他的情感表达减少；失败时，他的防卫更强；成功时，他视为个人成就而非与伴侣分享。这反映了当代

青年男性的结构困境：市场化竞争压力（每一次休息都被视为竞争退出）、家庭期待压力（作为家族上升通道）、性别话语约束（被禁止脆弱）。在这些压力下，亲密关系成为压力释放阀而非情感寄托。

6.2 女性依赖与安全感缺失

女性的焦虑型依恋源于结构性不安全感：经济独立困难（婚育成本与职业中断不对等）、社会身份不稳定（与男性的妻子身份相绑）、生育焦虑（时间压力）、个人价值外化（价值与外貌、关系地位相联系）。在这样的不安全中，女性将亲密关系绝对化为'救命稻草'。这不是她的问题，而是结构压力的产物。

6.3 情感劳动的性别化与权力再生产

Hochschild 发现，情感劳动的性别化分配是权力不对等的关键机制。在样本中：女性识别问题、提起对话、推动解决；男性决定参与程度、有权拒绝；女性承担失败责任、男性维持'尽力了'立场。这种微观权力分配强化了宏观的性别结构。每次女性主动追求、男性被动回应，都在重复一个消息：男性是'消费者'，女性是'服务提供者'。

七、结论与反思

7.1 三个核心结论

第一，回避与焦虑是结构性产物，非个体病理。男性回避不是'不会表达'，而是被社会化为在竞争中寻求价值。女性焦虑不是'太敏感'，而是被结构化为在关系中寻求安全。改变需要对结构性条件的改变，不仅是心理治疗。

第二，权力资源的不平等强化了性别差异。女性在经济与社会资源上劣势，会更依赖亲密关系；男性掌握更多资源，可选择更多退出。结果是：女性为维系关系投入越多，依赖越深，权力越不对等。这形成了自我强化的负反馈循环。

第三，亲密关系的困境反映了社会的结构矛盾。男性焦虑与女性不安全都源于当代的高度竞争与不确定性。亲密关系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反而被扭曲。任何在关系内部'解决'矛盾的努力（更多沟通、更深理解）都面临结构限制。

7.2 去道德化的理解

本研究重要意图是去道德化：男性回避不是'渣'，而是结构适应；女性依赖不是'黏'，而是结构约束；女性身体投入不是'虚荣'，而是给定约束下的理性选择。理解结构基础，比道德评判更有助于实质改变。

7.3 前景与启示

对个体：认识到困境不是个人失败，有助于减轻自责焦虑，更清醒地评估关系。对社会：女性焦虑、男性回避、关系困境都指向更深层问题—性别权力结构失衡与资源分配不公。解决需要制度改革：缩小资源获取的性别差异、改变将女性价值与外貌、关系相绑的规范、允许男性表现脆弱、减少竞争焦虑。对研究：需要跨学科研究，将亲密关系研究与性别研究、社会分层、劳动力市场研究相结合，理解微观互动与宏观结构的相互作用。

参考文献

Blood, R. O., & Wolfe, D. M. (1960). Husbands and wives: The dynamics of married living. The Free Press.

Bowlby, J. (1969). Attachment and loss: Vol. 1. Attachment. Basic Books.

Hazan, C., & Shaver, P. (1987). Romantic love conceptualized as an attachment proc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2(3), 511-524.

Hochschild, A. R. (1983). 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est, C., & Zimmerman, D. H. (1987). Doing gender. Gender & Society, 1(2), 125-151.

Bowlby, J. (1980). Attachment and loss: Vol. 3. Loss: Sadness and depression. Basic Books..

Sabrina Carpenter《Man's best friend》全专

和他的腾讯会议讨论文档